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文 | 研 | 通 | 讯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9年第4期 总第十三期

2019年第4期



总第十三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期：总第十三期（2019年8月—2019年10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辑：周诗雨

编务：陈天传

特邀编审：徐军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宇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目录

注：目录所列数字为该系列讲座序号，其他场次请见官网。

01 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一）主题学术报告 02

- 周其仁 | 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 02
- 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 | 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 06

（二）跨学科对谈 09

- 思想史与艺术史 09
- 文学与法学 13
- 考古学与人类学 16

（三）“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20

1、学者讲述 20

- 乐黛云 | 记忆中的北大学人旧事 20
- 葛兆光 | 北大·1980年代，与我们这代人 22
- 白谦慎 | 老师、同学、社团——我与北大的艺术因缘 26
- 戴锦华 | 我的老师：偶像与榜样 28
- 吴志攀 | 老师对教育的传承 32

2、领导讲话 36

- 传承即师承 36

3、学缘报道 38

- 回望来路以谱新章，感念师恩以悟学缘——记“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 38

（四）周年报道 41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举办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41

44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46

- [136] 王一丹 | 从《五族谱》看波斯人对欧亚诸民族的认知 46

[137] 波特伦·谢弗德 | 欧洲如何崛起——经济知识在制度构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50

波特伦·谢弗德 | 随机系统中的“价值转形问题” 53

波特伦·谢弗德 | 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 57

[138] 白谦慎 | 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因素 62

[139] 周其仁 | 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 65

[140] 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 | 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 65

[141] 林梅村 | 柔然与阿瓦尔考古调查——兼论6—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66

[142] 王汎森 | 性格与历史 68
王汎森 | 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 71

[143] 韩启德 | 科学与文明之问 74

[144] 格伦·莫斯特 | 怀疑者多马：看，触摸与信仰 78

[145] 约翰·柯林斯 | 古犹太教中作为世界观的天启主义 83

约翰·柯林斯 | 古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的迦南传统 87

[146] 罗新 | 北魏祭天方坛上的木杆 92

[147] 卡洛·金兹堡 | 塑造人民：马基雅维利，米开朗琪罗 96

（二）未名学者讲座 100

[53] 王利平 | 文明化与作为灵魂的民族文化：从涂尔干到土耳其主义的理论之旅 100

[54] 陈斯一 | 荷马社会与荷马道德——“荷马问题”再探 103

[55] 范晶晶 | 佛教譬喻、因缘文献从印度到中国的嬗变 107

[56] 杨清媚 | “燕京学派”的乡土社会转型方案：基于费孝通与林耀华的比较 109

（三）北大文研论坛 113

[99] 李零、李孝聪、韦正等 | 走近历史现场——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追索 113

（四）文研汇讲 119

[01] 叶晔 | 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固及其意义 119

[02] 李开元 | 跨文体写作与学术研究——以历史学为例 121

[03] 姚达兑 | 中国神怪小说的近代英译之聊斋英译 124

[04] 肖铁 | 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现代中国的方式 126

[05] 彭春凌 | 从宇宙进化到社会进步：近代中日交互语境中的斯宾塞 128

[06] 李放春 | 探究革命之“道”：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 130

[07] 周月峰 |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132

[08] 姜南 | 佛经翻译与汉语演变——“见”字新解、“将无”重考 135

（五）文研读书 139

[18] 樊锦诗 |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的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 139

（六）文研纪念 145

[06] 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 145

（七）菊生学术论坛 152

[15] 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典籍传承与学科融合 152

158 专题展览

- “文研院海报展”专题展览精选 160

166 静园学术

- 尾崎文昭 | 东京大学中文系与鲁迅研究会的中文传统 168
- 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 | 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夏尔·安德勒《社会主义文明》导论 170
- 薛龙春 | “碑痴”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世界 173

176 文研回望

- 文研院举办第七期邀请学者欢迎会 178
- 文研院举办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180
- “未名学者讲座”：扶助青年学者，助力文科发展 181
- 文研院举办第三期“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 183
-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教授访问文研院 184
-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参加文研院《我心归处是敦煌》研讨活动 186
- 文研院和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共同推出“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 188
-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波特伦·谢弗德教授访问文研院 190
- 文研院承办北京论坛“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起源、构成与融通”分论坛 192
- 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访问北京大学文研院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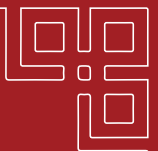
196 文研纪事



C
O
N
T
E
N
T
S



文研三周年系列
学术活动



【编者按】

春华秋实正三载。

2019年9月20日，文研院举办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百余位学界朋友相聚静园，畅叙旧谊，徜徉在学术报告、跨学科对谈、学缘讲述所叠加的温热哲思中。

“近者悦，远者来”。文研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努力推动基础学科发展和跨学科交流合作，目前已举办了近600场高质量的学术活动。日后，文研院将继续围绕重大前沿议题深化讨论，盘活校内外优质学术资源，为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做出贡献。

（一）主题学术报告

周其仁 | 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

2019年9月20日下午，“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本场讲座从当前贸易摩擦中的一个细节说起。在美国政府不断对中国商品加征

关税、对部分企业实施技术断供的背景下，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并不欢迎互加关税、禁止或限制科技交流与贸易——他们合作应对来自国家行政权力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比如和华为合作的很多美国企业都在想办法分担关税或绕过法令障碍寻求解决方案。周其仁教授认为，这一案例启发我们意识到全球化其实存在两个本位：一个是由政治家、政府所构成的国家本位，另一个则

是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所构成的市场本位。这两个层面并不符合同一逻辑，需要区分开来研究思考。

基于这一思考，周其仁教授在讲座中依次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讨论了全球经济开放过程中小国的带动作用；第二部分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组织、国家政府所发生的重要变化；第三部分讨论了市场竞争的输赢与发生贸易战之间的内在逻辑；第四部分重点回应了如何应对贸易战的问题。

在第一部分关于“开放与大国小国”的讨论中，周其仁教授指出，贸易战是在全球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微乎其微，就不会有贸易战，而回顾战后的全球贸易与经济的格局，可以发现当前的开放局面最开始是由一些小国率先开放所带动起来的。从历史来看，大国一般会比较保守，倾向于选择走关税保护下进口替代之路，美国、德国、巴西等国都曾经通过关税保护来促进国内的工业化发展。依靠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扶植国内产业发展的做法，在二战后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潮流中成为了一项主导的经济政策。

战后的世界开放格局最开始是由小国启动的。在缺乏国内市场甚至自然资源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依赖自然禀赋专注出口，或者选择了利用制度优势，通过降低关税形成投资的洼地，集聚了大量的发展资源。通过增设出口加工区乃至“自由港”等举措，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了快速发展，这刺激了世界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当然，也刺激了中国。1978年，



周其仁教授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走了“大国师法小国”之路，实现部分地区开放以快速利用外资。从最早的经济特区到现在的自贸区、自由港，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一旦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长期贫穷所积累的廉价生产要素就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巨大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学习曲线快速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技能、知识的提升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讲座第二部分，周其仁教授指出，只要放开行政力量对贸易来往的限制，形成全球性的市场，各国就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当然，这背后也伴随着产业组织方式、国家政府职能的重要变化。首先，各国企业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的专业性和效率。这些公司无论其母国大小，只要能够经营全球市场就有成长为跨国经营、体量

庞大的全球公司的潜力。诸如荷兰、瑞士、丹麦等国土和人口体量非常小的国家都拥有不少知名的全球企业，它们与大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结果并无二致。再如，华为公司的快速发展也是改革公司适应全球化、主动开拓海外市场的结果，这是当代企业组织变革中的殊途共归。

其次，“市场拓展无远弗届”。企业的生产不再是国界内的行为，每天全球来往频繁的各种水陆空运输方式将全球各地资源连接在一起。公司经营、产业组织、商品生产早已超越了国界，构成了所谓的全球供应链。虽然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依然非常清晰且严肃，但是这些政治建构越来越为人们的来往服务、提供便利。今天的国家政府不仅仅是发挥传统上保护国内秩序的职能，还要参与全球治理、来往贸易、跨国家治理。上述现象说明，在交易定理、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这些基本的经济底层逻辑起作用的情况下，人类连接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全球化的市场具有巨大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来自于竞争，但是市场竞争并不总意味着双赢。在第三部分的讨论中，周其仁教授认为，市场竞争只有在“签约”的情况下才会双赢，而没有合约情况下的竞争就会产生输家。对于市场竞争中的输家而言，有两种行为策略应对失败：一种是反求诸己、提高生产效率再次参与市场竞争，另一种则是集结起来诉诸政治权力，限制、惩罚市场竞争中的胜出者。比如上世纪80年代，江西省政府一度封锁赣粤省界，打击粤商高价收购江西农民猪肉。国内各地区之间尚且会发生贸易摩擦，在缺

乏全球政府协调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就更容易出现争端。

“通而不平”的全球化是国际贸易、经济甚至部分政治冲突的根源。“通”带来全球范围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平”则带来摩擦和冲突。作为先行者的工业区（比如美国的“锈带”地区）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很容易被具有比较优势的后发者所超越，当这些地区转型、再学习不力的情况下，就容易成为反对贸易、反对全球市场的政治力量，并可能支配国家的政治意志引起国际之间的贸易冲突。

面对这些冲突与麻烦，周其仁教授在第四部分的讨论中指出，正如中国政府所说的那样，贸易战没有赢家，也不可能有赢家，应对贸易战的办法只能是摆脱它。各国都有维护本国意识形态、保护本国利益的本能和冲动，一旦进入相互对抗的漩涡，不断推动贸易战的升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会造成冲突局势与大众情绪的失控。所以，贸易战是无法打赢的。单边自由贸易策略是摆脱贸易战的一个可能的途径，这意味不用等待达成双边协定，而是通过本国单方面的降税减税来撬动其他各国跟随打破关税林立的局面。贸易战与军事活动不同，主动加税的主要结果并不是对对手的打压而是对本国利益的损害，减税才能吸引全球的技术与资源富集，进一步促进本国的发展。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战后有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是主动降低关税的，在经验上支撑了单边自由贸易策略。

面对着特朗普政府的高度不确定状态，周其仁教授认为，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协议

的达成。因为国家政权之间达成协议耗费巨大精力和时间，且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被动等待会对市场预期和投资造成较大的影响，最终损害自己的经济发展。在美国以外，中国还有广阔的全球市场，正如欧洲日本已经达成了零关税协议那样，中国可以选择主动与欧洲、“一带一路”国家等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周其仁教授还指出，华为的案例也启发我们不能只盯住政治主体的行为，还要关注市场主体的行为。在当前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和组织也在通过海外建厂、启用“技术备胎”、寻找替代等手段，重新连接市场，突破贸易战带来的限制和障碍。

最后，周其仁教授总结道，在当前一段时期，国家层面的全球化进程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还会非常顽强地向前推进。从长期来看，来自上层建筑、国家权力的力量不会比底部的力量强。真正强大的力量是无数普通人的经济利益，是各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是人们的交流来往和互通互联。他认为，这些底部的力量才是未来的确定性和希望所在。

讲座提问环节，关于如何看待《美国工厂》纪录片的问题，周其仁教授表示，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工厂选址的做法是错误的，最终还是要由企业根据比较优势来确定，特朗普政府缺乏能够真正干预美国企业回国的实际手段。对于如何评价“进口替代战略”，周其仁教授指出，“进口替代战略”在一定的情境下是合理的，也是战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能够使一个国家拥有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但是，这样的战略具有先天的弊端，不利于生产效率

提高、人民富裕和经济增长。中国建国初期就是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培养起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同时在改革开放以后转向了开放。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回应进口替代战略的问题，以提升自己的经济效率。任何一个政策都是利弊具备的，不能因为一个政策的长处就长期忽视其短处——执行时要充分研究如何结合替代政策以化解其内在矛盾和问题。

（撰稿：包培含）



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 | 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



2019年9月20日下午，“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普罗夏松教授首先回应了圣西门是否是社会主义者这一问题。他认为，圣西门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通过后天发展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此外，圣西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能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不同的。圣西门反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即人人只为自己，忽视贫苦的大多数人的解放。圣西门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思想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了社会主义者。

接着，普罗夏松教授介绍了圣西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圣西门在大革命中从事经济投机活动，甚至倒卖国家财产，借此致富。可以说，圣西门把大革命当成一门生意，他的角色不仅是政治活动家，也是商人。另一方面，贵族出身的圣西门也展现出亲近大革命的一面：他主动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给自己起了平民化的名字以融入平民阶层。此外，圣西门在大革命中



普罗夏松教授

遭遇厄运，被雅各宾派投入监狱，一度有生命危险。普罗夏松教授认为，圣西门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圣西门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大革命，认为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平等价值观体现得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圣西门也常常揭露大革命中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如其中残酷的现实和荒谬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是圣西门思想的转折点。他开始从一个贵族老爷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 18 世纪末，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圣西门确立了自己在政治哲学上的志向，即成为社会变革者。1803 年，圣西门发表了自己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写给当代人的信》。在他看来，要想推动社会变革，要

依靠的并不是社会运动，而是实证的政治学以改造人们的头脑，说服社会精英参与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重组。这可能就是圣西门被后世贴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标签的原因。但普罗夏松教授强调，圣西门并不是像一些批评者所宣称的那样对科学技术毫无了解。相反，圣西门曾在这本书中表达过对牛顿的自然科学成就的强烈崇拜之情，并希望能够在社会领域找到类似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的规律，以解释社会现象何以发生。普罗夏松教授认为，这种对于科学天真的迷信构成了圣西门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圣西门的这一观点对孔德、涂尔干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圣西门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奠基人。

普罗夏松教授还提到了圣西门的另一篇重要论述《寓言》。在这篇文章中，圣西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并因此文获得“丑闻式”的成功，甚至身陷囹圄。圣西门在文中指出，如果法国的所有王室成员、官员、教会首脑等社会精英消失，国家运转并不会受什么影响；但如果艺术家、银行家、工程师、医生、木匠、房屋的建造者等生产者消失，国家就会失去支柱，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值得注意的是，圣西门提出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是社会的生产者是谁、生产力来源于谁的理论。在他看来，生产者构成了一个阵营，其中包括企业主、工人和知识分子。

接下来，普罗夏松教授介绍了圣西门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其欧洲思想。早在 19 世纪初，圣西门便表达了对一个现代的、团结的欧洲的设想。面对多年战争后破裂的欧洲，圣西门提出通过政治

的手段和科学的分析实现欧洲团结。1814 年，圣西门发表《论欧洲社会的重组》，探讨如何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保有其国家性和身份认同的条件下建立统一的欧洲。在这篇行动纲领式的文件中，圣西门提出的第一步即是实现英国和法国的联盟，法国可以借助英国的全球经济和军事资源发展。随后，德国可以加入其中，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并逐渐吸收其他国家加入欧洲统一的进程。他希望通过英、法、德三国这样的三核核心促使从事生产的精英达成共识，共同参与修复拿破仑战争带给欧洲的创伤。

随后，普罗夏松教授论述了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圣西门具有多重身份：作为哲学家，他用独特方式解读社会规则；作为政治设想家，他从独特的角度构想新的社会；更重要的，作为社会学家，他始终关注如何组织和重组社会。圣西门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新按照阶级来组织社会，以回应大革命后等级社会断裂的问题。作为第一个提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成为后世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灵感来源。他反对社会资源在阶层间不公平的分配，希望通过社会的或者政治的手段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使生产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者。然而，圣西门所理解的领导阶层并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包括手工业者、工厂主、工人、知识分子等一切生产者在内的实业家。他认为，这些实业家应该取代现有的施政者、立法者来管理社会。

有意思的是，圣西门所理解的实业家包括除地主资产阶级之外的资产阶级。在

《实业家问答》一书中，圣西门对实业家内部的等级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处于顶层的是银行家，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是工商业者、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处于最底层的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然而，圣西门的思想也经历了变化。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圣西门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重要性。在这本对话体的书中，圣西门展现了保守者和革新者的对话，批评了天主教和许多新教教派背弃了上帝的社会道德原则，忽视了贫苦阶级的福利，甚至将最贫苦阶级投入到悲惨的境地。圣西门认为，现状必须得到改变：一方面，这违背了道德原则；另一方面，富有者只有改善贫穷者的境地，才能改善自身的境地。普罗夏松教授认为，在这本书中，圣西门提出的不仅是道德主张，也是政治主张。而他所提倡的改善，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融合了社会主义、宗教和科学进步，形塑了19世纪初欧洲开始涌现的社会主义思潮。

最后，普罗夏松教授介绍了圣西门身后的影响。圣西门的思想是复杂的，留给后人的思想财富也是复杂的。我们可以看到，自称圣西门门徒的人分散在不同的政治学说阵营。圣西门在其生前并没有显赫的声名。他的第一代门徒逐渐将其思想树立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解放思想。此后，从19世纪下半叶推动修建苏黎世运河的工程师、二战之后法国的技术官员，到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对圣西门的主张进行全面现代化的圣西门基金会，涌现出圣西门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追溯者。普罗夏松教授总结道，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三大支柱——作为学科基础的科学观、作为历史导向的进步观，以及把维护最贫困阶层利益作为道德取向的道德观。圣西门展示出超越时代的对社会主义的敏感性，为社会秩序的改造勾勒出蓝图，致力于为人类开辟出一条面向未来的黄金时代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西门可以被视为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圣西门理解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谈论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圣西门看来，平等并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基础，而他的思想也和专家治国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讲座后，渠敬东教授作出回应。他认为，理解圣西门的思想对于中国学者理解欧洲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国大革命以来，整个现代社会埋藏着深刻的危机，而圣西门是最早感受到这些危机的思想家。这些危机包括绝对平等政治、世俗化的政治以及拿破仑推动的民族国家政治。伴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繁荣发展，这些危机也越来越深刻。面对这些问题，圣西门尝试从实业、科学和新基督教（或曰人性宗教）三方面寻找答案。渠敬东教授认为，圣西门为未来社会构建整体性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借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欧洲社会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而人们也希望在以往的思想者那里寻找自我解救的力量。

（撰稿：魏玉槐）



（二）跨学科对谈

思想史与艺术史



葛兆光教授



白谦慎教授

2019年9月21日上午，“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跨学科对谈“思想史与艺术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作主题发言并展开深入讨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主持。

近年来，思想史与艺术史学领域对图像的关注与日俱增，将其作为承载信息的又一重要载体，对图像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发生了鲜明转向。就思想史而言，学者不再拘泥于仅仅把图像当做文献的旁证，

而更加注重图像本身的色彩、位置、结构等元素，试图使它本身就成为史料；就艺术史而言，学界也将研究视域从纯粹的审美或技术分析，转向了图像背后的时代思想和价值观念。基于上述研究转向，思想史和艺术史之间出现了对话的契机和必要。

论坛伊始，两位与谈学者分别结合各自领域的研究现状，对思想史和艺术史的融合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葛兆光教授首先讲述了思想史视角下的图像研究。在他看来，有三类图像对传统帝国政治史的研究格外关键。其一是舆地图。它不仅反映了帝国范围的变动，更代表了帝国开疆拓

土的历程和权力的延伸。古代军队占领某地，首先要做的便是“收其图籍”，这体现出地图的政治意蕴。而且舆地图往往超出科学、准确的要求，如清代光绪年间官方赠送给日本使臣的东亚地图中，就特地将日本的面积画大，以便日本使臣高兴。其二是职责图。它描绘各国使者前来朝贡的景象，这是对中华帝国辐射和影响空间的描述，表现着帝国的笼罩天下意识。其三是蛮夷图。它直观反映了古代中国内部的族群差异，暗含着时人对“我者”和“他者”的区分，如清代的《番社采风图》、《滇夷图》、《黔苗图》等。上述图像深刻反映了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展现了传统帝国对自身、对周边、对世界的认识。

接着，葛兆光教授重点解读了思想史与艺术史的融合问题。就图像研究而言，二者的侧重略有不同——前者侧重于落入俗套的、不断重复、看似平庸的图像，后者侧重于超出常规的、有创造性的图像。但近年来，二者的研究视角却在不断趋近，愈发关注“冰山之下”的平民世界，着眼于一般人的所思所想，并由此产生了对话和交融的广阔空间。但与之相伴而来的忧虑是，艺术史在广泛借鉴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会不会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也就是艺术史的优势和特色？艺术史家的视野愈发向外围扩大，研究艺术品的收藏、品鉴、制作甚至市场的流通等等，是不是变成了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他们究竟是“研究艺术品的历史学者”还是“研究艺术品历史的学者”？

白谦慎教授针对葛兆光教授的疑惑，

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首先阐述了艺术史受思想史影响巨大的原因。从思想的角度解释艺术，是现代艺术史颇为流行的研究范式，特别是解释古代艺术现象的绝佳法宝。以书法为例，许多学者都曾试图探寻书法风格背后的思想渊源，如郭沫若曾撰文《〈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康有为的碑学研究与其变法思想相辅相成，今人也常将禅宗思想与北宋书法艺术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平民识字率并不高，书法成为精英上层的艺术。而精英留下的思想文化素材十分丰富，所以研究书法很容易从思想史的视角入手。

不过，白谦慎教授也有诸如“怎样逃离思想史”的相似忧虑。近年来，艺术史研究尝试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入手，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从思想的角度解读艺术的范式。仍以书法为例，物质文化的变迁对古代书法艺术产生了显著影响，如邢义田、孙晓云、何炎泉曾就桌椅传入对古代书写姿势的影响进行过详尽探讨和论辩。而当今艺术史学家有关艺术品鉴赏、艺术品市场结构的分析，也是一种“逃离思想史”的尝试。然而即便如此，艺术史学在进行此类研究或传统的艺术分析时，也习惯于挖掘甚至“制造”艺术背后的意义，从而难以摆脱思想史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何寻求艺术史的本体特征与研究内容，仍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主题发言后，两位与谈学者集中围绕“寻求艺术史的独有阵地”问题，从风格分析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地位、艺术史家的独有经验、精英与平民艺术等三个方面分别展开了对话。风格分析在艺术史研究中的地位，始终是颇具争议的话题。葛兆光

教授认为，风格分析曾是艺术史研究中极为关键的内容，它不仅是分析艺术品好坏的手段，更是鉴别艺术品真伪的工具。然而风格鉴定高度依赖个人经验，而不同的鉴定者对风格甄别又存在很大分歧，甚至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使得风格分析的结论“不可检验”。因而风格分析是艺术史研究最珍贵的内容，也是最危险、最容易出现失误的部分。

白谦慎教授对此深表赞同。在他看来，风格分析之所以难以成为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核心，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风格分析自身存在争议性。诚如葛兆光教授所言，由于艺术鉴赏者本人的知识结构、审美意趣迥乎不同，对同一件艺术品的鉴定往往存在争鸣，甚至出现双方阵营争执不下、大打出手的局面。要真正化解上述分歧，并不能通过风格分析，而是通过文本等其他形式的文献加以佐证实现。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文字而不重图像的传统，因此，在未来的艺术史研究中，图文互证仍是风格分析以外的重要方法论。其二是风格分析难以适应外部学术评价体系的变化和与西方对话的现实需要。当前美国艺术史学术范式的转变，已经使风格分析和鉴定学成为“学术食物链”的最下端；基于风格鉴赏的札记、品评至多可作为注脚现身于学术期刊，而难以作为正式的学术论文发表。反观国内研究现状，虽然学术环境更趋多元化，风格鉴定学仍是艺术史界格外关注的热点话题，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但其分析过程和结论很难转换成现代的学术语言表述出来，进而与西方学界展开广泛对话。简言之，风格分析的确

是艺术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制于主客观因素，难以成为当前艺术史研究的主流范式。

既然风格分析难以开辟艺术史研究的自有阵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艺术史学家的独有经验能否成为学科的独特价值？葛兆光教授继续以书法为例，阐释了经验的意义和缺陷。初涉书法艺术的人往往遵循类似“永字八法”那种笔画、结构、技法，但真正高明的书法家书写时，往往强调不囿于技法约束，而是进入“心忘于笔、手忘于书”的境界。这是书法艺术家个人经验的体现，但问题是，这种经验很难被语言描绘，也很难作为确定知识被传达。所以，有关艺术品市场、交易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正是艺术史家避免这种个人经验，转而吸收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研究方法，形成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白谦慎教授也认为，独有经验的缺失，可能是当下艺术史研究的一大桎梏。在中国古代，精英上层普遍对艺术史常识和经验有所掌握，对彼此的品评语言也相当熟悉，艺术水准相对较高，进而形成了艺术品评的共同体；然而随着毛笔退出日常书写，许多与之相伴的经验和知识也趋于空白，人们必须专门学习、领悟这一领域才能获知一二，这就造成了对话基础的缺失和共同体的萎缩。另外，老一辈艺术鉴定家往往具有大量的实地考察经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恰恰是年轻后辈学者所缺失的内容。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众多新式科学技术也将被广泛应用于艺术鉴定领域，有助于弥补艺术史学者自身经验的缺失。然而，由于当前对艺术品侵入

性取样存在困难，这些技术的引进尚需时日，以大数据手段建立完整的风格谱系仍需要经历漫长的探索过程。

最后，双方就思想史和艺术史学研究的侧重点——精英和平民思想艺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葛兆光教授提出，关注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是出于建立思想史连续性的需要。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往往着眼于杰出天才的思想，将其作为时代的表征，然而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原本的历史语境中，思想史似乎就出现了难以解读的跳跃性。例如，王充的《论衡》很难代表汉代一般人的思维取向；王夫之的思想也不宜作为明末清初典型的思想代表，因为其著作直到晚清才得以问世。上述跳跃性使得思想史学家的目光从精英思想转向了平民常识，从激流的浪花转向了缓缓流淌的河流，并希望从一般民众的思想取向中重建思想史的连续性。恰如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比喻，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正是思想史发展中“顽固而执拗”的低音。

白谦慎教授对关注平民世界思想艺术的研究取向表示高度认同。他指出，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还是艺术史，都开始日益关注精英世界以外的日常生活，并试图寻找民众思想与精英思想的联系和区别。但是对于某些艺术形式而言，还要格外重视对“上层”和“下层”的区分，也即对所谓的“民众”身份的界定。例如，书法和书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区分标准并不在于书写者本身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其书写水平是否高超。虽然古代青铜器铭文、敦煌写经的原作者身份不明，但依据其书

写水平，仍可归入书法艺术的范畴。这与思想史研究中有关“上层”和“下层”的区分有一定的差别。

在提问交流环节，与谈学者就图像和文字研究中的偏见问题、经济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图以载道”的真实意涵、思想史与物质变革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和回应。葛兆光教授认为，要避免从单一维度理解艺术品。传统中国社会倾向于将文学艺术与政治、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强调文艺的传播、教化功能，故有“文以载道”或“图以载道”的说法。但在鉴赏古典文学、绘画、书法作品时，倘若一味拘泥于挖掘其政治功能，而忽视了“文以娱情”的另一面，则会丧失珍贵的审美意趣和价值。

白谦慎教授则重点阐述了经济和制度变革对艺术史研究的深刻影响和促进。他指出，虽然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传统，但艺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晚近，在成立之初甚至是一门“奢侈”的学科，艺术史教育也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差异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艺术欣赏和品鉴活动已经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史得以在中国大地扎根，进而逐步扩大其受众群体。此外，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也给思想史、艺术史学研究带来了丰富的新资源、新契机、新刺激。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思想史和艺术史的蓬勃发展，仍要归功于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

(撰稿：毕悦)

文学与法学

2019年9月21日上午，“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跨学科对谈“文学与法学”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冯象作主题发言并展开深入讨论，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

对谈伊始，冯象教授从中央芭蕾舞团（下称“中芭”）和梁信的《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案谈起，剖析案件背后革命文艺与私有产权的冲突，开启了“文学与法学”的对话。冯象教授表示，革命经典的著作权问题，是困扰改革开放后的新法治四十年的难题。1985年溥仪《我的前半生》著

作权纠纷案和1996年京剧《沙家浜》版权案，都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著作权法律处理红色经典作品、作者权益问题的困难，以及其中的政治伦理困境。

《我的前半生》案被化约为李淑贤和李文达两位普通公民间的矛盾，《沙家浜》案因汪曾祺的主动退出而解决。《红色娘子军》案是这一类案件的最新代表，中芭以“法盲”身份对法院判决的谴责，标志着以最高法为代表的法制机构的“滑铁卢”。

随后，冯象教授梳理了《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的始末，从1958年梁信在海南采访并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讲到1963年文化部推动中芭改编同名芭蕾舞剧，再到



朱苏力教授（右）与冯象教授（中）发言，张辉教授（左）主持

1990年代中芭与梁信签订协议以及后来双方的著作权纠纷、法院的判决和中芭的“法盲”声明。冯象教授认为，这一案件本身并不难处理，原因有二——首先，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来看，《红色娘子军》这一类革命文艺作品往往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集体创作，而非个人的意志和行为，梁信本人是军队的创作人员，他的剧本不可能例外；再者，从西方法律逻辑来看，梁信创作的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极有可能被认定为雇佣作品，且由于芭蕾舞剧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产权结构，电影剧本的文字创作对芭蕾舞剧改编的影响较小，因此梁信的主张很难成立。

那么，为什么最高法给予梁信主张的机会，并出现此类“中国特色”的难题？冯象教授认为，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回溯《著作权法》立法的年代。在80年代中后期，支配《著作权法》立法的是产权激励的逻辑，增加自然人对作品的支配权，对个体创作成果给予充分保护。这是在创作成果与工资极不相应的时代的立法主张，目的是调整亟需改革的分配制度，加快市场体制的建立。因此，在西方产权逻辑下明确的雇佣作品，在国内仍然无法符合认定标准。三十年过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新的法人组织和分配制度都已经形成，《著作权法》的这一保护个体产权的中心原则在今天是否依然合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著作权纠纷背后，更值得深思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律体系的话语权问题。冯象教授认为，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具有讲述“中国故事”的职能。如

何处理革命红色经典的著作权，实际上考验的是新法治如何讲好革命中国的故事。与红色经典的著作权问题几乎同时出现的，是近年来革命英烈的名誉权问题。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对英雄烈士的特别保护，以及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红色经典传承和英雄烈士合法权益、不得判令红色经典作品停止演出的通知，将革命经典和英烈作为私法自治传统和产权逻辑的“例外”。这种在西方资产阶级法权中不可理解的“例外”，正是一种“中国故事”的讲述，也是法律对政治信仰和伦理危机的应对。红色经典叙事的政治意义与今天个体权利理性的话语相矛盾。而从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的角度出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法治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则是红色经典著作权纠纷背后更深层的问题。

接下来，朱苏力教授对冯象教授的发言做出了回应与补充，并就“通过文学的法律”、“文学中的法律”、“有关文学的法律”这三个研究领域展开阐释。朱苏力教授认为，在法律与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红色娘子军》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文学的法律”，即在前法治社会，文学发挥的社会规训、社会教育的“法律”作用。在传统社会，无论中外，文学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作用，而中国则具有尤为深厚的文字传统。无论是传统儒家社会文学的教化功能，还是革命年代文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作用，都是中国社会历史中文学独特地位的体现。进入现代社会，文学消退，现代法律进入，原本由文艺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控制策略改由法律途径实施，法

治话语加入主流意识形态。而对中国而言，现代法治和宪政是舶来品。对中国国情与历史了解的缺乏，以及对西方法律概念的迷信和照搬，是今天法律难以解决诸如《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除了“通过文学的法律”，朱苏力教授认为，“文学中的法律”（即文学作品中讨论的法律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圣经》《窦娥冤》《赵氏孤儿》《基督山伯爵》《雷雨》等经典中外文学作品，都涉及了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文学故事中的复仇、婚烟家庭的的爱恨与伦理、情理法的冲突、错案与冤案。广义的理论法学问题，往往是关乎人的自然本性与制度的深刻命题。朱苏力教授曾从“文学中的法律”角度重新解读曹禺的《雷雨》，剧本中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三十年的恩怨，折射出的是儒家传统对家庭父子、兄弟和男女关系伦理的关切和背后深刻的制度考量，以及这种伦理秩序在时代变迁中受到的剧烈冲击。由此可见，通过文学作品研究法律，并非解答法律的技术问题，而是反思长期困扰着法律的基本问题，及其背后人性的复杂性与悲剧性。

诚然，文学作品中可以发掘出许多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朱苏力教授却表示，“文学中的法律”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并不乐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相对于图像阅读、视频阅读、文字阅读，碎片化、视觉化的阅读逐渐成为主流。特别是文学中的法律要求的精读，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因此，当代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实践，多围绕电影作品而非文学文本展开。与文学中的

法律导向理论反思不同，影视中的法律可能带来更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经验重启。朱苏力教授重点分析了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法律问题——影片中李雪莲的遭遇，反映的正是社会向现代法理转向的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情理、秩序、约束被瓦解，对法律抱有正义预期的个人失去依傍并最终被法律“辜负”，在社会法治化的过程中成为“刁民”的命运。这类作品中展现的个体经验，提示观众和法学人、法律人反省变迁社会中法律的缺陷，以及中国法治变革与实践更深层的困境。

随后，朱苏力教授分析了“有关文学的法律”，即对文学作品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和名誉权等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这是与法律实务关系最为紧密、最具社会功用的法律与文学研究领域。但同时他也指出，有关法律、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狭义的“法律”和“文学”范畴，跳出功利化的学科体制的禁锢，开拓更多值得探讨的方向。

接下来，冯象教授对上述内容做出回应，并就文学与法学的关系发表看法。冯象教授认为，在法律研究中，文学作品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今天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人类阅读习惯、接受信息方式的改变，必然会改变文学的概念，甚至改变人的意义本身——这是未来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法学领域都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在文学研究中，法学理论同样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例如冯象教授长期研究的《圣经》便可被看作一部神的法律。反过来，法律的解释技术也是经书的解释技术的“后代”。紧接着，冯象

教授进一步结合中美贸易战的时代背景，提出在外部国际环境的竞争与压力之下，“文学”和“法律”更应从话语权和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理解——二者都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密切相关，都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职责。

最后，张辉教授对本次对话进行总结。他表示，两位对谈人从《红色娘子军》著

作权纠纷案这一个案出发，分析了革命文艺与私有产权、市场经济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探讨了法律与文学背后的社会、政治、伦理、宗教、意识形态等更深层的问题，掀开了文学与法学这一命题的独特面向。

(撰稿：杨仪)

考古学与人类学



2019年9月21日上午，“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跨学科对话“考古学与人类学”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作主题发言并展开深入讨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

对话开始前，渠敬东教授简要介绍了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陈述跨学科对话的目的和重要性。他认为，人类学和考古学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转化为不同的研究方式，但二者在源流上合一，都以溯源为重要的学科讨论基础。渠敬东教授指出，当下缺少对学术史本身的溯源，研究者需要重新审视现代学科创建者们的蓝图。而用跨学科的方式回溯学科史，是深入理解学问和创新的起点。

随后，王铭铭教授以“人类学：民族

志 / 区域 / 文明”为题进行了发言。他首先表示，与考古文博学院相比，人类学系较为年轻，仍有待进一步发展。接下来，王铭铭教授深入介绍了人类学的基本情况和研究成果。以美国为例，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大部门。随着基因研究的深入，基因测序等服务走向商业化，体质人类学的影响已经广及每家每户；中国的《人类学学报》也逐渐对分子人类学开放。文化人类学则包括众多部门，如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以往也被称为民族学）。据王铭铭教授介绍，民族学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其中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也包括后来费孝通先生观察并阐述的生育制度。另一方面，人类学涉及对宗教的研究，但人类学所关注的宗教不是神学定义的宗教，而是宗教和人类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部分。此外，人



李零教授



王铭铭教授

类学还包括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具体分支。王铭铭教授认为，自己从事的人类学研究属于社会人类学范畴，目前仍在国内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王铭铭教授援引列维-斯特劳斯1954年的著述，详细分析了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民族志、比较或历史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第一层次主要是“和活人打交道”，通过漫长的田野工作形成民族志，使自己的描述带有关怀和思想。第二层次强调对文化的历史地理关系进行比较，用历史的时间追寻其关联的形成。第三层次要求以民族志、民族学的发现为基础。

接下来，王铭铭教授对三个层次的具体成果与国内学科史发展进行了具体阐述。中国早期人类学以翻译介绍为主。三十年代初，我国开始涌现出一系列著名的民族志研究，如凌纯声、林耀华、费孝通等人的著述。根据研究对象单位和规模的不同，当时的民族志研究形成了民族与社区两个流派。而从1950年代开始，部分学科被组织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对国内的民族

分布进行调查。但王铭铭教授认为，这一过程部分造成了民族志的扭曲，存在“识别主义”的问题。

接下来，王铭铭教授回顾了北大人类学系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所谓科学就是“有限定的”领域的实践，研究者也应该根据个人能力，界定研究的单位。基于列维-斯特劳斯和自己的田野经验，王铭铭教授还总结了“三对关系”和“四对关系”。前者包括“人-人”、“人-物”、“人-神”，后者则分别为“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四对关系。每个共同体都有内在的区分，民族志指的就是对所有关系以及人们对这些关系的看法的研究。

在讨论民族志研究的不同传统时，王铭铭教授强调了民族志成就的“区域性”，并指出：所有的民族志调查都是在特殊的区域内部展开的，所涉及的“他者”也各有不同。既往的人类学理论，都是在区域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民族志学术区内部的对话及内外关系而形成的。成就突出的民族志区域包括传统区域和新兴区域，

前者可大致分为三类：澳大利亚土著和爱斯基摩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亚洲。这三大区域对英国人类学而言非常重要，其中取得的成果也带有“人类学一般理论”的意义。新兴区域则包括内亚地区、亚马逊和西伯利亚，同样形成了一定的流派。

在这其中，王铭铭教授特别提到亚洲作为人类学田野的特殊性。他指出，西方人类学偏向研究简单社会或自然社会，但面对“复杂社会”的大传统往往无从下手，如中国研究要求民族志与汉学的结合，而这对一般人类学家来说难以捉摸。最后，王铭铭教授从人类学的角度简要讨论了文明的定义，认为莫斯的相关理论有相当的借鉴价值。渠敬东教授对王铭铭教授的发言进行了总结和发散，指明了人类学的关系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启发意义。

接下来，李零教授发言。他首先回顾了早年参与考古工作的体验，由此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并提出：1985年对于中国的考古学是很重要的分界点。据李零教授回忆，早期的考古学田野工作和地质学关系较大，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有一定联系。简而言之，当时考古学的研究机构和工作方向都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

在谈到考古学与考古学家的基本概念时，李零教授提到了夏鼐先生1985年去世前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做出的



渠敬东教授主持

诠释，其中便涉及“技工是不是考古学家”的讨论。李零教授表示，早期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行系统的学习。考古是知识生产，是一种团队作业，其中既有通常所说的考古学家，也有最底层的民工。除了对考古学家定义的讨论，李零教授还提到夏鼐先生对考古和文物市场化、国际化的抵制。夏鼐先生曾表示，考古学家应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应对中国考古面临的挑战。

与“考古学就是考古学”的观点不同，李零教授认为，考古学完全是跨学科的，也属于历史科学。他对中国和西方的考古学和文物管理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公众考古”这一概念。中国的博物馆和考古都是国家所有制，而西方的文物是私有的，考古也由考古公司进行，将考古视作给私人博物馆供货的过程。这反映了中西考古学的不同路线和发展方式，中国考古学“与国际接轨”时必须明确这些问题。

此外，李零教授强调，前沿的考古学家必须考虑与人类学的关系。中国考古学

家常认为自己是民族考古学家；其实，中国的确是民族史材料特别丰富的国家。虽国内一直以研习“汉族史”为主，但即便上溯至秦朝，汉族史也从来没有和其他民族分割开。李零教授对俞伟超教授的观点表示认同，指出考古学要从较高的理论层次进行认识，借助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真正理解“物”背后的“人”。

渠敬东教授对此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李零教授的陈述呈现了一种“有血有肉的考古学”。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关起门”做学问，不能把学问做得越来越窄、自以为是，而应当完整地了解学科。

交流讨论环节，与会学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李放春研究员回忆了学习考古时对文化和文明的理解，并联系社会学理论，认为处理中国经验将必然遇到文明理论的碰撞，因此就涂尔干和韦伯“解释文明的两条脉络之间是否有交流的可能”提出问题。王铭铭教授表示，两个学派所理解的文明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涂尔干和莫斯更多地考虑文明的边界，以及地方社会心理形态对文化传播的制约，这比韦伯学派的关注更为广泛。渠敬东教授对此进行补充，他表示，韦伯主要处理的是理性化问题，其核心是从西方理性化观察各文明的理性化形态，问题则在于是否能用理性化作为各文明最核心的准绳。至于为何涂尔干和莫斯学派（而非韦伯的理论系统）真正产生了研究中国最为系统的汉学家，这是学科史必须反思和研究的问题。此外，在场学者还就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现代学科规划与格局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撰稿：陈洁樱）



（三）“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

1、学缘讲述

记忆中的北大学人旧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

当时的课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学科范围比较广，学文学不光是学文学。大一选了化学，觉得很好玩，因为一上化学概论两个礼拜就去做一次实验，所以那个时候都起过念头要转系，想去上化学系。那个时候知识还比较广泛，我们白天正式的课程里还有费孝通开的《社会学基础》。他讲的很多，是社会学基础，我们每个礼拜还有那样的课。

剧艺社是旧北大一个挺大的社团，后来就是专门演戏的。那时候有一个挺红火的剧，叫做《第四十一》。我是剧艺团的很重要的人物，因为管道具、服装事务性的东西。民舞团就是跳民间舞蹈的，我倒是参加了，那时候也喜欢跳舞。跳得最多的是新疆舞，歌词印象深的就是说：“温柔美丽的姑娘，我的就是你的，你不答应我要求，我要每天的哭泣”。地下的活动



乐黛云先生（右）与邓小南教授合影

大概就是一个读书会，每两个礼拜一次读《共产党宣言》，是学生会的人自己组织的。

子民堂就是蔡子民的纪念堂，它是一个旧式建筑，中间一个大房子，两边两个小房间那样。那个院子很大，我们老在院子里开会。民主广场跟这个不是在一起的，离得远一点，五四运动就是从民主广场出发的，所以相当大。

开始我要选择进入学科，那个时候我选择了现代文学，可是王瑶先生劝我不要搞现代文学。他说，现代文学太困难啦，那些人都活着。你要说他，对他的评价要是多一点或者不恰当一点，他就会爬起来跟你说，你这个说的不对或者什么。因为谁都会对自己有偏见，所以不一定会认同你讲的话，你就得屈从于他们当时的想法。可是后来我想想，我说这做学问，就是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也不一定要去让他认可，要他不认可反而倒好了，因为有不同的声音。我是王瑶先生的学生，规定是两个礼拜得找他一次，谈一谈我有什么问题。大家还是怕说话，那时候怕说的不对，所以大家都是很细心的。可是他这几句话是很有名的：“不说也要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表示一种很倔强的声音吧。

汤用彤先生常常指责我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得太少，他觉得反正我们学现代文学的人，首先要古代文学的底子要打好，他觉得这是我做学问最大的缺陷。他常常跟我讲，不管你做哪一个时代，都必须要有个很丰厚的古代文学基础，因为这是中国文学的根源。

温德先生的话，我去过他们家一次。他人很好的，请我们吃烤面包，还有一杯咖啡，谈得挺高兴的。他喜欢游泳，我跟

他在一起游过几次。他游得非常好，他仰游把两个脚交叉起来，然后就不动了，躺在水面上非常逍遥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两只蜻蜓就停在他这个大拇指上。他很得意的，也不动，让它们停着。我对这个印象很深的。

一年级的時候，教我写作方面的是沈从文。蒋介石派的飞机就在这个东单市场，来接这些有名的教授，都买了机票给他们。当时作为地下工作者，一个任务就是要留下他们，要跟他们多谈谈，要留下，把共产党的政策交给他们，就是不会对他们有什么不利的部分。

邓广铭先生跟汤家也是世交，所以有时候会到他们家去。那时候他也觉得我们小孩很好玩，跟他的几个女儿差不多大。我跟他二女儿邓可蕴特别谈得来，两个人可以说都很活泼吧，所以常常在一起来往。

杨晦先生他讲《共产党宣言》，因为他是党员所以很进步。两个礼拜一次，礼拜一晚上就给我们开《共产党宣言》的课。我们那个时候听的也挺认真的。胡适先生接见过我们一次，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来，特别像我从内地来的，家里也比较穷，北京又那么冷。结果，胡适就亲自我们召集在一起，在那个子民堂的院子里。那时候也没有大礼堂，或者什么大课室可以待在一起。就在那个院子里，他就给我们训话。他鼓励我们说，年轻人苦一点、冷一点没关系，可以过去的。他很谦和，所以那时候对他印象很好。我还记得他穿一个长的棉袍，那个样子给我留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季羨林先生特别喜欢这一片水塘。所以有一次他专门撒了几个莲子，那几个莲

子还出来了,后来人家把它叫做“季荷”——季先生种的荷花。他六十多的时候,有一次把自己锁在房子里了。其实他只要打个电话,人家也会去救他的,因为钥匙就在房间里头。可是他想,六点多钟太早了,不愿意惊扰别人,所以就自己从那个窗户上跳出来了。季先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很和气,也很喜欢跟人谈一些比较有启发性的问题。他也提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谈一些自己想的问题。因为我做比较文学

研究,就经常去请教他。

现在,我们做比较文学,实际上有很大的转折——我们主要是研究文学向前发展,应该怎样互相渗透、互相理解、互相诠释,产生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多元的、保持差别的跨文化研究。这是我们做比较文学的人所梦想的。

(整理:杨一宁、何沁心)

北大·1980年代,与我们这代人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资深特聘教授葛兆光)



四十一年前,1978年2月底一个夜晚,我从贵州一个县城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在北京站被校车糊里糊涂拉到北大,住进32楼304。两天两夜没睡,太困了,于是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天亮起来,我才看了看未来要待六年半的北大。当时印象很深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也不是西门的华表,倒是南墙外多年堆积的黄沙,寒风里光秃秃的树枝,大膳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里的玉米面儿粥和咸菜丝,五四操场的煤渣地和天上刮的黄土。

这就是北大给我的第一印象,1978年的春天的印象,就像是一张黑白老照片。

两千四百多天之后,我离开北大。那是1984年的夏天,校园已经绿树成荫,临走的那一天起床,窗外明晃晃的,听见知了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直到这时候,我的北大记忆,才换成了博雅塔的塔影、未名湖的湖水和西门里面的华表,从黑白照片换成了彩色照片。

现在回想起来,两千多天像一个漫长的隧道,从隧道的这一头到隧道的那一头,整个人好像变了。其实刚进北大的时候,

我对未来的想象真的很模糊。为什么?因为上大学前整整十二年没读过书,在文革中我造别人的反也被别人造反,接着下乡当知青在苗寨挖过煤种过田也挨过饿,再接着在工厂里打砖坯和熬肥皂,在供销社四处收购药材茶叶皮毛和烟草。那时候,能上大学就不错了,能上北大就更不错了,不敢有奢望。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个28岁才上大学的人,哪里会想象,更不会憧憬。刚上大学的时候,对未来六年半的日子,就好像懵懵懂懂进入这条隧道,根本不知道隧道有多长,也不知道隧道那一头是什么样的风景。

直到离开北大的时候,我才确信我会成为一个学者。

今天我们是在说“传承”,可现在让我回忆那两千多天,说实在话,好像没法说清楚究竟是什么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如果允许我以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来总结,我觉得在北大的六年半,可能我们同时传承的是三个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新传统,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兴的理想主义传统。

从1978年到1984年,正是中国大转型的时候。我在北大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按照中文系文学专业同学的说法,古典文献就像是“出土文物”,安安静静的没一点儿声音。确实,我们就是钻故纸堆的,老话说叫皓首穷经,所以,当时中文系的文学专业灵动飞扬,写诗的写诗,写小说的写小说,编杂志的编杂志,出尽风头;新闻专业放眼天下,记得那些将来会成为无冕之王的同学,每天谈的都是世界和中国的大事,指点江山,胸怀广大。在他们

的比较下,古典文献确实显得无声无息。

但是,一个生活在北大的人,怎么可能心如古井?“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大概是中国士大夫的旧传统,但也是现代知识人的新传统。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的北大,有点儿像1935年一二九时代的北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不过,那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是人们心里都想着中国“总算有了振兴的契机”。那时候,改变中国的理想主义真像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我们不时从书桌旁站起来,抬头看看窗外一波又一波的风潮。

1919年,也就是正好一百年前,胡适给高一涵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说“你想我如何能读书,如何能把我的心关在这几张纸上”,好像写的就是八十年代我们这些读古书人的心情。

第二个传统是老传统,也就是五四以后北大的启蒙思潮。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鲁迅长大的,文革之前和文革中我们只能读鲁迅,这是时代的限制,但也是时代的潮流。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刚刚到北大就开始了读胡适。记得1978年第一个暑假——我们这一届的第一个假期是暑假而不是寒假——我带了偶尔借到的《胡适文存》回家,那时候胡适的书还没有那么容易找,可这个夏天,这三本封面破旧的旧书,给我带来一个新世界。

为什么?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里,同属启蒙的思潮里,在鲁迅那种激烈和锋利之外,原来还有胡适这种理性和温和。很温和但是很坚定,温和的是态度,坚定的是立场。这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



葛兆光教授

始终采取通过学术关怀社会的进路，也始终记住五四一代的基本价值。特别是，1980年代之初，当我们进入北大的时候，中国经过文革十年，虽然说改革开放，但民主、科学和自由这些价值，才从五四重返大地，还没有在我们这个国家落户，我们必须温和而坚定地让它们安家。顺便可以说到的是，毕业之后我自己学术研究一个关键选择，就是从文化史角度研究禅宗，这也是受到胡适的影响。我前两年才写的有关中古禅宗史研究的文章，题目也还是《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是的，不仅是禅宗史研究，在很多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仍然在胡适的延长线上。

一百年前——又是刚好一百年前——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顾颉刚等北大学生在胡适的支持下，办了一个《新潮》杂志，这个杂志的英文名字是“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它的宗旨是提倡“批

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人的新趋向，也建设了北大的一个新传统。

作为北大的人，我觉得，现在还得继承这个传统。

如果说，第二个传统是北大的思想传统，那么第三个传统，则是北大的学术传统。

胡适曾说，新文化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我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就是“整理国故”，记得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除了一进学校不久就去世的魏建功、游国恩之外，年长叫做“先生”的，还有周祖谟和我的导师阴法鲁；叫做“老师”的，有我的另一个导师金开诚、裘锡圭、严绍璁等。我记得，我们也上过一门中国文化史常识课，有一个明星般的教授群，像邓广铭、刘乃和、史树青等先生。邓先生讲第一课，讲的就是历史学研究的四把钥匙，年代、地理、目录和制度。

在北大，我们接受过最严格的训练，也习惯了最苛刻的规范，和文学专业一样上中国文学史，和历史系一道上中国通史，和哲学系一样上中国哲学史。可我们还要上六门基础课，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魔鬼训练，可这种魔鬼训练给了我们一个通向不同领域的多种门径。我可能是文革之后第一个在北大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本科生？1981年我写了一篇《晋代史学浅论》，我的导师金开诚把它转给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经过周先生的推荐在学报上发表，这在当时大概很罕见。可是我读古典文献专业，为什么却做的是史学史论文呢？

其实，北大自从老校长蔡元培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以来，始终鼓励学生自己的摸索。我上大学已经快28岁了，老师们对我很宽容，记得金开诚老师就让我不必按部就班学课程，自己去读书。我一面读前四史，一面读四库提要，研究生时代又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各种古人的文集。就这样，我在北大学了一肚子杂学，也自然不受文史哲的学科限制，我一开始做史学史，就完全不按牌理出牌，也许一直到现在，还有这种“野狐禅”的风格。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北大可以没有家法。其实北大有北大的家法，对于古典文献专业来说，这家法就是把“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连起来，精细的功夫和有意义的问题结合，坚实的史料和宏大的视野结合，这才是真学问。胡适在北大办《国学季刊》，说传统学问很好，但问题是它范围太窄，忽略理解，缺乏比较，这是非常不对的。好的学者不应当是“两脚书橱”，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说过两句话，一句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句是“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留下三个小时思考”。这两句话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专业的、学院的、严格的古典文献知识，必须经由你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为我们这个传统漫长的国家“再造文明”，否则，你就只能是传统的经师甚至陋儒。所以就像王元化先生说的，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

上个月我在台北，应龙应台的邀请，也讲了一次“我和中国的1980年代”。说

实在话，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和学术，就是在1980年代定型的，而所谓1980年代对我来说，主要就是北大岁月。无论我后来研究禅宗史和道教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东亚和中国，其实都是在北大学术的延长线上。

从1984年研究生毕业算起，我离开北大已经35年了。35年里，北大发生了太多变化，很多新的建筑我都没见过，很多过去的老师也离我们而去，虽然未名湖、博雅塔、华表还在，可我觉得北大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儿陌生了。不过，我心底里一直记得的，是过去我读书时代的那个北大，在我的心里它烙下太深的痕迹。它带给我生命中最重要启示是，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人——重要的话再说一遍——你必须做有学术的思想，也必须做有思想的学术，也就是说你要把专业的和学院的研究，和你对社会的关怀连在一起。这就是北大前辈说的，“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一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大我’的负责任，能如此做，才是道德才是宗教”。

作为北大毕业的人，我不敢忘记这个责任。

（撰稿：葛兆光）



老师、同学、社团——我与北大的艺术因缘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



1978年10月，我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学习，本科毕业后，由于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不久，我们班有8个同学同时留校，我又在北大教了4年书。我当时的专业和我今天从事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燕园求学和工作的8年，却给我以后的艺术史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我和艺术的结缘在我考进北大之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的热情开始逐渐消退，艺术教育在上海慢慢地恢复，我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1978年进入北大后，学业之余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它反而在燕园优越的文化环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我在十多年后最终走向艺术史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我在北大时期的艺术活动，首先得到了当时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老师的关怀和支持。1979年3月上旬，一个偶然的机，赵宝煦老师得知我喜爱书法后，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亲切地交谈。赵老师少年时在北京从师学画，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发起阳光美术社，邀请闻一多先生为指导教师。而那时的赵宝煦老师正是政治系的学生。所以，在其他老师都教育学生们要巩固专业思想的时候，赵老师却对我的艺术实践多所鼓励。赵老师知道我喜欢篆刻，送我一本他珍藏的精装本《齐白石作品集》，那时候的物质条件差，赵老

师送我的这本书，是我拥有的第一本精装本艺术书籍。赵老师还经常给予我的艺术以指导。有的时候，他还把自己写的诗抄录给我，我也曾把自己写的字请赵老师指教。那时北大还没有成立学生书法社，在赵老师的介绍下，我参加了教工的燕园书画社的活动。赵老师还带着我和中文系78级研究生曹宝麟和图书馆系78级本科生华人德一起拜访季羨林先生，观赏季先生的书画收藏。此外，赵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喜欢书法篆刻的中央美院副院长朱丹先生和当时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后来成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徐冰。现在想来，赵老师当年介绍我认识文化艺术界的前辈和同道，实际上是希望我能利用北京独特的文化环境，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拜访其他关心艺术的老师，比如说我就拜访过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魏建功先生。

北大让我的艺术爱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求学期间我结识了两位学识渊博、书法造诣很深的师兄——曹宝麟和华人德。曹宝麟是78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王力先生的高足，长我九岁。他是文革前华东化工学院机械系的大学生，但自幼喜欢古代文学，研究诗词格律。文革结束后，他跨界考上了王力先生的研究生。曹宝麟自幼喜爱书

法篆刻，在华东化工学院读本科时从我的书法启蒙老师萧铁先生游，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同门。曹宝麟是上海人，但我在上海时并不认识他，因为那时他在安徽山区的广德县农机厂工作。1978年10月我到北大报到前，去向萧先生辞别，老师说，宝麟也考上了北大，你到北大去找他。在北大，我和宝麟交往最多，常去他的宿舍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出游，比如去圆明园吊古，看各种展览，他把我看作是小师弟。在他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古代文化的知识。我是在他的引导下开始学习篆刻的。今天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艺术史专业，并不训练学生们辨认草书和印章，在古代的文化史方面的训练也不足。而我当年在北大业余爱好活动中获得的那些知识，居然成了我今天专业上的看家本领。

华人德是无锡人，66届高中生，比我大八岁。文革中，他在苏北插队落户，1978年考上图书馆系。文革中学习的条件不好，他插队时手边仅有两部好书——许慎的《说文解字》和郑樵的《通志》，他读得烂熟，也因此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学和文史基础。图书馆系男生和国政系男生同住37楼，他住在一楼，我住在四楼，所以也能常见到他。1980年冬至，人德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被推为社长，我任副社长。那时候我们组织参加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举办雅集，参观北大图书馆藏碑帖。既丰富了业余生活，也交流了艺术。

1982年毕业后，我留校教书。系里见我喜爱古代文化，安排我为本科生开课，教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虽说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备课，谈不上是专门的研究，



白谦慎教授

但备课的过程却让我有机会了解中国古代官制。这对我以后研究中国艺术史，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年北大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燕园开放多元的思想氛围和活跃而又淳朴的学术风气。那时没有名目繁多的考核、评估、项目来扰乱人心。在开放的氛围中，思想的撞击中会启发你去思考各种问题，而淳朴的学风，令你在分析问题，会小心细致，力求扎实。我的处女作，就是在大学四年级完成、毕业那一年发表的，至今依然被书法研究领域经常引用。

宝麟和人德毕业后，都离开了北大，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87年，华人德兄发起成立大陆第一个民间书法社团沧浪书社，我和宝麟都是创社社员。我们在国内举办学术会议，在美国举办中国书法篆刻展。如今这两位师兄都早已是中国书法史研究的权威，也是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书法家。

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学习和工作了8年，此后到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学比较政治4年，这12年的政治学学习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拙著《傅山的世界》英文版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至今已有多不同的版本，它的读者超出了艺术界与艺术史界，正是因为它所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而我本来就有着不同于一般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背景。目前我正在研究晚清高官、学者、收藏家吴大澂（1835-1902），通过他，我来观察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后，晚清最后那两代士大夫的业余生活。我曾写过一篇论文《从吴大澂到毛泽东：二十世纪社会精英结构的变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我曾有政治学的背景，怎么会选择这样的课题。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1990年我从政治学转向艺术史的一个机缘，因为它也和北大学缘有关。1986年至1990年我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读书期间，在东亚系教书法课。业余的时候，开车拜访美国东部的书法家。经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之

子李培德教授的介绍，我去拜访了耶鲁大学退休教师张充和女士。张老师是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她的丈夫傅汉思是德裔汉学家，长期在耶鲁大学东亚系任教，张老师则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教书法。上世纪抗战胜利后，胡适先生邀请张充和到北大教书法和昆曲，邀请傅汉思和张充和到北大西语系任教，他们在沈从文先生家中邂逅、相爱、结婚。当张老师知道我是北大校友又喜欢写字刻印后，很高兴，谈得非常投缘。当1989年秋天她得知我想转行不再研究政治学后，主动提出推荐我到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在她的大力推荐下，我在1990年秋天顺利进入耶鲁大学。

1990年秋，全家抵达耶鲁后，张老师和傅汉思先生请我们吃饭。由于我妻子王莹是北大中文系1978级文学系专业的学生，席间张老师指着自已、傅汉思先生、我、和我妻子说：“我们都是北大的”。

（撰稿：白谦慎）

我的老师：偶像与榜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

我的课堂确实很热闹，常常人满为患，但是一次在上课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几乎晕倒在讲台上。到现在我还不清楚自己的身体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但是它再一次以

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声音告诉我说：你老了，变得无力和无助。不过这个事实本身却也给我一点勇气。是时候该站上谈“传承”的讲台上了，否则再不谈，就来不及了。



我接受这个邀请，是为了接在乐老师的视频之后，继续跟大家谈我的乐老师。如果访问乐老师问说“你此生最得意的学生有谁？”答案一定有我。但事实上，我是“欺世盗名”的学生。

当我们说某一个人是谁的学生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他的入室弟子，在他名下受他指导的学生。而实际上，在北大四年的生涯当中，我并没接受过乐老师的直接指导。对于我来说，她始终是一个近切，但又是个遥远的身影。我此生没有真正意义上膜拜和追逐偶像，但在北大的岁月当中，乐老师曾经对我构成了一种偶像式的，甚至超过了偶像的魅力和活力。她像一种展示和召唤。她几乎在某种程度上倾覆了我曾经对自己的期许和梦想，但又重新形塑了我对自己的希望。

当我们说乐老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好了不起，她引入了一个学科。但今天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尤其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比较文学”四个字“闪耀的光彩”、“凝聚的魅力”。与我同时期的学者，当年没有一个人不曾追随在乐老师的麾下，不曾不被比较文学这样的光彩所召唤、所折服。现在很难想象，当时“比较文学协会”下辖数千个会员，150多个分会。所有的新学科，所有的新努力，所有的新尝试，都试图把自己归属在比较文学的麾下，都试图去获得乐老师的“加持”和“保护”。当年的“比较文学”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是80年代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基地。比较文学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视野，完全不同的方法去感知

世界及中国的可能性。它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能量，它创造了新的学术，同时在新的学术中产生了让我们参与和介入变革中国、变革世界的力量，而乐老师则是这个过程中的旗帜性人物。

因为乐老师，我放弃了我的文学梦。她让我及早地知道，作为一个二流诗人，并没有出路。她向我展示了一个教师的魅力与风采，一个学者的空间与可行性。每次看到自己的课堂人满为患时，我都非常理解和同情那些热情的同学，因为当年我曾经坐在现在学生无法想象的狭窄的窗台上，仅为了倾听乐老师的写作报告，向我们勾勒西方学术的现状，为我们带来无数的思想与理论资源，以及影响这些理论产生的世界变化的信息。我记得，就是在那个课堂上，乐老师用三句话提及了一个叫做“符号学”的存在。因为这三个字，我被迫用蹩脚的英文到英语世界去寻找知识。而这却成了我电影学术的开端，成了到今天为止的最坚实的基础，也就是结构主义电影学。

乐老师改变了我人生的行动与梦想。在今天的这个年龄，站在这样的一个讲台上，我也许可以说：我仍继续走在实践这个梦想的道路上。在某种意义上，乐老师把这个梦想变为我个人生命的重要部分。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在80年代中后期，乐老师突然“召唤”我。当时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如鱼得水地沉溺在电影学术和电影艺术中。不见天高地厚的青年学者突然接到心中“遥远的”偶像的召唤。乐老师说：“回来北大，我觉得这是更适合你的地方。”我骄傲、感动极了！像所有曾经梦想留在北大的人一样。因为

乐老师的邀请，我成为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兼职老师。第一堂课上，乐老师坐在第一排，微笑着挺我。对我来说，梦已经圆了。

我真的没有更多的梦想，没有把这个“邀请”变为“现实”的考量，因为我认为我的专业是电影。但是，乐老师坚持。一年、两年、三年，每一年，她都重申这个要求。我说，我不懂

比较文学。乐老师说，你做的是比较文学。在她看来，比较文学不是文学，它是一种“精神”。比较文学是一种朝向世界的方式，当你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不仅建立在电影这个媒介之上，而且建立在形成中国电影的一个必然的、杂糅的、对艺术的充分理解之上，这就是比较文学。到了第三年，我还是舍弃不了对电影的留恋。乐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但我依稀记得朋友张教授的话：“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人想在北大谋职？乐老师一年里阅读多少份洋、土博士的报告吗？你究竟以为你有多么优秀，一直这样的拖延？”那个时刻，我再一次体会到乐老师的治学、为人、胸襟和坚持。从那时候起，我真正成为乐老师麾下的马前卒。

之后，我更深层地了解到乐老师的学术动力不是来自她的学术自身，而在于对学科内部评判的“无视”。她对学术自身的考量并非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朝向学术之外的热爱。对于乐老师来说，社会和人生都排在学术之上。她是她那个时代的优秀女儿。乐老师曾经说：“在她蒙受一生中最大的那场劫难的



戴锦华教授

前夜，她从香山公园回北大的路上，迎着暴雨跑步唱歌，对下着暴雨的天空大喊‘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漫长的政治诋难丝毫没有改变她的性格，没有修订她的章梁。这就是我在乐老师身上学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做人、治学，对强者强，对弱者弱。不惧怕权威，不惧怕诠释，不惧怕拥有话语权和评判权的人的指责和挤压。但在同时，永远记住对弱者弱。不能乱用你的权力，包括你的话语权、书写权及表达思考的过程。

乐老师在学术上不断地让我们去探索前沿，这个前沿不是学术“时尚”的前沿，而是学科自身的限定。乐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接近学科的限定，尝试打破这个极限的可能性。因为乐老师的鼓励，让我始终坚持自己对于学术自身的思想含量，拒绝做一种重复性的学术生产。我要求自己每一次的学术生产都要真切地认识这个问题，以回答这个问题来展开与组织自己的学术。

但是这样的努力，经常把人带到边缘，甚至让人失望。进入北大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更辽阔的、丰饶的学术土地。但是，

也在进入北大之后，我不止一次地陷入思想和学术的困顿，不得不真实面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与困境。对我来说，这些困境不仅是学术的危机，也造成心理的崩溃，而乐老师每次都准确地感知到我的危急状态，用一种父亲般的态度说：“没关系，你去试吧，你去看吧！”甚至她一度担心我会采取过激行动，脱离学院。她也满怀不舍地说：“我不愿意你走。但如果你想透了，我不拦你。”

在乐老师的鼓励之下，我的学术在个人生涯中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在世纪之交，我开始踏上了第三世界的考察之路。不再选择欧美，不再选择熟悉的时间、空气，不再选择大学和纯粹的学术空间。我和许多社会学者共同组成了一个环团，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双腿、双眼，去走异乡，行万里路。将近十年的时间，我走了几百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这些地方不是大学，不是学术场域，不是旅游景点，它是腐地，是从林，是深山，是最底层的被忽略的人群。

十年的追索，在学术上，我遭到了完全的挫败。我曾经梦想寻找一个没有被西方所污染的第三世界，寻找一种源自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生产者与反叛者的纯净理论。而我用双脚所体认到的本质是：全球化。我也体会到了全球化是怎样残酷地以无孔不入的方式发生，并且将持续发生。

重新回到学术场域后，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宝藏。或许对同龄学者来说，我不足的地方太多，可我拥有完整的世界视野——不再只局限在欧美，而是放眼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广大的第

三世界。我不再只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世界里，在我看来，一个北大知识分子和一个纽约大学知识分子之间，其实已经没有多大差异。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了解那些在地的、不为人所知的、被人遗忘的纯真。第一次，我的生命获得充实感，我不再怀疑自己在空中楼阁或象牙塔里，或是一个只会自我复制的生产者。我相信，我是一个真实的人。

我跟乐老师学到更多的，是她对学生的宽容和严格，所以我努力地像她一样做一个严格的好师傅。任教这几十年，我不断地从学生“获得”，我不断地向学生学习，教学相长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空洞的事。今年我60岁了，我的学生为我庆生，餐会后，他们献给我一支歌，歌名就叫《Forever Young》。他们说，这支歌不是对我的祝福，而是对我的理解和评价。

永远年轻，不是一个祝福。我们不愚蠢，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衰老，会死亡。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一代人来一代人去，所以才要传承。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一个评价，因为这是一首摇滚，还是相当“中二”的摇滚。但是所有的摇滚，难道不都是“中二”的吗？所有的“中二”，难道不始终是这个世界的“发动机”吗？当年轻人不再“中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我也把这个这首歌、这个评价和这个祝福送给乐老师，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永远年轻，永不认输，谢谢大家！

（整理：何沁心）



老师对教育的传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志攀)



我是1978年考入北大法律系的学生，此前在天津拖拉机厂当工人。我读大学一年级的年龄比现在本科生毕业时还要大。

我在北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有许多老师教过我，每位老师都有其特色和方法，对我都有非常大的教益。因此，我对我的老师永远都心怀感激。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只讲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芮沐教授。我们都叫他芮先生。芮先生1908年生人，2011年去世，享年103岁。芮先生从海外归国后，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我父亲刚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我本科毕业到芮先生门下做研究生时，我父亲当时对我说，“芮先生可是我的老师啊！你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子，芮先生说什么，你听着就好了。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今天回想起我父亲说过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芮先生是经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朝代”的老先生，又受过挫折，见过的事情多了。不用说在今天，就是在当年又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有幸听到“三朝元老”说的话呢？

芮先生因为德高望重，我跟他做研究生时，除了对导师尊重外，还有紧张。因为每次见芮先生时，他不多说话，总让我说，他问。芮先生带我时74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大10岁，而我现在已经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了。我博士毕业时，芮先生已经八十岁了，但他身体和精力非常好，又继续带

了10届博士。现在，最后一届博士已经是我们这个学科的负责人了。

芮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方面有两个：一是，他要求收集资料必须查原文。芮先生早年在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教书，他的英文、德文、法文都很好。回国后50年代兴起学俄文，先生又学了俄文。

当时北大硕士生要求修第二外语，我学了日语，后来不用就丢了。直到我六十岁时，才重新开始捡起来。但是到今天我都后悔为什么没有按照先生的要求，多学一些外国语。如果从那时就坚持每天学一点，30多年下来，总能阅读几种外文资料了吧。

当时我还是不理解芮先生说上述话的含义。但是也不好意思问。直到前几年，我才慢慢悟出来：

每一种外语不仅是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只看英文资料，那主要代表英美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并不能代表法语系的国家，或俄语系的国家，也不代表西班牙语系国家的思想和文化。

法语在非洲有非常大的领域，西班牙语在拉美是最重要的语言，非洲和拉美国家与英美国家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俄语在独联体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及蒙古都十分流行。在孔子学院出现之前，俄语在世界的使用占比排在汉语之前。东正教与基督教文化有许多不同。更不要

说阿拉伯语系的穆斯林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与英美的分歧了。

在我重新捡起日语之后，感到我国媒体与日本媒体相互之间的误读非常大，而大部分误读的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当我们与日本学者沟通时，发现许多实际情况并不是媒体说的那样。如果中国人只看汉语对日本情况的报道，或日本人只看日语对中国情况的报道，那就麻烦大了。因为双方都不会多说对方的好话，多数会指出对方的问题。

微信上有说我国的“高层智囊现在认识到我国与日本的差距有多大”。我相信这应该不是真的。因为我国在日本的八万留学生以及近30万左右留学生家长，早都知道日本发展的情况。如果我国的“高层智囊”近几年才知道，那就根本不是“智囊”，更不会“高层智囊”了，因为太耽误事了。

过去常说：“多学一门语言，就相当于多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子”。现在我体会这句话更深刻了。例如，在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里，人是难以健康生活的。在只有一个窗子的房间，也是难以通风的。我们现在居住的单元房都不止有一扇窗子。再看写字楼的角房都是最贵的，通常是老板的房间。因为角房有两面窗子，可以同时看到两面的景观，视野宽阔。

作为芮先生的学生，我由于没有像他一样掌握那么多的语言，所以我看不到芮先生能看到的世界，所以我也无法深刻理解他说话的含义。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六十岁重新开始恢复学日语的原因。如果上天能让我多活几年的话，我肯定要像导师那样多学几种外国语



吴志攀教授

的。即便我在国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其他不同国家的母语网站，阅读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对同一问题寻找多种答案。

芮先生对我另一方面很大的影响，是他创立了一个新学科，国际经济法学。他很早就注意到跨国公司的情况，他推荐给我们学术的参考书中，就有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研究跨国公司的英文专著，其中一本名叫《跨国法》。当时在国际私法中跨国公司不是主体，主体是有国籍的自然人和无国籍自然人；在国际公法中，主体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因而都没有跨国公司这种情况。但是跨国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进入我国开子公司了，什么法律调整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呢？当时在我国经贸部称这种情况叫“涉外法”。但是涉外法还是我国的法律。跨国公司关系到总部所在国家和众多子公司所在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国际机构和双边协定，也已经有一些规则，调整跨国投资、劳工、

税收、外汇、补偿贸易、专利商标等方面的跨国法律关系。因此需要有新的部门法来研究这类法律，芮先生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法这门新学科。现在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劳工法、国际税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等已经从国际经济法中发展起来，成为多种新的分支。今天我国在国际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大国，在上述法律方面要研究和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复杂。一切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最早在理论上开始综合研究的倡导者，就是我的导师芮先生。

现在这些分支学科都在全国各法学院开课，招收专业研究生。邵景春和我就是全国国际经济法第一批博士生，当时全国只有两名，都在芮先生门下。后来我们两人都留校教书至今。今年我们两人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芮先生第十一届博士现在已经是法学院我们这个学科的负责人了。

第二位老师是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陆卓明教授，教世界经济地理课。我听过他两个学期的课，因为是旁听生，所以没有跟老师说过话。但是听课收获的教益，今天还影响着我。

陆卓明老师的父亲就是燕京大学最后一任校长陆志伟先生。陆卓明老师从小在燕园长大，由于父亲的原因，他的外语很好，视野宽广。还是由于他父亲的原因，使他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和压抑。他只能将聪明才智放在图书馆书堆里，埋头阅读，不能写论文，更不能发表，只有积累。

1980年以后，当陆老师重登讲台时，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终

于有了发表的机会，于是他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在80年代初从法律系到经济系去旁听陆老师两个学期的课，世界经济地理的教室挤得满满的，连窗台和讲台都坐着学生。他只能站在讲台的桌子前，连黑板都走不过去。他背到教室的自制的各种专业地图，都是递给黑板下的学生帮忙挂在黑板上的。

世界地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文化、国际外交与军事等多领域的知识交融在一起，如同潮水一样，一浪接一浪地向我们涌来，当时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应不暇接”。

我只听说过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近代的达尔文以及中国战国时期的墨子、北宋的沈括、明代的宋应星等，但是我亲眼见过上世纪80年代的博学多闻的陆卓明老师。虽然陆老师已经于1995年去世了，但是直到今日，他所达到的知识广度与高度，以及独立见解，至今无人企及。

陆老师对我的最大影响是，任何学科可以是有边界的，也可以是跨边界的，还可以是无边界的。如同微观世界和宇宙空间的边界只是我们探索工具的局限而已，当电子显微镜和射电望远镜，以及太空望远镜出现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微观更加微小，宇宙天体更加遥远。

陆老师在他的同龄人中，外语是佼佼者。由于他长期受压抑，只能在图书馆的书堆里广泛阅读。这些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利条件，都成为他得天独厚的知识探索与学术研究的优势。加上他本身

博闻强识、兴趣广泛的特点，使他横跨世界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多个领域，触类旁通。例如，在文化领域，他对西方音乐史的丰富知识，让音乐学院请他去讲课。在国际军事领域的研究，国防大学请他去做专题报告。30多年前，他提出的关于核国家的平衡理论，今天我们用来观察朝鲜和伊朗问题仍然有现实意义。

陆老师对于教学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热情，他的课影响了几个年级，数千学生。凡是听过他课的学生，后来每当说起时，无不赞赏至极。虽然陆老师没有那么多的论文发表，也没有那么多的专著出版，但他的课是无与伦比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超越。当陆老师走了以后，学生们写文章说“斯人已去，课成绝响”。

他的课让学生在学术领域打开眼界，让学生解放思想，广泛涉猎。他的课实现了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北大办学目的：“研究高深之学问，培养完善之人才”。他的课，更是在实践着蔡校长所确立的办学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我的这两位老师，以及其他教过我的许多老师们，与首富们比起来并没有很多钱，与领导人们比起来也没有权。但他们留下了非常独特的知识财富和精神遗产。从这方面说，与首富和领导人相比，他们毫不逊色。

我后来也做了老师，并一直努力效仿芮先生和陆老师那样做老师。但我的天分不够，难以望其项背。后来我又做了多年管理工作，尽管是“双肩挑”干部，还是不如单纯做老师那样有充足的时间投入学

术和教学工作。所以和老师们的学术成就比，越来越遥不可及。

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是两位老师的故事。我再次感谢我的老师。同时，我讲的也是我的后知后觉。这么晚才开始学第二外语，这么晚才开始关注其他学科的知识，已不可能触类旁通了。希望在座的各位，向我的老师学习，不要像我这样追悔莫及。

我要讲的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倾听。谢谢文研院给我这个机会发表，谢谢文研院的工作人员帮我整理图像资料。谢谢大家！

（撰稿：吴志攀）



2、领导讲话

传承即师承

(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启德)

感谢文研院的邀请。说实话，在这里讲话最没有底气的是我，因为我没有在北大当过学生。后来因为两校合并，才得以成为北大的成员。我唯一有一点点自豪的就是，我是北大的家属。

今天，围绕着“传承”的主题，四位老师的讲述以及乐黛云老师的视频，都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或者诗一般的语言，向我们呈现他们从北大、从老师们身上所得到的传承。几位老师的讲述，对于年青一代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传承的活动。“传承”本身道理很深，可以从人之所以为人、人的不完善性、语言的产生和可以从不完善趋于完善等方面来说，而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代际传承。但四位老师并未从哲学的高度和大道理来谈，而是采用了大家更能接受的故事，甚至如葛兆光老师、戴锦华老师这样运用诗一般的语言，将“传承”娓娓道来。

我们今天喜欢讲“诗与远方”，如果我们看2035或者2050年是“远方”，那么我们看回去几十年、看八十年代，又何尝不是“远方”呢？我们有过去的远方，有将来的远方，才有今天，这就是传承。



韩启德院士讲话

在老师们的讲话中，我也得到了很多启发，感受到其实传承是方方面面的。具体来说，我在两个方面体会最深：

其一，传承依靠传统。在北大这样一个地方，在燕园的土壤上，传统“润物细无声”，每个人不自觉都会受到影响。北大出来的学生就像北大，清华出来的学生就像清华，复旦出来的学生就像复旦。我们常讲一个故事：如果说要做一个椅子，

北大的学生会首先想为什么要做这个椅子，清华的学生已经在设计图纸了，而复旦的学生会想到这个椅子将来能赚多少钱。当然，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但至少说明，传统是潜移默化的，身处其中的人都会受到影响。我是上医毕业的，又在北医工作这么多年，如果让来自两校的二十个学生来一起开个会，下来我可以很自信的说“你是来自北医”、“你是来自上医”，误差不会超过一到两个人，因为每个人身上一定带有他的传统，这是传统的力量。

其二，传承依靠师承。传承与传统，是通过一代代师者而形成的。老师们要发挥作用，固然要大家能佩服他，要有本事，但这不是全部，老师还要有责任，要有爱。四位老师讲到的他们的老师，就肩负一种责任，对学生带着一份爱。比如戴锦华老师讲述的乐黛云老师，既包容但又严格，乐老师不断追求着她的“师者”使命，戴老师也不断追求着乐老师，这里面体现的就是爱和责任。我想老师对学生如此，学生也要尊重老师，乃至应该崇拜老师。吴志攀老师提到他父亲曾说“老师讲的都是对的”，面对这句话，今天的我们肯定也会有质疑，“什么叫老师都是对的，老师经常会讲错，并且随时可能会讲错”，但吴老师讲的是种精神。即便老师讲错，如果他精神是对的，从大的方面你也要承认他是你的老师。他在整体的方向上引领着你，再说你查到的知识，你认为他错了，你首先要看看，不一定。

在师承这个过程中，也有老师对于学生的尊重。现在有些现象令我们有点担心，有的老师责任与爱少了一点。方才几位老

师所讲述的他们的老师，很多老师我都认识，确实是满怀爱与责任的。而现在有些老师在外面做很多报告，出很多差，招了不少学生，但真正每个学生都能指导好么？现在有的老师把学生当做劳动力，学生做事功劳却全归老师，这种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我们的学生们呢？最近我看到的一些消息很令人愤怒：某校学生因老师质疑“四大发明”将老师告密、“挖坑设陷阱”。这种事情是不是就这一例呢？我想，如果师生关系搞成这样，我们是没办法传承的。

我们现在，跟上世纪八十年代来比，到底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来回答、来讨论。在“传承”活动中，我们得以看到，北大是一块肥沃的土壤，而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传承的任务。我们的国家要传承下去，我们的民族要有很好的传承，而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靠传承向前发展的，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我愿意在今后的时间里，跟我们的同学们、老师们有更多的交流。我想，北大不仅应是肥沃的土壤，也应该让它成为一块净土。

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

(整理：章涵青)



3、学缘报道

回望来路以谱新章，感念师恩以悟学缘 ——记“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



2019年9月20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传承系列讲坛是文研院的特色活动之一，旨在邀请人文社科领域的校内外学者讲述北大学术传承、治学机缘和为学理念，彰显文科学者代代相承的优秀学风和辈辈学人不断追求的骄人风采。过往举办的第一、二期“传承”活动，从青年学者的治学风华、师生感念，讲至几代北大学人的群像与历史视野。

适逢文研院成立三周年之际，本场学缘讲述则将视线聚焦于高考恢复、改革开放潮头的学者们。五位资深教授围绕“学缘传承”的主线，以录制视频和现场讲述相结合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求学历程与师承因缘，关切时代里的“小我”与“大我”。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院士出席并发表讲话。往期讲述人燕京学堂院长、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哲学系程乐松教授，艺术学院贾妍老师，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老师、往期访谈嘉宾中文系张鸣教授热情参与。此外，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文胜老师、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北大校友、文研院学术委员、工作委员、邀访学者、未名学者、院务会成员及二百余名

校内外师生现场聆听讲述。

1978年的春风里，已离开三尺书桌十二载的葛兆光终于等到求知的曙光，从贵州的家乡来到北京求学，度过了六年半的燕园时光。时至今日，他已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特聘资深教授。回忆起这段日子，葛兆光教授将其视作一条漫长的时光隧道：懵懵懂懂地进入，踏踏实实地行进，“直到离开北大的时候，我才确信我会成为一个学者”。禅宗、道教、古代诗文、中国文化，他以深邃的学术创见不断开辟出思想史研究的新天地，而其研究脉络，均走在北大学习的延长线上。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北大学人同时传承着三个传统：一为理想主义传统，在大转型的时代里高举改变中国的火炬，秉承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社会关怀；二为五四以来绵延的启蒙传统，在经典中求得新知，体会前辈启蒙思潮中的激烈锋芒与“理性的温和”；三为北大坚实的学术传统，在严格的学术训练中，在“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的氛围中进行自我探索。葛兆光教授嘱咐青年学人，需做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将专业的、学院的、严格的研究与社会关怀连在一起，将坚实的史料与宏大的视野结合，“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



传承活动主讲人与嘉宾合影

同样受到燕园人文传统的濡染，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将自己与北大的故事概括为一场“艺术因缘”。他1978年考入北大攻读国际政治，在赵宝煦老师和曹宝麟、华人德两位学兄的帮助与支持下，在社团活动的浓厚氛围中，他逐渐开拓着自己的艺术视野，汲取着古代文化知识，为艺术史研究一步步奠定坚实的基础。念起师友们的赠书和共同交流切磋的场景，白谦慎教授的脸上满含笑意；回忆在燕园求学的时光，他依然感念开放多元的思想氛围与活跃淳朴的学术风气，感恩师者引路、朋辈共进。而从燕园的沃土上走出，他也自然带着与一般艺术史学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与学术视野，通达游走于书法、艺术、政治学与古代文化，亦通过学理的分析，把艺术史、中国书法的价值延展到深刻的人文情怀与家国天下，从而引领艺术史与书法史研究。燕园八年的求知与探索，为白谦慎的艺术史研究晕染出多元、丰富而厚重的底色，使感性与理性、历史文化与艺术交融互通。而老师、同学、社团所给予的丰厚艺术资源，贯穿于他将艺术从爱好变为志业、从政治学转向艺术史的发展轨

迹中。经由北大学子之间的传统，延展出这段非凡的“艺术因缘”。将时间拉回到二十九年前的秋天，白谦慎由张充和女士引荐顺利进入耶鲁大学后，携妻拜访张充和、傅汉思伉俪。席间，张女士指着四个人动情地说：“我们都是北大的”。

交融汇通，兼收并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透过大屏幕，向在场师生讲述燕园风物，讲述1948年在沙滩红楼入学北大后的学习与生活点滴。综合的课程结构与广阔的知识涌流让她印象深刻，恩师的谆谆教诲令她记忆犹新：王瑶先生主张“想怎么说就要怎么说”、不惯于循规蹈矩、不人云亦云；汤用彤先生告诫她要打好古文底子；温德（Robert Winter）、沈从文、邓广铭、杨晦、胡适、季羨林等学者的人格与精神魅力，也使她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始终和善谦恭、踏实精进，即便遭遇挫折与劫难，依然迎风而歌。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乐黛云教授着眼于学术发展，思考着位于古典与现代、当代之交及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演进方向，以坚实的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一次次接近学科界限，积极

探索打破界限的可能性。在她看来，守先待后是那一个时代开拓者的群像，而多元的跨文化研究，则是比较文学人的梦想、追求与使命。如今，乐黛云教授年近九十却依然精神矍铄，抱有一颗永远纯净而年轻的心。

“乐老师曾经对我构成了超过偶像的魅力与活力，她召唤、重塑我对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她向我展示着一个教师的魅力、风采乃至一个学者的空间与可能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深情回忆恩师乐黛云之于自己的影响。在她眼中，乐老师开创的比较文学新领域启动了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潮流，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视野、方法，孕育着参与、介入、变革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受惠于坚守的“不变”与磨砺中迎向新鲜可能性的“变”，戴锦华教授在恩师的影响下，不断将目光投向学院的高墙以外，追寻质询、勇于超越。第三世界研究的十年求索，将她带向了完整的世界，得以拥抱真实的生命；而在比较文学的宽阔视域下，戴锦华教授也以包容可对话的研究方法，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在电影、文学、文化、女性主义等领域研究中“敢为先”、“常为新”。在讲述的结尾，戴锦华教授提到学生唱给她的一首“Forever Young”。在她看来，这首歌浓缩着不变的精神动力——永远年轻，永不认输，永不言败，永远热泪盈眶。

言传身教，师生相通。北京大学法学院吴志攀教授以“老师对教育的传承”为题，感念求学时遇到的恩师们。硕士、博士生导师芮沐老师在外语方面的博学与造诣，让他意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表达手段，还是文化的载体。芮老师凭借敏锐的判断观察跨国公司并创立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迎合着中国走向世界舞

台的发展大势。陆卓明教授修世界经济专业，经历了时代低谷的“沉潜”，在八十年代以厚重的知识积累与广博的学识交融影响着吴志攀教授。“任何学科可以是有边界的，也可以是跨边界的，还可以是无边界的”。在两位老师的启发下，吴志攀教授得以不断跨越边界的限制，广泛涉猎，触类旁通，并在国际金融法、经济法领域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吴志攀教授将两位老师视作“一代人的精神支柱”，并称他们留下的知识财富与精神遗产让自己受用一生。无论是教书治学，还是行政管理，吴志攀教授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将所得延续至后学。

讲述接近尾声，韩启德院士总结讲话。他将传承定位于过去与未来之间，“有过去的远方，有将来的远方，才有今天，这就是传承”。他所理解的传承，浸润于传统之中的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亦与师生之间的代代传统息息相关，蕴含着师者对于学生的责任与关爱以及学生回馈的尊重。以八十年代的北大为眼，可以洞见燕园学术土壤之肥沃，每个人身处其中都承担着传承的义务与使命——而在韩启德院士看来，北大不仅是肥沃的土壤，更是一方净土，继续孕育学子们澄净的梦想。

正如主持人杨弘博副院长在开场时所言，沐浴在八零年代春风中的北大学子，有着格外明亮、广阔而敏锐的眼睛。他们身处社会转型、思潮更迭的大时代，对现实报以更多的关切，并以加倍的努力服务于北大的教育与学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文研院始终秉承这一宗旨，追随前辈学人不息的步伐，为传承学脉贡献应有的力量，做北大精神的传递者。

（撰稿：章涵青）

（四）周年报道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春华秋实正三载。2016年9月2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揭牌成立。三年以来，文研院持续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立足北大优质的学术资源，凝聚海内外一流学术人才，推动跨学科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2019年9月，值此成立三周年之际，文研院延续既有传统，通过组织主题学术报告、学人讲述、跨学科对谈等活动，邀请学者畅叙旧谊，激活议题，共同见证文研院的发展。文研院学术委员、工作委员、邀请学者代表、北大相关院系、职能部门的领导及校内外师生共同参与上述活动。

9月20日下午，两场主题学术报告在二体地下报告厅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周其仁教授的演讲主题为“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他指出，当前一段时期，国家层面的全球化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还会非常顽强地向前推进，从长期来看上层建筑、国家权力这只手不会比底部的力量强，真正

强大的力量是底部的力量，是无数普通人的经济利益、是各地区间的比较优势、是人们的交流来往和互通互联——而这些底部的力量才是未来的确定性和希望所在。普罗夏松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他表示，圣西门的思想融合了作为学科基础的科学观、作为历史取向的进步观，以及维护最贫困阶层利益的道德观，展示出超越时代的敏感性，为人类勾勒出社会主义的明天。

20日晚，“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在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传承系列讲坛是文研院的特色活动之一，至今已邀请七位青年学者和六位资深学者分享他们的求学机缘、为学理念，展现了北大校园薪火相传的学术风貌，也彰显了文科学者的不断追求的卓越风采。本次活动邀请五位在人文社科领域备受尊重的资深教授，以录制视频和现场讲述相结合的方式，关切改革开放潮头年代的求学历程与师承因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讲话，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出席，副院长杨弘博主持。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校友会会长李文胜以及二百余名校内外师生现场聆听讲述。

文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资深特聘教授葛兆光回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求学的生活，将烙印在自己身上的北大印记概括为三条线索：1980年代北大学子共同流淌的理想主义传统、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及坚实的学术传统，以此提点青年学子们做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将专业的、学院的、严格的研究与社会关怀连在一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白谦慎教授感念母校开放多元的思想氛围与活跃淳朴的学术风气。来自老师、同学、社团给予的丰厚艺术资源，亦贯穿于他将艺术从爱好变为志业、从政治学转向艺术史的发展轨迹中，经由北大学子之间的传统，延展出一段非凡的“艺术因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透过大屏幕，向在场师生讲述了1948年在沙滩红楼入学北大后的学习与生活点滴，与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

科的奠基人，她时常关切文学演进方向，认为多元的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人的梦想、追求与使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生动讲述过去近四十年里，恩师乐黛云先生的帮助、提点、支持与鼓励。她不断将目光投向学院高墙之外，拥抱真实的生命，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在电影、文学、文化、女性主义研究中“敢为先”、“常为新”。北京大学法学院吴志攀教授以“老师对教育的传承”为题，分享了其对芮沐、陆卓明两位老师的印象，深刻体悟到学无止境、厚积薄发、触类旁通的意义，并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与传承延续到后学。最后，韩启德院士总结讲话。他将“传承”总结为传统与师承两条向前伸展的脉络，而“学缘”的流动中，既蕴含着老师对学生的责任与爱，亦包容着学生对于老师的尊重。在他看来，北大是学术的沃土，亦应是学术的净土。



全体嘉宾合影

21日上午，三场受到广泛关注的跨学科对谈分别在静园二院、二体地下报告厅举行，会场中座无虚席，连过道中都是人头攒动。“思想史与艺术史”论坛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主持。与谈学者围绕思想史与艺术史学科的融合与分野、艺术史的本体研究方法与现实转向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葛兆光教授指出，当今的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都将目光从精英世界转移到平民世界，学科交融和对话愈益频繁，但同时必须注重传承艺术史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白谦慎教授认为，运用思想史方法研究艺术史，既是现代艺术史学界的主流范式，也是出于艺术史同其他学科对话、扩大学科受众的现实需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文学与法学”论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冯象从《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案谈起，剖析了案件背后革命文艺与私有产权的冲突，以及市场条件下法律体系的局限性和话语权的缺乏。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回应，《红色娘子军》案触碰的是“通过文学的法律”的问题，即前法治社会文学发挥的社会规训、社会教育的“法律”作用。此外，“文学作品中的法律问题”也值得关注，即《圣经》等文学经典中对法律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人性的探讨。在“考古学与人类学”论坛上，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则从自身经历出发，回顾早年参与考古工作的体验，分析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以及现代不同考古路线和发展考古学的方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先后从民族志、比较

或历史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三个层次介绍了学科概况和学术传统，并认为中国有别于西方民族志研究偏好的“简单社会”，在研究领域具有特殊性。主持人渠敬东教授指出，人类学和考古学都以“溯源”为重要的学科讨论基础，但在当下缺少对学科史的追溯，这也是文研院希望深入开掘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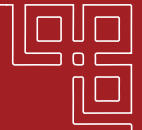
院有玉兰树，亭亭若盖。文研院扎根北大学术土壤，三年来以500余场跨学科的学术活动，积聚温热、沉淀思想，并将继续带着初心与使命，砥砺前行。

（撰稿：周诗雨）





文研学术



（一）北大文研讲座

136

王一丹 | 从《五族谱》看波斯人对欧亚诸民族的认知

2019年9月17日晚，“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五族谱》看波斯人对欧亚诸民族的认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评议。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迎胜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王一丹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核心文献——《五族谱》（*Shu‘b-i Panjāna*）。《五族谱》是13至14世纪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 Faḏl Allāh Hamadānī*）的作品。拉施特是伊朗伊利汗王朝的宰相，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和历史学家。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史集》（*Jāmi‘ al-Tavārikh*）在伊朗学和蒙古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有中文译本，也曾被多位历史学家称为“第一部世界通史”。此外，拉施特有关中国的著作还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伊利汗珍宝之书》（*Tanksūqnāma-yi Īl-khān dar Funūn-i ‘Ulūm-i Khatāyī*）和《迹象与复苏》（*Āthār va Ahyā*）等。可以说，《五族谱》是其史学著作的重要组成。

王一丹教授随后对《五族谱》标题的涵义和抄本进行了介绍。“五族谱”一词直译过来应该为“五世系”或“五系谱”，这里的“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指大致持有相同信仰的五个族群。《五族谱》现存的手抄本为孤本，藏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于1927年被土耳其学者（*A. Zeki Velidi. Togan*）发现。这位学者根据抄本字体特点和纸张特征证明该抄本写于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并将其称为《君王世系书》（*Ansāb-i Mulūk*），列入“拉施特作品目录全集”中《史集》的第三卷。在向听众展示《五族谱》的手抄本照片后，王一丹教授介绍了《五族谱》的研究状况。除了土耳其学者，日本学者对《五族谱》的研究比较充分，杉山正明、赤坂恒明等人都撰写过相关论文——有的论文专门讨论《五族谱》，而有的则和其他史籍进行对比研究。2011年以来，中国学者青格力、邱轶皓等人也加入了研究队伍之中。如今，北京大学《波斯文〈五族谱〉整理与研究》项目已结项，也为《五族谱》研究的推进做出了贡献。

王一丹教授随后重点介绍了《五族谱》的抄本结构及主要内容。该抄本共有228

叶（*folios*），整体分为六个部分。即1b叶至8b叶的“前言”部分、9a叶至64a叶的“阿拉伯世系”部分、64b叶至95a叶的“以色列子孙世系”部分、96a叶至148b叶的“蒙古世系”部分、149a叶至170a叶的“基督徒和拂郎世系”部分以及第171b叶至228a叶的“中国世系”部分。其中，“中国世系”部分篇幅

最大，共57叶；“阿拉伯世系”共55叶；“蒙古世系”共52叶；“以色列子孙世系”共31页；篇幅最少的“拂郎世系”仅存21页。该抄本的书壳、封里保存完整，留存有16世纪阿斯特拉罕君主的收藏章，但在“基督徒和拂郎世系”中有部分页数缺失。

在“序言”（*muqaddama/ dībācha*）部分，《五族谱》抄本首先按照当时的编写习惯，对伊利汗、阿里以及先知伊玛目等人物进行了赞颂。随后具体阐述了编纂理由、内容及结构、谱系绘制方式和体例，逐一介绍每个世系的编写规则。王一丹教授强调，每一世系的编纂体例都是不一样的，在谱系图的颜色、图形和线条方面都有不同的特色。序言确定了各谱系的编写顺序，并在之后的部分中较为严格地执行。

“阿拉伯世系”（*Shu‘ab-i ‘Arab*）部分以先知穆罕默德为中心进行编写，并将其世系追溯到穆罕默德的第49世祖先阿丹（*Ādam*）。抄本自人类始祖阿丹起始，止于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al-Musta‘sim*），包括六大世系：先知穆罕



王一丹教授

默德的祖先及其本人子孙的世系、四大正统哈里发世系、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世系、什叶派12伊玛目世系、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世系以及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世系。其中，穆罕默德的祖先及其本人画像以大正方形表示，阿里等12伊玛目的画像以双层圆圈表示，其他历代哈里发的画像以大圆圈表示。遗憾的是，该抄本中没有人物画像，仅有表示应当将画像置于何处的空白框。

“以色列子孙世系”（*Shu‘ab-i Banī Isrā‘īl*）部分则以雅各（*Ya‘qūb*）及其十二子的后裔为中心。始于亚伯拉罕（*Ibrāhīm*）和以撒（*Ishaq*），迄至雅各第十二子便雅悯子孙中最小的一位，即“波斯君王阿尔达希尔·巴巴康的大臣 *Markhāy*”。世系中也包括出自这一族的先知、君主和名人等等。在对以色列世系的记录中，拉施特指出其记述依据的是以色列部族之人自身在书本中的记载，“他们代代相传下来，我们也据此记录”。拉施特认为记述历史的正确方式，是依据各民族自己相信的历史来做记录，而不能妄作取舍或增减。他



的这种历史记述方式值得我们注意。

“蒙古世系”（*Shu'ab-i Mughul*）部分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先祖和后裔的世系，其中心就是成吉思汗及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以及托雷的世系。在他的子孙之外，还记述了各人的哈敦、妃妾以及异密（哈敦和异密分别指皇后和将领）。记述开始于朵奔伯颜（*Dubun Bayan*）及阿阑豁阿（*Alanqūa*），结束于伊朗伊利汗王朝君主合赞汗（*Ghazan Khan*），年代约为1304年。该世系的记录中使用了畏吾体蒙古文，可以与波斯文相互对照。编纂中采用世系柱的方式分割四大世系，并以圆圈和方框的符号区分女性和男性继承人，直观地表现了谱系关系。

“基督徒及拂郎世系”（*Shu'ab-i Nasara va Afranj*）部分记述罗马帝国历代教宗以及

其同时期的凯撒谱系。其起始页不幸脱落，遗失了标题以及第1至25任教宗和第1至26任凯撒的谱系，现存内容始自第26任教宗狄奥尼修斯和第27任凯撒瓦列良，终于第202任教宗本笃十一世和第101任凯撒阿尔伯特，结束年代大约也是1304年。该部分的编纂特点是教宗世系从右向左写，而凯撒世系从左向右写，按年代顺序将同一时期的教宗和凯撒并列列出。关于“拂郎”的翻译，王一丹教授指出，在拉施特之前，《道里邦国志》（*Ibn Khurdādhbih*）、《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和《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 Ma'ādin al-Jawāhir*）中都有相关记载，结合元代文献“拂郎、佛郎、富浪、发郎”的记述，可译为“拂郎”，以指代当时的欧洲人。

“中国世系”（*Shu'ab-i Khatay*）部分记载中国历代帝王谱系。其记述始于盘古，终于南宋最后一位皇帝宁宗（*Ninkzūn*）及金朝最后一位君主，历36朝，共305位正统君王。关于中国皇帝世系的记载和《史集》的记载基本保持一致。

关于《五族谱》和《史集》的关系，拉施特在序言部分提出，《五族谱》是作为《史集》的一部分进行编纂的。他在编纂完成《史集》后，认为该书卷帙浩繁，需要编纂一部便于人们在需要了解各民族的世系及概况时，能够查阅起来一目了然，因此才撰写了《五族谱》。因此，《五族谱》是对《史集》内容的概述和谱系式摘要。很多学者据此认为《五族谱》更像是《史集》的一个检索版。

在对《五族谱》的内容进行概述之后，王一丹教授介绍了《五族谱》及其研究

的意义。王一丹教授首先指出，《五族谱》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在蒙元史的研究方面，《五族谱》提供了波斯文与蒙古文之间的对照，有助于正确辨识和拼写人名，对于了解当时蒙古语的发音特点具有语音学的价值。同时，《五族谱》以谱系的方式编制了一张关系网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伊利汗国政治进程的切入点，将关系网络收拢于其合法性的根源——成吉思汗处。这种方式体现了用谱系编纂来接续政治合法性的做法，是“突厥-蒙古式”历史编纂实践过程中的一环。而《五族谱·拂郎世系》则揭示了罗马帝国与东方各民族的关系以及罗马与欧洲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从中能够看出罗马教宗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得以梳理出1304年之前罗马基督教发展史——包括七次大公会议、聂斯脱利派的诞生等事件在《五族谱》中都有所体现。此外，“拂郎世系”与13世纪欧洲的拉丁文史料《马丁编年史》（*Chronique de Martinus Oppaviensis*）也有诸多形式上的相似性，从这种对比中也能获得相应的研究价值。王一丹教授接着指出，《五族谱》“中国世系”部分的史料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它能够弥补《史集》中的一些缺失或失误，例如《史集·中国史》中尽管提到了中国古代的纪年方法，且没有出现相关图示，而《五族谱·中国世系》中则出现了《六十甲子》（*Jadval-i sāl-hā-yi shastgāna*）示意图，补充了《史集》中的记述，关于中国纪年法的描述也要比《史集》中更为准确。

王一丹教授表示，《五族谱》所反映的史学创作理念也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拉施特之前，波斯或伊斯兰的写史传统是将世界历史的起源纳入到波斯神话或《古兰经》的传说体系之中。而拉施特则违背了这一传统，他在编纂《史集》时尽量直接利用各民族的第一手资料，利用熟悉历史的对象国学者的帮助，同时利用通晓对象国语言文化的本国学者当翻译。《五族谱》所体现的多元文化特色与《史集》一脉相承，它体现了13至14世纪波斯知识分子对于欧亚大陆持不同信仰的五大族群的认知，体现了当时欧亚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它在反映波斯人认知水平的同时，更反映了一种态度：开放、包容、多元，对不同信仰、不同文化抱持客观、尊重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和预设的标准。有学者评价拉施特具有一种“早熟的多元文化主义”，“第一次具有了‘世界史’的宏大视野”。王一丹教授指出，这种开放包容态度的出现是与当时蒙古帝国的客观环境分不开的。当时伊利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是一个欧亚大陆上国际性的大都市，是多民族、多信仰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欧洲和东亚之间发挥着桥梁式的沟通作用。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之下才能够产生拉施特这样的史家。

王一丹教授最后展示了古代波斯书籍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元代《秘书监志》记载的包括《星纂》在内的诸多天文学、星象学书籍，以及明朝流传的《回回药方》等波斯著作都体现了蒙元时期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

随后，张帆教授对《五族谱》的相关状况进行了补充。他指出，该书的形式与

普通书籍不同，更像是一张“组织结构图”，与元朝的彩画宗枝有一定的相似性。而该书所反映的开放的、多元文化的世界观与中国古代封闭、自我中心式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部“全球史”。刘迎胜教授则认为拉施特为不同民族统治者做记录，这一编纂体例的“根”可能存在于中国。中国史家有编纂“四夷传”的传统，而拉施特的著作写于波斯与中国产生空前接触的

时期，如果说其写法存在一种先例的话，那么可以从中国找到。刘迎胜教授指出，元朝政府颁发给伊利汗国的“真命皇帝天顺万夷之宝”方印等史料能够为波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提供一些蛛丝马迹的线索。

讲座最后，王一丹教授就元代波斯文的发音问题和《五族谱》的材料信息量问题等与在场听众进行了交流。

（撰稿：孙晓斌）

137

波特伦·谢弗德 | 欧洲如何崛起——经济知识在制度构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19年9月18日中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洲如何崛起——经济知识在制度构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次讲座由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主讲。

“欧洲在近代如何获得霸权地位？”面对这个问题，谢弗德教授把目光投向了以往总被大众忽视的经济知识。在解释历史中的经济现象时，理论家和史学家们主要考虑的因素有：有利于海上运输的地理条件，中世纪晚期理论和应用知识的结合支持了技术和工业革命，国家间的竞争促进了学术交流以

及贸易商和制造商的崛起等等。但除此之外，经济知识——特别是一个人口群体在某个特定时期普遍占有的经济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经济知识让人们取得优势，”谢弗德教授认为，“虽然经济知识是抽象的，经济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很难以直观的方式得到验证，但它毕竟是‘有用’的。”

讲座伊始，谢弗德教授首先解释了传统经济史研究倾向于忽视经济知识的五点原因：

其一，经济知识一直以来都较少进入主流经济思想史的视野。比如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equilibrium），价格信号定义供需

平衡，这一假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韦伯看来并不是普遍有效的，一般均衡理论背后所依据的利润或效用最大化原则只适用于现代理性，在非现代的宗教和文化环境中是完全无法发挥作用的。所以，在韦伯看来，这些现代的经济理论不应被放到前现代的经济思想史中去考察。

其二，技术知识的光芒

掩盖了经济知识的贡献。如果说技术知识是实践的，而经济知识是理论的，那么在经济发展中显然是前者更为耀眼。比如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几次工业（产业）革命，便总是以技术知识的革新为标志。但是，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总是互相结合的。英国人在各种学科中总强调把观测性科学和应用性科学结合起来，但似乎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中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其三，传统增长理论忽视经济知识。“增长”（growth）在19世纪被解释为“资本积累”。但按照今天的看法，资本积累其实只是生产力增长的一个小的方面，如人力资本优化、产业集聚等经济理论的发展其实都是生产力提高的内生原因。然而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这些方面并不会被考虑到。

其四，较早时期的经济知识多为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难以研究——这也是经济理论常被称为“马后炮”的原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会经济有一定了解，并采取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措施，比如商人会有计划地涨价、降价，即便他们可能完全没



波特伦·谢弗德教授

有听说过相关经济理论的名字。但是在当代，我们确实有更多人“知道了”更多的经济理论，大众对经济知识的了解已然有了显著进步，这种不同时代间经济知识状况的差异或许也会为我们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最后，经济思想容易被误解为是过时的。由于经济理论具有“隐性”“马后炮”等特征，总会被人认为是过时的——因为当这些理论成为显性时，就早已过了它真正产生影响的时代了。但是，谢弗德教授强调，经济思想或经济理论不仅是对经济现实的合理解释，它本身也构成了经济现实。换句话说，所谓的经济现实正是在动态变化的隐性和显性经济知识的交替中构建起来的。

接下来，谢弗德教授以德国经济学传统中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例进行了阐述。“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来自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Ordo liberalism）。其代表人物欧肯（Walter Eucken）认为，国家干预市场时不应直接介入市场的运行过程，因此使用监管政策（Ordnungspolitik）比使用程序政策（Prozesspolitik）更好。奥尔多自由主

义的后继者米勒·阿玛克（Müller Arack）则进一步提出，国家在“监管”与“程序”之间具体应停留在哪步其实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妥协。此外，除了经济理论本身的创新与发展，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策背后经济知识的理解也极大影响着国家调控政策的落实。因此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个国家经济知识的发展水平，会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因素。

在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方向后，谢弗德教授介绍了一些历史上有关经济知识重要性的实例。

首先是欧洲各国在德国传统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联合起来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ies of Maastricht），确定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后总的监管框架，来平衡各国生产力差异可能对货币造成的影响——这样一种政治预判显然要归功于之前经济知识的积淀与发展。可以看出，当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时，经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愈加得到彰显，而隐性的经济知识变成了显性，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也必然要随之得到革新。

此外，较为经典的例子还有19世纪英格兰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李嘉图（Ricardo）在1824年提出了“建立国家银行计划”，皮尔（Peel）于1844年通过了银行法案，该法案对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和贷款交易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和限制。那时，在国家银行成立之初，英国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在质疑中央银行权力的合法性，但最终历史已经验证，国家银行是每个国家步入现代经济体系的必经之路。

谢弗德教授还提到了16世纪的撒克逊货币争论（Saxon currency dispute）与更为古老而长久的高利贷争论（usury debate）。在这一部分，他对高利贷争论着墨较多。高利贷争论起源于西方古代传统中对“获取额外利益”的抵制，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谈到高利贷是“不自然”的，不符合“美好生活”的目的——美好生活即足够家庭所需的生活，因此在必需品之外，单纯为了“增多”而获得的利益就是“不好”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也批评“利息”，甚至不主张商人在出售货物时标出高于其价值的价格。直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仍然对利息持批评的态度，民众也普遍认为靠放贷获利是邪恶的事情。但其实与古代相比，这一时期的态度已有所松动。托马斯虽然不认可资本具有“钱能生钱”的生产性功能，却允许借款人向贷款人赠与货币以外形式的礼品来表示感谢，且如果借款人逾期偿还，贷款人还被允许以“损害原因（damage cause）”要求增加偿还的钱数。托马斯甚至还承认“投资收息”的正当性，因为在他看来，投资是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专业放贷是不一样的。到晚期经院哲学时期，借贷产生的“风险”已经为大众普遍认可，人们开始意识到，贷款人把自己的钱借出去，其代价是他自己缺少了这笔钱来赚取利润，因此借款人有义务在偿还自己债务的同时也为贷款人所担的风险和沉没成本付出应有的报酬。到这一时期，基督教终于放弃了对利息的实质性批评。

在这场长达两千年的高利贷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盛行的不同经济思想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有着巨大的影响。只有将

公平的生产性贷款从不公平的高利贷中区分出来，良性、有序的资本积累才能展开，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才有可能出现。也正是在这一历时长久的争论中，出现了诸如“公平价格”“公平报酬”“资本”“利润”等基本经济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当时的其他先进文明中是没有的。

最后，谢弗德教授总结道，德国本土后期的官房主义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与晚期经院哲学有重合之处：前者注重国家经济、对外贸易、就业发展等，后者注重金钱和税收——他们都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开辟

了道路。谢弗德教授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假设，“与欧洲文明相比，非欧洲文明是否错过了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经济知识的学习过程？”例如东亚国家一直以来都对高利贷问题不感兴趣，因此不会产生高利贷争论，也就不会刺激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伊斯兰国家则是从始至终都坚持教条中对利息的批判，没有像基督教一样在经济伦理方面做出改变。谢弗德教授提出的问题也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思考。

（撰稿：孔博琳）

波特伦·谢弗德 | 随机系统中的“价值转形问题”



2019年9月25日中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随机系统中的‘价值转形问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聂志红评议。

讲座伊始，谢弗德教授简要梳理了有关“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的学术史。价值转形问题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便提到，商

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构成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接受并进一步发展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将商品的价值与商品推向市场所需的时间相联系。而后，马克思（Karl Marx）在前人探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剥削，并将利润和资本有机构成联系起来，提出“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利润越低”的著名论断。1885年，恩格斯提出了“转形”问题的“有奖竞赛”（Prize Essay Competition），德国经济学家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美国化学家彼得·法尔曼（P. Fireman）等学者纷纷试图解决“转形”问题。1894年，《资



本论》第三卷出版。马克思在书中指出劳动价值和价格间的两种关系：总价格等于总价值（ $C+V+M=K+W+P$ ）；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 $P=M$ ）。因此，在以价格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商品经济中，劳动价值论依旧成立。此后，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直接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论，而鲍特凯维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等学者继续就马克思所涉及的“转形”问题提出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值的各种解式。待到1960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设定一种标准商品，试图从商品生产的某种数量关系得到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受斯拉法的启发，梅迪奥（Medio）、谢赫（Shaikh）、弗利（Foley）等继续尝试给“转形”问题提供新解释。而

谢弗德教授将尝试从随机系统视角为“价值转形”问题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谢弗德教授认为，欲解决“价值转形”问题，我们需要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学说关于生产价格的争论谈起。庞巴维克坚信，正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建构的古典政治学体系所提出的，长期市场价格将趋向于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李嘉图学派（Ricardian）认为，当利润率上升时，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商品价格而言将会下降。这是因为在假定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当利润率上升时，工资率将会下降，资本密集型企业所生产的商品将会变得更昂贵，工资成本下降，由此该商品价格中将包含更多的利润。

庞巴维克认为，一旦给定技术条件和真实工资，那么也就相当于给定剩余部分，由此利润确实是由剩余价值所决定的。然而，在资本预付和结果均衡的条件下，他否认资本对确定利息的要求。他认为，当假设技术可变时，利息将决定迂回生产，上面两个说法方才成立。而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追求剩余价值，但他并未给出一个公式用以说明在利息率给定的情况下资本将会供给多少。通常情况下，长期价格用于评估产品其他替代生产过程的获利情形。一旦社会必要技术（马克思视角，socially necessary technique）或者获利最大技术（新古典经济学视角，most profitable technique）普遍运用于生产中，个人劳动利润率同样会趋于一致。此外，人们通常将工资预付情形下斯拉法所讨论的价格视为自然价格的解析重构，而不是采用马克思有关自然价格的理

论。其原因具体包括：其一，价值形态理论在斯拉法的价格体系中不可复制；其二，用于预测价格的劳动理论是多余的；其三，马克思的价值变形似乎存在矛盾之处。斯拉法在1927年撰写的文字材料和1932年4月写给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拉贾尼·帕尔姆·杜德（Rajani Palme Dutt）的信件中都曾提到，马克思的讨论过于形而上，需要用另一套相对易懂的话语体系加以言明。

鉴此，谢弗德教授开始阐述他对“价值转形”问题的新解释。他认为，他的解释可以消除人们对价值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价值变形”矛盾之处的疑惑，但并未解决“价值变形”讨论是否多余的问题。价值形态理论必须就其自身好坏加以评判。我们可以从定义出发，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然而，马克思却是用特定的模态逻辑（modal logic）讨论价值的相对形态。人们无须同意或者部分同意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理论，但这种赞同或怀疑并不涉及“转形”问题本身。同样，人们无须同意或部分同意马克思的商品货币理论或者资本主义难以从中解放出来的说法，但这种同意或否定并不涉及“转形”问题，因为李嘉图假设表明黄金的价值价格和生产价格是一样的。而资本拜物教作为价值形态理论的终点，取决于“转形”问题的解决。

谢弗德教授强调，从价值到生产价格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关注数学中的理性核心，并从矛盾的视角看待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问题。物理学家倾向于区分物品的不同维度区，譬如给定水的质量，水凝结成冰的体积会比水本身的体积要大；经济学家则区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

马克思则将使用价值视为价值相对应的表现形态。譬如，在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 $P=M$ ）的式子中，总利润就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态。利息作为资本的价格，同样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形态。商品拜物教只是对资本拜物教的排斥。马克思在此处仅仅是强调资本主义的神秘性。假设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的比值，那么资本的竞争最终将导致利润率的等同。故而，在加总式 $P=M$ 中，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是和形态的双重变化联系在一起：其一是从价值到价格的转变；其二是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变。由此可见， $P=M$ 这一式子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关键。

谢弗德教授认为，这一式子实际上具有如下四重角色。其一，它是马克思主义解释阶级斗争的基础。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幻觉是通过价格加成实现的，然而这一幻觉终将散去。其二，它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并通过劳动价值论发挥作用。按照唯物主义的逻辑，追求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若价格和价值不一致，那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将是不确定的。其三，马克思认为他能通过包含 $P=M$ 的过程，从价值的角度预测价格，而不是直接从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进行推导。这显然不同于现代经济学的探究方式。其四，价值形态理论的终极结论便是 $P=M$ 。

紧接着，谢弗德教授以模型推演和数学推导的方式进一步阐述他的解释思路。假设存量纺织业和钢铁业两个部门，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剩余价值率相等，而两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马克思认为，在从价值价格到生产价格的转变过程中，剩余价值被重新分配，即出现资本家的共产主义

(communism of the capitalists) 现象。然而，这一过程中，成本价格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将如何证明等式 $P=M$ 成立呢？

谢弗德教授首先作出一番假设。按倒推法的思路，(1) $P=M$ 和 (2) 剩余价值率 = 利润率两个等式的成立有赖于如下两组等式成立：(假设 1) $C+V+M=K+W+P$ ，(假设 2) $C+V=K+W$ ，其中 C 表示不变资本， V 表示可变资本， M 表示剩余价值， K 表示资本成本， W 表示工资成本， P 表示利润。假设 1 定义计价标准，可通过现金流加以证明；假设 2 的等式有待进一步验证，因为 $V=W$ (可变资本 = 工资成本) 不具有直观的说服力，或许可结合预付现金的假设加以证明。

总之，谢弗德教授认为，马克思通过假设总产品凭借转形过程是按固定数量黄金流动的方式实现，由此将价值转变为价格的“转形”过程和他的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在黄金行业的有机构成等于总产品有机构成的情形下，这一想法是成立的。因此，在证明过程中，我们务必需注意李嘉图所提到的“不变价值标准” (invariable standard of value) 的条件。谢弗德教授借鉴了斯拉法的相关研究思路，引入斯拉法的价格体系及其工资体系，并强调在给定使用一种技术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工资率正好等于斯拉法工资率的 $1+r$ 倍。通过斯拉法的标准商品和价格体系，我们可以将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写成关于工资和利润率的函数表达式。通过利用这一函数表达式，原来的利润率表达式便可以写成有关利润率的表达式，进而求解均衡利润率。至于剩余价值率等于利润率的证明，谢弗德教授提到，平均而言，所有企业将采用相同的比例使用所有投入品。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考虑用随机系统加以证明。因为所有投入矩阵的特征值不同，除了第一个特征值外，其他的特征值都将趋于 0。为此，尝试用随机系统 (random system) 将有助于我们证明这一设想。总而言之，如下三个假设均可通过数学推导证明其稳健性：其一是，存在足够大维数的随机矩阵，其非线性特征值很小；其二是市场活动水平与劳动不相关；其三是剩余价值向量与劳动向量不相关。由此，通过将相关的向量表达式代入一开始的利润率矩阵等式中，我们便可以得到 $P=M$ 成立所需要满足的相关条件。

谢弗德教授表示，他的观点与斯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均认可马克思的相关论断均是建立在商品总构成包含着随机选择的假设基础上。当然，在具体阐释过程中，他们与马克思的说法有着细微却具决定性作用的差异。例如，马克思假设工资和利润大致包含了标准商品的数量。然而随机系统中所求出的解便是正解，我们无需特别强调平均情况。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熵 (entropy) 是否足够大，或者还处于不断的成长中？

最后，谢弗德教授就本次讲座作一个简单的总结。他希望自己所求出的“转形”问题新解不会对新近其他有突破的“货币”新解带来某些“冲突”，毕竟“转形”问题还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相关联。此外，我们不能据此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开始意识到的问题，即以价值计的产品成本和以价格计的产品成本是不一样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所求出的“新解” (New Solution) 是一个完美解，因为求解过程中可变资本等于工资成本的假设实际上很难成

立。至于必要性问题，谢弗德教授则表示，劳动价值并非是产品价格计算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产品价格必须通过使用价值的结构推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需要重新计算，我们并不能将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和原材料价值直接相加，但我们需要根据那些熟练工人的劳动加以重新计算。谢弗德教授还进一步提到马克思《资本论》中部分重要结论的发展与深化问题，譬如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存在剥削他人的情形、“资本家”的面罩下企业家精神的角色与作用等。

聂志红教授对本次讲座作简要评议。他认为马克思所提到的“转形”问题实际上涉及“二次转形”，即从社会价值再到生产价值的转形，最终是为了证明总利润等于总市场价格，商品总价格等于商品总价值。而谢弗德教授从“随机系统”的视角讨论“转形”问题，这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为我们分析和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讲座最后，几位老师同在场师生就动态情形下的资本品价值等问题进行讨论。

(撰稿：沈博)

波特伦·谢弗德 | 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



2019年10月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 (Bertram Schefold) 主讲，文研院访问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周绍明 (Joseph P. McDermott) 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出席并参与讨论。

谢弗德教授首先从1847年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 (Bruno Hildebrand) 与共产党人在伦敦的会谈切入，讲述他缘何关注古希腊雅典的问题。希尔德布兰德最负

盛名的著作是1848年出版的《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学》(Der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他在该书中根据交易方式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分为自然经济 (barter economy)、货币经济 (monetized money) 和信用经济 (credit economy) 三个阶段。此外，他论及经济史观中的“系统”和“方式”，并对古典时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探讨。1847年，他本想去伦敦面见马克思，然而终究只见到其他共产党人。在相互讨论中，他们认同若将奴隶换成机器 (machine)，那么古典时代的雅典就是一个理想社会；然而他们在如何引进机器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即我们应当通过国家还是通过市场将机器引入社会。

由此，谢弗德教授抛出问题：经济法则四海皆同吗？从直观的角度看，历史中不同社会存在不同形态，不同社会形态间存在一系列明显转变。在古典经济学派（特别是大卫·李嘉图）看来，经济学理论具有唯物主义、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特征，历史中经济社会的发展遵循着抽象的自然“经济法则”。历史学派则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看法。譬如，英国历史学派代表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力图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替代李嘉图的抽象演绎过程；德国历史学派代表罗雪尔（Wilhelm Roscher）亦强调用历史方法，通过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发现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和规律。

谢弗德教授简要梳理了当时历史学派对古希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视角。阶段论是当时历史学派讨论人类社会演化问题的常见方法。阶段的划分主要基于技术差异，此外还会考虑交流方式和能源使用上使用的差异。不过，对于演化的具体过程，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譬如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国民经济学家毕歇尔（Karl Bucher）根据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将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家庭、市镇和国家三个演化阶段，暗示了经济发展往更高级的社会存在演化；马克思·韦伯则认为精神和制度的理性化历程贯穿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程，文明的发展并非仅有唯一道路，由此突破 19 世纪末关于古代社会经济史的争论。此外，“经济系统”是人们分析人类社会经济演化的另一视角。不少学者从计划与市场两个资源配置方式看待经济秩序和组织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不少争论。德国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认为经济过程总是在一定经济秩序



波特伦·谢弗德教授在静园二院

框架内运行的，我们需要从具体的体制形式、货币制度和经济形式等去刻画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总体形态。在竞争秩序中，利润和增长构成企业层面的竞争形态；而国家之间的竞争彰显机构层面的强弱之分。

“经济风格”是历史学派所强调的又一重要内容。他们更多地从经济精神、自然和技术基础、经济构成、社会构成和经济动态等角度进行讨论。谢弗德教授结合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竞争、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以及兼顾效率原则和重新分配的德国市场经济等案例进行讨论，并据此强调，风格（style）并不是通过所有事物的同质化来得以确立的，而是通过处理对立面的程序得以确立的，不同领域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并行发展，即出现所谓的“共同进化”。通过上述的讨论，谢弗德教授归纳总结了经济学家的概念性工具：在理性知识的前提下形成初步的理论并对其进行抽象化，在基本经济结构的理论构想中提炼相关实证结果，在文本证据基础上对结果进行理解和描述，最后通过实验佐证相关说法。

进一步地，谢弗德教授提出如下的类比说法，即经济理论史之于经济史就好比古代文字材料之于考古学。无论如何，深入探究希腊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希腊经济史与中世纪、早期现代性和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以毕歇尔（Karl Bucher）、芬利（M. I. Finley）等为代表的“原始论”者认为，古希腊社会中家庭基本上自给自足，市场和货币是发挥从属作用，礼物馈赠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沟通方式；而以迈耶（Edward Meyer）、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等为代表的“现代论”者则认为，商业实体、银行和长途贸易构成的生产形式可以与近代早期文明的发展相比较，并由此解释从古希腊到希腊化时代罗马的演变。类似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谢弗德教授希望通过挖掘古希腊经济思想中的诸要素为上述争辩提供更多解读。他首先讨论荷马的史诗文本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解释。荷马史诗中记叙大量经济现象，而亚里士多德则对类似经济现象提供相关的分析与解释。譬如，荷马史诗中提到家庭是一种生活形式，而亚里士多德将家庭视为当时社会的生产中心；荷马认为成为奴隶和自由的丧失是命中注定，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难题；荷马提到赫菲斯托斯的青铜女仆，而亚里士多德则在讨论“自动琴弦”问题；荷马史诗叙述商家的贪婪，而亚里士多德则探讨财务之术；荷马史诗谈到当时人们致力于手工技艺，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们依靠自然获取所需。总而言之，从当时青铜器上有关鱼市和手工作坊的绘画可见，古希腊社会已存在诸多经济活动。

进而，谢弗德教授结合柏拉图和芝诺的思想讨论古希腊的城邦形态、政府和经济转变。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曾提及“猪之城”（The city of pig），认为公民个人很难实现自给自足，需要依靠他人的服务满足自己生存，和平共处、分工合作成为构建“猪之城”的基础，内部公民仅停留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阶段。然而，“猪之城”并非城邦演化的终极状态，其间必然经历非正义大量存在的阶段，由此引出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思考。“理想国”存在“哲学王”。由于“哲学王”难以事必躬亲，基于品质的劳动分工会更多，守卫者的社群主义成为维护城邦共同体安全和财富的重要支持。不过，晚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则阐述一个次等理想国，此时形成有再分配的财产私有制。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在与柏拉图《理想国》同名的著作中提到“普世秩序”，奴隶和货币都不再出现其中。

随后，谢弗德教授简要讨论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经济思想，具体包括持家和财务之术、交换理论与货币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获取财富主要包括持家之术（governance of household）和获取之术（art of acquisition），后者包含自我获取之术（art of self-acquisition）和理财学（chrematistics）。此外，亚里士多德主张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和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其中，分配正义表明分配结果取决于社会各阶层的构成，交换正义则意味着交换过程的等价性。至于交换与货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主张交换过程中无论是出于对工作的认可还是出于需求的考虑，都必须在法律上和货币数目上

实现等价原则，而货币在其中则充当交换工具。不过，不像柏拉图从唯名论角度看待货币，亚里士多德坚持金属本位制。

此外，谢弗德教授介绍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与西塞罗的《论义务》。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到，管理家政的人可以获得高报酬，而家庭女主人可以协助管理家里的奴隶、女仆和其他物品，此外还提到苏格拉底对高尚人士伊斯霍玛霍斯盈利行为的谴责。他还谈到，农业生产可通过观察掌握诀窍，但看穿银币好坏的技能并不相同。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进一步阐述，当铜匠人数变多时，他们就会选择放弃该职业，因为此时铜产品不值钱，类似情况存在于铁匠群体中。然而，对白银而言，若人们未曾获得大量白银，不会大量使用白银；当有人开始获得大量白银时，那么人们倾向于使用白银而非收藏白银。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则强调服务的重要性。服务的提供一部分是为了国家，部分是为了公民个人。为提供公正的支持，我们必须给出有关财富和感恩的建议。私人社会支持和交换服务以获得政治影响力对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随后，谢弗德教授还介绍了古希腊社会中的“银行家”（Trapecites）以及独特的祝祷仪式（Liturgies）。当时的“银行家”并非哲学家们所希望探讨的对象，我们只能通过演讲家了解他们的工作。这些“银行家”提供储蓄和贷款服务。在早期现代性中，人们并没有明确区分收取利息是因为机会成本的问题还是风险报酬的考虑。但是，人们倾向于认同“银行业”从别人的钱物中获得风险的回报。至于祝祷仪式，在演说家吕西亚（Lysias）、德莫斯提尼（Demosthenes）和

忒奥弗拉士特斯（Theophrastus）的言语中多次强调富人的自发行为。在雅典社会中，公民拥有的财富包括可见财富和不可见财富，可见财富有房屋、土地、橄榄树等；而不可见财富对应富人的信用余额。除了规模较小的官方机构外，公民以祝祷仪式的形式分担各自的任务，富人们也会自发地参与到公共服务事业中，城邦的公共建设有赖于富人们的支持。譬如，富有的市民会自发前往剧场组织一个唱诗班，甚至自发地支持城邦的战争。谢弗德教授展示了古典时期战舰、狄奥尼索斯剧院等图像，佐证当时祝祷仪式对城邦发展的重要影响。当然，城邦的国家机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并非毫无意义。谢弗德教授简要介绍当时希腊城邦的一些经济政策。比如，伯利克里曾通过修建雅典卫城处理当时就业问题；古希腊同样关注资源调配策略，多强调促进进出口对增加收入的重要意义；从赫西奥多斯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人们一方面担忧人口过多，另一方面也害怕人口减少。

在介绍古希腊社会诸多经济思想痕迹后，谢弗德教授讨论现代经济概念运用于古希腊社会经济分析的局限性问题，诸如均衡、使用价值、需要、农业价格、受工业品价格、国民账户、货币、白银和信用、收入分配、增长和危机等。在古希腊社会，均衡可能是通过供求关系求得，但市场出清往往也是按照习惯性价格而实现；至于使用价值，若商品使用价值未进行标准化处理，那么就无法统一市场中的价格。当时所谓的“需要”并非如今经济学所讲的个人的边际效用，而是由传统和角色决定需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需求并不涉及奢侈品。对于农业价格而言，当时农产品价格更多地取决于收获的程

度，在生产者需求得到满足后，剩余产品才会进入市场。然而，手工业产品价格却不同于工业品价格，只有少量的作坊主存在于市场中，并不能发挥规模优势，而由于奴隶劳动强度的变化，生产成本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凡此种种问题均需要我们在用现代经济概念解释古希腊社会经济活动时稍加注意。

谢弗德教授进一步从理性化视角分析古典经济活动与现代性经济活动的区别。按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经济理性化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因为它已经将家庭和企业经营区分开，家庭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古希腊时期的家庭则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结合。此外，一般理论并未关注到个人同时所具有的多重身份，身份归属事实上使理性行为变得不可能。而韦伯则以“铁笼”（iron cage）的比喻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角色冲突”的减少，因为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成为囚禁人性的铁笼。不过，古典时期家庭经济活动更像是一个企业，妇女和奴隶的角色转变为传统经济带来理性化的压力。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北方对奴隶制的不同态度俨然表明这种压力，诚如韦伯所言，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限制现代理性的形成。

由此，谢弗德教授认为，韦伯的“理想型”涉及对现代性的区分。大致而言，古典时期表现为典型的政治资本主义，当时并不存在理性经济与奴隶并存的情形，纵然到庄园经济阶段亦是如此；而大发现时代则表现为典型的冒险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人们普遍缺乏清教徒式的禁欲精神和储蓄、投资企业的稳定意愿。由此，重商主义和历史学派倾向于将经济学视为一门道德科学；而分析

学派与功利主义者则倾向于将经济学视为现代性主流。现实世界存在多种因果关系，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往往是并行发展并影响现实世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社会经济就是开放式发展，因为经济系统必须实现再生产。欧肯（Walter Eucken）认为经济系统应涵盖经济精神、自然和技术条件、经济制度、社会契约和经济动态等方面；克洛克（Kasper Klock）则认为应包含国家理性、人性、国家法律、人民状况和国家收入等内容。显然，经济风格的一致性扎根于社会的政治和历史之中。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由此重新思考雅典和斯巴达、希腊和波斯对立存在的问题，并从中寻找“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折中想法。谢弗德教授最后总结道，就本次讲座的讨论视角而言，经济学实则人文科学的一部分。

张亚光副教授首先对本次讲座进行评论。他认为，本次讲座在文献和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为我们探究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带来诸多新思考，同时也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前沿观点和方法。谢弗德教授所提到的经济学普适性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确实值得商榷。周建波教授则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理论源于西方，西方在长期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他看来，谢弗德教授论及古典时期商业现象，为我们看待工农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提供新视角。最后，在场师生还就中西方“市场观念”的差异、服务与城邦最优规模、家族在中国古代市场中的角色等问题发表看法、深入交流。

（撰稿：沈博）

138

白谦慎 | 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因素

2019年9月1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因素”。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白谦慎教授从事收藏史方面研究，关注收藏品递传、古董市场价格、收藏与艺术和学术的关系、收藏家财力、收藏活动的社会及心理机制等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白谦慎教授便已展开“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这一收藏史研究计划，先后完成了约二十篇相关论文，并将整理成书。两年前，他曾于文研院以“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为题发表演讲。今日的讲座承续前讲，继续围绕吴大澂及其友人，讨论晚清收藏活动的社会网络因素。

哪些社会网络机制影响着收藏活动？白谦慎教授以2014年一起围绕吴大澂所作《顽石图》的真实交易为例说明，通过现代的互联网、新交通方式及金融支付手段，在专家资讯、支付机构和运输机构三方配合下，一次跨国艺术品交易可以在四天内迅速完成。由此可见，信息传播手段、支付手段和运输手段是收藏活动中的三个重要的网络因素。

白谦慎教授希望通过研究，揭示出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上述三种社会网络因

素的具体情况。进入正式讨论之前，他先对讨论对象作出界定：首先，同城交易相对简单，基本上不存在票号、运输等问题，此处讨论的是异地收藏活动；其次，此处讨论的收藏品主要是金石而非书画。在明确了讨论范围后，白谦慎教授便以此对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的“信息”、“票号”、“运输”展开分析。

一、信息

以吴大澂为代表的晚清官员，拥有庞大的人际和信息网络，为收藏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吴大澂曾于1893年至1897年间出任陕西学政，旅陕期间，广收古物。离开陕西后，他依然委托在陕友人和文物商打探消息、购买古董，因“关中所出皆土中原物，价亦最廉”。他在陕西的联络人，包括官员韩惠洵、韩学伊父子，古董商杨秉信、苏七，文人收藏家赵元中等。此外，吴大澂还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铺（如含英阁的胡子英、德宝斋的李老板）、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裴仪卿以及苏州文物商徐熙往来甚密。人际网络不可谓不广。

在古董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晚清时人十分重视信息的获取和保密。吴大澂的友人盛昱致信一西安古董肆，欲购买扶风新出土大鼎，云：“某字百内外酬五百两，三百内外酬一千两，真到六百四千两，货

到钱回，绝无反悔，事须机密，勿使人知。”这说明，当时收藏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为争得先手，要严密保护自己的信息来源。

信息传递的可靠性和速度，与收藏活动的活跃程度和规模有很大关系。谁能及时获得准确信息、尽快下手，谁的收藏规模就有可能快速扩张。在吴大澂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电报，但获得异地信息主要还是通过信件。虽然普通百姓寄信并不容易，但官员却可利用官方邮递系统方便、快捷地传送信息。吴大澂的老师、著名收藏家吴云在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给正在湖南任官的吴大澂的信中便说：“往后惠书，只须用马封递，有抚、藩署转交。既快且稳。”正因拥有如此优越的信息传递资源，吴大澂等高官在收藏活动中占尽先机。

晚清正处在中国邮政发生重要变革的前夕。此时的书信往还，除了托友人捎带、专足送达官驿传递等方式，一些大的钱庄、票号、洋行也兼理传信。1878年，海关开

办邮政，各种信局纷纷涌现。官员们有时也会利用这些机构送信。

二、票号

当古董买卖的交易谈成后，购买方就要付款。同城付款很容易，无论款项大小，均可以现银支付。异地付款则须采取汇款等方式。吴大澂于光绪十五年（1889）致盛宣怀的信中便提到：“潍县高家藏有古铜印六百三十方，已与言定价银壹千两……若由汴专差往取，携带银两甚不放心，因思烟台号家与潍县俱有来往，乞代汇银壹千两，由尊处派弁至潍，凭函取印，凭票取银。”

吴大澂的汇款是大清帝国内的城际汇款。此时汇款面临一大问题，即晚清的货币非常混乱。中国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这样描述清朝币制中的银两：“旧日称砵不统一，同是所谓两，种类也很多，各地不一样……由于银色的纷繁，我们可以想象流通时人民所感到的不便。尤其是散碎



白谦慎教授（主桌左一）在讲座现场

的银子，一次交易，要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折合计算，不知要花费多少心思。”

各地银两标准不同，即使在同一座城市或同一地区，也未必有通行标准。因此，银行和钱庄对异地情况必须了如指掌，在两地之间进行业务上的汇票往来或现银交易时，要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

专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国，可令汇款寄达国内各个角落。但实际上，寄钱并不容易。吴大澂有一次从吉林向陕西汇款，先经吉林票号汇至京城、再由京城票号转至西安，可谓费尽周折。虽然如此，票号毕竟还是及时解决了古董异地交易的付款问题。

三、运输

白谦慎教授在此讨论了两类收藏活动中的“运输”问题：

其一是古董商交易过程中的运输，亦即已经成交的古董如何运到买家手中。白谦慎教授以大孟鼎进京为例，说明晚清物品运输的实际情况。大孟鼎很重，从出土地陕西到北京，又很少能走水路。考虑到运输安全，送出大孟鼎的左宗棠决定派士兵搬运，“辇致都中”。然而，天降大雨，道不易行，延宕数月，方才到潘祖荫手中。杨守敬亲见该事，写道：“此器之大罕有伦匹……以数十健卒抬入都中。”成为当时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

其二为在各地任职的官员收藏家，如何将自己的收藏品运到为官所在地。清朝官员不但要到异地履职，而且经常轮换。吴大澂的宦迹遍及大江南北，在每一官位上任均不过三年，因此屡次搬家。他是如何安排收藏品的运输呢？

当然，大多数藏品会留存于他在苏州双林巷的家中。一些想随身带至任所的“心头好”，吴大澂则会视情况决定携带的数量和品种——衡量因素包括任期长短、路途远近以及运输方式。水路运输较陆路更为方便，因此，如果走水路，吴大澂会考虑带更多藏品。

1886年，吴大澂往吉林上任，因要走陆路，且任期不长，便只带了图书和拓片，而将所藏青铜器留在天津，拖人照管。次年，他任广东巡抚时，因有轮船可坐，因此携较多铜器随身。而在出任湖南巡抚时，他更是将52件青铜器（约占其总收藏的四分之一）带至任所。

经过上述分析，白谦慎教授总结道，信息、票号、运输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官员的收藏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僚体系来运作和完成的。

为何要研究晚清收藏活动的社会网络要素？白谦慎教授认为，相关研究将帮助我们了解信息和古董流动的速度，以及这种流动和收藏规模之间的关系。依托官僚体系的社会网络，晚清官员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开展收藏活动，并籍此迅速扩大收藏规模。一个令人惊叹的例子是，吴大澂在1889年大范围蒐集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玉器。短短的一年内，他迅速收集多达四百多件玉器，一跃成为晚清古玉收藏第一人。

晚清的学术活动和收藏活动紧密相关。基于自己的玉器藏品，吴大澂写出《古玉图考》和《权衡度量实验考》两本书。这与他另外两本重要著作《说文古籀考》和《

斋集古录》不同——后者是铭文研究，有好的拓片就可以了，但前者必须依托实物。正因为藏有大量可观的古玉，才使吴大澂有能力完成相关的研究。可以说，晚清官员收藏规模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学术规模的拓展，为学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从而开启了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白谦慎教授最近出版的《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

是关于收藏史研究的阶段性结果，其中便包含本次讲座讨论的一些内容。正如李松教授所言，白谦慎教授对资料收集完备、解读深入，引导我们透过收藏，看到当时社会更普遍的一些现象和趋势，着实令人受益匪浅。

（撰稿：任新亚）

139

周其仁 | 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主题学术报告部分。

140

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 | 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主题学术报告部分。

141

林梅村 | 柔然与阿瓦尔考古调查——兼论 6-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2019年9月24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柔然与阿瓦尔考古调查——兼论 6-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倪润安主持。

柔然和阿瓦尔的历史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东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在本次讲座中，林梅村教授根据内蒙古和蒙古国的考古新发现，并结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阿瓦尔金银器，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除了一探蒙古高原柔然和欧洲阿瓦尔的考古文化，林梅村教授还讨论了六至八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柔然人迁徙造成的“铁马镫”西传。

林梅村教授指出，考古学界以往经常会将北魏鲜卑族的墓与柔然人的墓混为一谈。虽然鲜卑与柔然同族，但后来鲜卑逐渐汉化，而柔然则仍保留游牧之风。近年来，内蒙古、蒙古国一些考古发掘和柔然有关，可以帮助我们增进对柔然历史的了解。今年夏天，林梅村教授一行人前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考察当地的汉唐边塞遗址新忽热古城，并发现此处很可能是柔然汗国所建之城。

2007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乌拉特中旗东北发现新忽热古城，当时未能确定

其年代。201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忽热古城进行考古发掘。古城呈长方形，南北长900米，东西宽790米，与中受降城规模相当。古城中出土了汉代陶鼎，北魏兽面纹瓦当，唐代砖瓦、陶器残片，西夏灰瓦片，以及金元时期的冶铁坩埚、铁犁铧和铁车具。根据《新唐书》的记载，新忽热古城为唐代的木刺山横塞军。《新唐书·地理志》言：“横塞军，本可敦城。”可敦是柔然对可汗之妻的称谓。由此推测，横塞军的前身很可能正是柔然的可敦城。

新忽热古城所在山脉，唐代称“木刺山”，汉代称“沐楼山”（《后汉书》中多次提及，但误作“三木楼山”）。《梁书·西北诸戎传》有载，柔然汗国攻破丁零后，建城筑郭，命名为“木末城”。日本著名学者松田寿男在其著作《古代天山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指出，“木末城”乃“木来城”之误，因建于沃野镇（北魏边疆六镇之一）的北木赖山而得名。结合上述的信息，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新忽热古城，亦即唐代的木刺山横塞军，始建于北魏时期，建造者乃柔然人。

蒙古高原上也有柔然古墓。201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对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境内的日门塔拉遗址（俗称“三连城”）开展考古发掘。考古队在1号城址中心土丘顶部偏北发现墓葬，

形制为竖穴土坑，墓主仰身直肢，有木棺葬具。随葬品有金铜头饰、骨耳珥、半月形铜项圈及化妆铜工具。此外，墓中还出土了一些织物、铜手镯、铜戒指、铁剑、灰陶罐等。墓中标本碳14年代为335至535年，正相当于柔然汗国时期。随葬品中半月形青铜项圈，与北魏柔然人的墓中所见同类文物器型相同，因此，发掘者推测此墓应为北魏时期的柔然古墓。如果我们将该墓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毕克镇水磨沟口柔然墓、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1号墓放在一起对比，那么将看到更多共同的柔然元素，如金饰上镶红宝石乃柔然文化特征。

接下来，林梅村教授将目光转向西方，带领我们考察欧洲的阿瓦尔人及其古墓，以及铁马镫的西传过程。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史料，我们知道阿瓦尔人（Avars）是欧亚大陆古代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六世纪现身欧洲。公元九世纪初叶以前，阿瓦尔人一直统治着潘诺尼亚河流域。林梅村教授通过比对阿瓦尔及柔然墓葬出土实物（譬如阿瓦尔人古墓常见的狼牙棒乃柔然风格），认为阿瓦尔与柔然密切相关。公元552年，突厥大败柔然，柔然汗国灭亡。公元555年，突厥联合萨珊波斯帝国瓜分中亚嚠哒王国（柔然汗国在阿尔泰山的“马前卒”）。经此两番劫难打击，柔然余众辗转西迁。五到六世纪在南俄草原突然崛起的阿瓦尔人，便是西迁的柔然人。公元



林梅村教授

七世纪初，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指出：欧洲历史上有真假两种阿瓦尔人，真阿瓦尔人是柔然人，他们曾是蒙古高原的霸主，被突厥击溃后来到了西方；假阿瓦尔人则是欧洲中世纪史上的阿瓦尔人，他们由瓦尔部和匈人部两个部落组成，实则冒名顶替。

林梅村教授认为，柔然人和阿瓦尔人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将铁马镫从东方带到西方。铁马镫的传入，促进了欧洲封建制的诞生。学界一致认为，铁马镫是阿瓦尔人传入欧洲的。阿尔泰西北山佩雷茨突厥石人墓曾出土对西方影响巨大的突厥8字形铁马镫，根据史书记载，突厥为柔然可汗的“锻奴”，再加上阿瓦尔与柔然的密切关系，则铁马镫传入欧洲，大概要归功于柔然人的历史活动。

林梅村教授今夏造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发现馆中藏有一批阿尔巴尼亚出土的阿瓦尔金银器（被称为“伏罗帕宝藏”），乃公元七世纪以多瑙河中游潘诺尼亚平原为中心的阿瓦尔汗国的遗物。“伏罗帕宝藏”中一些器物的形制、特征，与我们现在能

够看到的柔然文物如出一辙，如织锦上的菱格纹路、高足器皿、单耳银杯、翼兽图案等。这更为证实阿尔瓦人即柔然人提供了重要线索。

公元796年左右，阿瓦尔汗国被法兰克的查理大帝击败，十年之后，阿瓦尔汗国覆亡，阿瓦尔人自此逐渐融入欧洲当地居民之中，与柔然人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关于它们更多的信息，尚有待后人进一步发掘探索。林梅村教授在此次讲

座中，凭借深厚的学识和广阔的视野，将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蒙古国境内的柔然古墓、欧洲的阿瓦尔人古墓、阿尔巴尼亚出土的阿尔瓦文物以及中西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串联成线，“以已知推未知”，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有关柔然和阿瓦尔历史的生动图像，令人获益匪浅。

（撰稿：任新亚）

142 王汎森 | 性格与历史

2019年10月2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性格与历史”。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

王汎森研究员长期从事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希望基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和体悟，在退休前完成一本通俗小书，和大家讨论学习历史的现实意义。“性格与历史”将成为其中一章。因此，王汎森研究员再三声明，本次讲座不是学术探讨，而是通俗演讲，期盼能号召现代

人多读历史，明白历史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王汎森研究员首先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即命运”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人物性格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需要被重新思考。“性格”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王汎森研究员的答案是肯定的。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理想性格，人们向往它、追求它。理想性格会因时而变。只要我们翻一翻历代史书，就不难发现那些对理想性格的格套式描述，以及其中的古今异同。譬如，在古人眼中，性格好的小孩子都“弱不好弄”，也就是不爱动。但放到强调动手能力的今天，这就很难说是一个孩童的理想性格了。

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有关“性格”的论述屡见不鲜。如魏晋玄学中的“才性四本”论，将性格和才能的关系概括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四种样式。刘劭《人物志》多方面地品鉴人物，为性格划分出不同范畴，可谓巨细无遗。有趣的是，该书和《世说新语》都认为，人的理想性格既不是聪明，也不是刚毅，而是平澹中和。众所周知，宋明时期的思想家更是常把“变化气质”挂在嘴边。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历来重视对人之性格的认知和分析。

历史书写塑造人物性格。好的史书，譬如《史记》，能以生花妙笔写出人物的特殊性。一个文明，往往会借助历史书写来树立某种理想人格。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不同时代碑传集的人物刻画，便可一窥理想人格在历史中的变化：在《民国人物碑传集》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典型人物，大多是能动的、能斗争的、不按原来规矩办事的。此时，“疯”成为优点——这与《碑传集》《续碑传集》《广碑传集》所反映的传统观念相比，简直天差地别。王汎森研究员提醒我们，透过历史的蛛丝马迹，可以洞察性格的时代变迁，应当好好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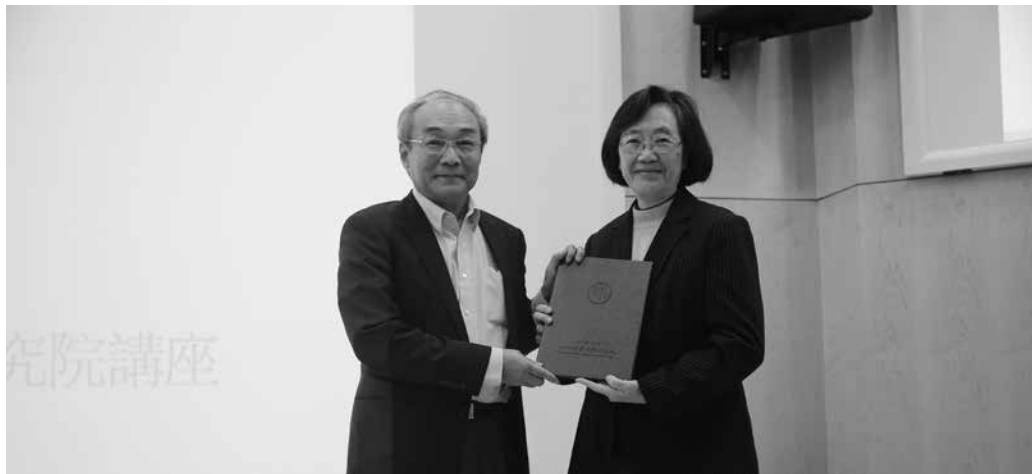
理想人格具有模范作用。坎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曾说：“人生是先有一首诗，才有生命的历程。”即在纷繁复杂的事相中，我们首先需要一楷模，作为自己混沌不明的生命的开导者和塑造者。向楷模学习，最常见、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扮演和模仿。王汎森研究员坦言，自己也曾有几个阶段在模仿、扮演范人

物的角色，“虽然没有（完全）成功，可是也略略成功了一点点，而这一点点，有时候也就够了。”至于这些典范人物是谁，王汎森研究员笑而不语，没有点明。

虽然我们都想拥有某种圣人般的完美人格，但在现实中，人是“万殊”的，性格是“万殊”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人类世界因性格之万殊而美，不能也不应求性格之一致。重要的不是强求一致，而是沟通与同情的理解。当然，强调性格“万殊”，并不是在否定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我们仍应尽力培养好的性格。那么，应如何培养性格呢？王汎森研究员认为有两种“转”：其一是积极地“转”，即改变自己的性格，实现尽善尽美；其二是消极地“转”，即“量才适性”，扩充尽才。

积极地“转”，将一己之性彻底改造为时代的理想性格，就好比将桃子变成李子，但这实际上非常困难。“我也尝试过变化气质，但没有成功。我没能变成我想要做的李子，我还是桃子，但却是比较好吃的桃子。”王汎森研究员解释道，性格有好几个层次，作为基盘的底层很难改变，而基盘之上的层面则相对容易塑造。桃子虽然无法变成李子，却可以变成最好的桃子。如果难以彻底变化气质，我们还可进行消极的“转”。

所谓消极的“转”，是指“量才适性”，认识自己的性格，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大多天分并不高，他们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得以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华，并由此成就一番事业。翻开清代督抚的引荐单，你会惊讶地发现，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王汎森教授（左）颁发特邀访问教授聘书

皇帝对各地总督和巡抚的评价，大多仅“平平”而已。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聪明才干，却因为身居合适的位置，因此成为封疆大吏。王汎森研究员笑言：“性格平平的人不要泄气，这是我今天讲的最重要的一点。”

日本著名学者荻生徂徠认为，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性万殊恰是理想状态。社群不要求千人同面，而是要不同的人在恰当的地方各尽其才，如此便可长治久安。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的一些人物事例，可以作为消极的“转”的极佳注脚。被视为明代最后一位烈士的张煌言，早年是个体恶劣的赌徒，后来却在赌徒个性的支撑下，坚持抗清二十年，成就一段忠良佳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在邵雍眼中不过是一个“天分不高的老实人”，然而修史正需笃实的性格与极大的耐心，司马光在史职之位上充分发挥自身才能，最终编成《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

“性格即是命运”吗？王汎森研究员认为，这么说虽然没错，但某种意义上，性格也不即是命运。因为性格可以“转”，积极地“转”成理想的圣人性格，自然最好；做不到的话，就消极地“转”。转识成智，量才适性，将自己置于适合的位置，永远做好准备，机会来时便可大展宏图。性格与命运好比房门和房屋，乃相互决定的关系。特定性格在特定环境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关键在于两者是否配合。人生如牌局，性格是牌面，有些人最初一手好牌，最终一败涂地；有些人虽然起手不佳，后来却能扭转乾坤、反败为胜。史上凡有成就者，多为能“量才适性”之人。善用其短，亦能大成。

最后，回到性格与史学的关系问题，王汎森研究员指出，以前史学重视人，凡讲到人，一定先谈其性格；近代史学不重人，故对性格在历史中的分量的认识愈来

愈模糊。人物性格对历史发展影响重大，特别是在结构转型之际，少数关键人物的性格往往决定着历史的进程与方向。性格具有时代性、境况性，秉持善良之心，为公众的利益尽量开展个人，“量才适性”，尽其在我——只要用对地方，用对时机，人人皆是天才。

正如陆扬教授在本次讲座的开场白中所言，一般我们会用简单的标签来形容一个学者的学问路数和取向，但我们很难如此概括王汎森研究员——他的研究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思想史范畴。长期以来，王汎

森研究员都在努力将一些被现代史学排斥的概念、框架重新带回历史学的视野，今天所讲的“性格”，便是很好的一例。王汎森研究员非常善于利用各方面的思想资源，各种概念、理论框架在他笔下皆可自然地嵌入对中国思想的理解之中，成为强大的解释工具。本次讲座，王汎森研究员以广阔的视野、深厚的学识、亲切而发人深省的人生感受，令满场听众受益匪浅。

（撰稿：任新亚）

王汎森 | 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



2019年10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主持。

王汎森研究员在开场时即指出，“心量”，好似人的内心有一个空间，这一词汇最早来源于佛家。朱熹说，人的心量本来是很大的，但是因为存有私念，所以就变小了。人不能只靠天生的小脑筋，要有空间的想象，尤其是要把“心”想象成一个空间。很多知识都可以扩充心量，而非只有史学。关于中外历史书写的不同，王

汎森研究员以中、印历史书写的差异为例进行说明：中国非常重视历史的书写，创作小说都要模仿历史书写；而印度的历史书写像虚构一样，如“大象从水上浮起来，驮着各种经卷”。诸多文明在历史的潮流中得到了发展，但发展之路各有不同。

不同文明历史书写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历史性的理解，即对“过去—现在—未来”关系的理解各有差异。毛利人认为，未来的基础是过去，未来是不断重复过去；埃及人在出生时就开始规划建设自己的宫殿，先假设将来如何回忆自己，再从现在开始修建宫殿——对他们而言“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是纠缠在一起的；



对阿基里斯而言,每天醒来都是同一天,“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任何区别,过去没有意义,未来不值得想象,专注现在是最重要的。

关于传统读史的目的,王汎森研究员认为,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功利史学和进步史观较为兴盛,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19世纪后期中国流行的史书,大多以发现一种规律或一种原则为标准。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许多历史学家都遵循此标准。但是近年来,这种想法逐渐没落,大家开始怀疑是否有规律的存在。如傅斯年认为,“历史事件可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人物只能一个个地叙说,行动只能一件件地叙说,因果是谈不定的”。

另一方面,有部分学者认为历史是重演的。如学者陈登原在《历史的重演》一书中,用各种办法试图证明古往今来的各种历史事件都是重演的。德国观念史家柯塞勒克(Koselleck)认为,历史的有一半都是重复的,有着内在的结构(structure)。确实,历史有很多长时段的结构,其实是可以预测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可以把握的。但现代人重读历史时却发现,大部分故事不会重演,于是,“历史是重演”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在传统读史目的渐渐没落之后,王汎森研究员重点论述了当代读史的六点益处。第一,读史可以防止“集体遗忘”,当然也包括“选择性遗忘”。大卫·欧文(David Irving)认为西方史学家对纳粹的描写大部分都是虚假的,于是他写了大量作品,不断为德国纳粹辩解。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认为,如果他继续写下去,人们总有一天会忘记德国纳粹所做的事情——而历史就是为了防止集体遗忘。第二,读史以求鉴戒。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教人道德有两种办法,一种教人历史故事,一种教人阅读哲学;我会选择历史,因为历史有法可循。失败历史事件对后人的鉴戒作用更为明显,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见自己的未来。

第三,读史可以明晰历史情境的仿佛性。历史提供一些相仿的模式,使后人在遇到类似事件时可以进行参考。政治人物经常会将自己与前人相比,找到对应的模式(pattern)。美国总统华盛顿退位之后隐居庄园之举,仿效的是古罗马共和国时代君王的做法。第四,读史有助于把握未

来。要注意的是,只是把握未来,而不是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功利史学、律则史学的目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Collingwood)用“封装(encapsulate)”一词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古代的知识被暂时地“封装”在历史之中,当遇到外界条件引导时便会涌现——文艺复兴的发生就遵循了此过程。

两个国家的外交史也是如此。当代很多外交官不能很好地处理两国关系,就是因为对历史“封装”的部分了解不够。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中,历史的训练能使我们快速认识到究竟在发生什么,并帮助我们准确定位。历史书可以找到一些类似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概然性,而非必然性。历史学家根据时间长短区分了三个概念,即“长时段”、“中时段”和“事件”。柯塞勒克(Koselleck)认为,长时段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把握的。

第五,读史使人对现实开放(open to reality)。读史料要对现实开放,在其中形成自己、拓宽自己,而不是将偏见投射到现实上,让事实来培植自身、改变自己。历史是关于人的事情的记录,看事情要看到其现实性。读史很重要的益处就是帮助自己发展,在讨论中形成自己的认识。第六,读史可以克服“本质化”现实的倾向,得到一种解放。王汎森研究员在多年前出版的《执拗的低音》一书中说到,希望人不要将这个时代本质化。现在只是古往今来的一刻而已,此刻的我不是本质。人对生死的态度也一直在变化,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开拓心胸去看这个问题。

读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王汎森研究员以下棋为例开始讲起。通过熟读古人比赛时的棋谱,他顿悟到,或许可以借鉴古往今来的战局战术,帮助自己化解难题,因为高深的棋手总会用古今各种棋术来应对当时的情境。德川家康乃平庸之辈(他也有自知之明),但喜欢钻研史书,熟悉传统时代英雄们的作战策略,在对付丰臣秀吉时用的也都是这一套。

熟读历史能够我们明白什么是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关键时刻做的决定(哪怕是微小的)往往会对后世造成很深远的影响。例如,康有为“毁庙兴学”观点毁坏了中国大量的庙宇。其实,他只是将这一来源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观点扩大化而已,就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历史得益要从“在心上”转为“在手上”,要从科学的转为艺术的,要从“knowing”转为“doing”。要把科学的东西化进,才能变成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在未变成艺术之前,它就只是一种知识,不具有实践性。很多事情,我们反复演练,都是为了完成从“心”到“手”的过程。只有经过大脑思考以后,由科学变为艺术,在各个个案中发挥,知识才算真的掌握了。

王汎森研究员还谈到了化史为用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不仅是“照着做”,还要“接着做”,不是根据过去,而是不忘过去。商定《北京条约》时,一位等级很低的官员熟悉西方签署条约规则历史,随口一句“洋人好像不用割地,只用赔偿”,就使得《北京条约》成为清朝签订的首个未割地条约。时间点染空间,历史点染人生。钱钟书和钱穆一同乘车来京,路过一片黄土堆,钱

钟书觉得乏味无聊，钱穆向其介绍这些土堆曾发生过的战役和历史事件，瞬间，土堆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海德格尔说，我们看古物时不要只看实物，而是要看见背后的生活世界。所谓心量，就是去掌握其内涵和重要意义，就是要把古物背后的整个世界挖掘出来。

讲座最后，王汎森研究员总结道，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也增长见识之学。

历史的实际功能非常强大，不在于指示具体事情，而是经由扩充历史认识，提升自我能力。朱熹认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读史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过程，不是“照着做”，而是“接着做”。

（撰稿：刘建）

143 韩启德 | 科学与文明之间

2019年10月22日晚，“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B101举行，主题为“科学与文明之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主讲，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三百余名师生聆听讨论，现场座无虚席。

邓小南院长首先介绍了“科学·文明”系列讲座的发起背景。在新时代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 and 新的未知，需要新知识、新思考，需要对生生不息的新鲜事物的感悟，也需要全新的多学科交流互鉴的方式。对于现代科学本质和现代文明内涵的探索，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开，关系到当今时代发展的根本性议题。“科学·文

明”系列讲座希望能够搭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对话平台，能够直面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激活科学与文明这一经典性的对话；希望能够在文明的视域中认识科学的意义，在科学的基础上促进文明的养育，为中国科学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生机与活力。

讲座伊始，韩启德院士即指出，科学与文明的关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议题，科学既是文明进步的体现，又是推动文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将会更加深远和复杂。科学技术进步不仅需要资源投入和人才培养，更需要在社会中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

和氛围，因此这一历史节点上，推动科学与文明的系列讨论，有助于社会科学文化的培养和熏陶。

韩启德院士认为，讨论科学与文明，应当针对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其一，科学是什么？其二，科学与文明的关系为何？其三，中国背景下科学与文明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围绕这三个方面，他进一步提出了十二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希望以此引出后续关于科学与文明的系列讲座和讨论。

讲座第一部分，韩启德院士表示，要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从科学的定义、科学发展的动力、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当前科学发展的阶段这四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科学存在着不同的定义，科学可能被定义为一种知识体系，或者是生产知识的范式，或者是一种社会建制乃至历史范畴。韩启德院士认为，可以将科学定义为继承古希腊理性传统，经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而形成的，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社会建制。同时我们应当明确科学并非人类智识的全部，只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系统中的一种。

科学的发展是好奇心、求知欲、科学发展惯性等内部动力和社会需求、国家利益、政策驱动等外部动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在社会需求和国家推动非常强烈的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内部动力还在发挥多大作用呢？韩启德院士认为，虽然当代社会推动科学发展的外部动力非常显著，但是个人兴趣与好奇等非利益的内部动力依然而且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部分



韩启德院士

科学家来说，以内心的社会责任为动力进行的科学研究，并不能完全被外部或内部动力的划分所概括。

科学是否为价值中性也是一个值得再次讨论的问题。曾经有诸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不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认识过程不需要价值判断，其成果本身是中性的——只有技术应用才有善恶之分。因此，科学是中性的。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科学研究的方向往往会受到一定时期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早期科学的发展也与基督教的宗教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对此，韩启德院士表示，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是未来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且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必将影响我们对科学的理解，进而对科学与技术、科学与伦理等衍生问题发生影响。

理解什么是科学，还要讨论当前的科学是否正处于突破期这一问题。当前的一些迹象显示，科学正在处于突破期，比如科学技术和工程融合发展、大科学、量子

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脑科学与认知研究等领域都有了显著的进展。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引导现代科学发生了从追求确定性到把握不确定性，从还原论到复杂系统，从演绎方法到黑箱归纳的范式转变。韩启德院士认为，当前很难预测科学是否会有突破，但是我们可以从科学的演化、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科学可能发生的突破。

讲座第二部分，韩启德院士指出，要讨论科学与文明的关系为何，需要对什么是文明、追随科学是否一定追随西方文明、科学是否只有通过技术才能影响文明、人类社会是否能够通过控制科学发展方向这四个问题加以探讨。首先，我们普遍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开化状态，表现为良好的生活方式与风尚。虽然人们对于文明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是文明的发展却是多元的、不均衡的，且能够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使得

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人们对于什么是文明进步存在理解偏差。

科学发展的历史与西方文明深度绑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追随科学就一定要追随西方文明呢？科学源于西方，大大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成为其重要标志。这使得科学天然地贴有西方文明的标签。而且随着以西方文明为特色的现代化在世界推广和复制，科学已成为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成分，这使得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西方文明的印迹。但是，韩启德院士认为，不能将科学与西方文明划等号。文明的进步并不完全取决于科学，文明的发展对科学的依赖不等于对西方文明的依赖，而且近代科学本身就包含着不同文明的元素，不过是众多不同文明中科学知识的总汇罢了。

从历史来看，科学发展引发的三次产业革命对文明发展造成了显著的影响，那么科学是否只有通过技术才能影响文明呢？韩启德院士认为，除了通过技术影响文明发展，

不可忽略的是科学本身就给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科学有超出功用的智慧、超出技艺的价值。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人本主义与现代哲学的产生。五四运动以来，“赛先生”的影响也使得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前世界各地的教育都从单纯的人文教育转变为同时重视现代科学的教育。

若讨论科学与文明的关系，还要探讨人类能否控制科技发展的方向。在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核武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进步让人类对于科学的负面影响产生了深深的担忧：科学是否会成为毁灭人类的“潘多拉魔盒”？科学的进步是否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乃至加快人类的消亡？在科学技术的力量愈加强大的前提下，驾驭科学发展的方向成为人类社会的当务之急，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伦理等问题都值得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讲座第三部分，针对科学与文明在中国有何特殊性的问题，韩启德院士则表示，需要对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当前中国科技在世界上所处的水平和地位，推动科学发展最关键的环节这几个问题进行思考。近年来，关于“四大发明”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在20世纪初期，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人都明确表示古代中国没有科学而且讨论了没有科学的原因。对此，李约瑟则认为，不能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但是在明确现代科学基本要素的前提下，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应当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而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从整体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非世袭的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身份认同的等级制度等虽然可孕育出中国独特的智慧和知识体系（比如中医），但不利于产生科学方法、吸引科学人才。韩启德院士指出，传统文化在今天也可能对科学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比如中国传统“有机唯物观”未来可能会利于科学发展，强大的政府功能与集体主义有利于开展“大科学”，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下熏陶出的“家国情怀”也使得中国有了一代代以科学救国、报国、兴国、爱国的科学家群体。韩启德院士认为，“家国情怀”是中国科学家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国科学家独有的风骨和境界。这是与世界其他科学家最根本的区别。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科技在世界上所处的水平和地位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和客观思考的问题。韩启德院士认为，我们应该客观地进行评价，既不宜骄傲自满，也不应妄自菲薄。在他看来，科学与技术不同，并不存在任何后发优势，无法“弯道超车”，只能虚心学习、老实追赶。而且从科学发展的规律来看，科学落后的程度并不能用时间来计算，不同国家的科学发展往往是互有优劣的。但问题在于，某些领域的落后在短期内很难弥补，在国际局势影响到国际产业链条的正常合作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卡脖子”的现象。因此，要全面细致评估中国当前科技发展在各个领域、各个方向上的水平和地位，进行战略分析，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观众提问

讨论中国背景下的科学与文明，重点还要考虑推动科学发展最关键的环节在哪里？韩启德院士指出，2018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支出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值得思考的是，经费支出结构、使用效率是否需要改进。自2012年以来，国家就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一系列相应政策，但这些政策的落实程度值得关注。大家已经认识到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在社会中培育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何实践和推动，依然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

提问环节中，韩启德院士与在场听众就科学演化的主要逻辑、医学技术的演进与科学人文的关系、科技展览与传播的方式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

讲座最后，韩启德院士针对“科学·文明”系列讲座提出了三点希望：首先希望系

列论坛能够动员国内外的资源和力量，集中地讨论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其次，在联系实际的同时，崇尚学术、深入思考、实事求是，提倡百家争鸣、和而不同。最后，他希望系列讲座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每位主讲人的成果进行更深入地总结、拓展。

自2018年以来，文研院先后推出的“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两个系列讲座，将以角度各异的交叉视角关注制度研究和文明研究的不同面向，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此次与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合作推出的“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预计分为十讲，将在2019年秋季学期及2020年春季学期分别推出。

(撰稿：包培含)

144

格伦·莫斯特 | 怀疑者多马：看，触摸与信仰

2019年10月23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怀疑者多马——看，触摸与信仰”。比萨高等师范学校希腊语文学教授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

讲座伊始，莫斯特教授首先介绍了关注到“怀疑者多马”这一问题的缘起。1996年至1997年，在海德堡大学有关教父文献的跨学科研讨会期间，莫斯特教授与同事们一起细读诺努斯（Nonnus of Panopolis）对《约翰福音》的翻译。在比

对诺努斯的诗体版本与希腊文散文版本的过程中，他发现，《约翰福音》的第20章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多马将手指伸入了耶稣的伤口。这与大众长久以来接受的多马的形象不相吻合，卡拉瓦乔作于1601年的《怀疑者多马》尤其反映了这一认知。文本与接受之间的矛盾引发了阐释学上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格伦·莫斯特教授完成了《怀疑者多马》一书的写作，他强调，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并非以神学和认识论为基础，而是分为修辞学（rhetorical）、文学（literary）和心理学（psychological）三个方面，即通过阐释那些敦促读者产生信仰的文本技巧，关注文本的结构方式，并综合认知、情感和意向性因素，用解释性的材料去填补叙述上的空白。

莫斯特教授接着引入了《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合称）的终章。这些章句都是以“怀疑”到“信”的过程作为结尾，也是《约翰福音》结尾的背景。基督教与其他强调事功的宗教不同，“信”尤其关键，而其中核心的信条便是耶稣死而复生的神迹。在每部福音的结尾，福音作者都在对敦促人们相信耶稣复活做最后一次的努力。最佳的叙述策略无疑是让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使徒们先产生怀疑，再转变态度，这样人们才会巩固自己的信仰。在这一问题上，《约翰福音》似乎格外执着，希腊语动词“πιστεύειν”（to believe）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90次，其中，《马可福音》为9次，《路加福音》为7次，《马太福音》为9次。“怀疑者多马”出现在《约翰福音》的第

20章，此章只有31节，但包含了13个有关“看”的动词（βλέπει “[she] saw”；βλέπει “he saw”；θεωρεῖ “he saw”；εἶδεν “he saw”；θεωρεῖ “she saw”；θεωρεῖ “[she] saw” ’ Εώρακα “I have seen”；ιδόντες “they saw”；’ Εωράκαμεν “We have seen”；ιδω “I see”；ἶδε “see”；έώρακας “you have seen”；οἱ μήιδόντες “those who have not seen”），以及8个有关“相信”的动词（ἐπίστευσεν “[he] believe”；οὐ μὴ πιστεύσω “I will not believe”；ἀπίστος “faithless”；πιστός “believing”；πεπίστευκας “Have you believed”；πιστεύσαντες “[those who] believe”；ἵνα πιστεύσητε “that you may believe”；πιστεύοντες “believing”）。而“看与信仰”的主题以戏剧性的方式集中在了多马身上。

之后，莫斯特教授带领听众细读《约翰福音》第20章的内容。第1至18节主要叙述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现身，之后的部分则叙述耶稣向包括多马在内的门徒们现身。两部分都包含从无知到相信的过程，内容的高潮都在于“触摸”的行为：马利亚的触摸出于对耶稣的爱，但耶稣拒绝了；多马的触摸代表怀疑，耶稣却接受了。两人的注意都放在耶稣的身体上。第20章的开头，故事的开始与自然时间单位的开始（“Early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相吻合，预示着约翰关于耶稣复活事件的叙述将被视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叙事单位。马利亚来到坟墓，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事情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便跑向了使徒，告诉他们自己的推断：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挪走了。马利亚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一推断，但她将之作为事实报告给了彼得和

约翰。两人很快奔向了坟墓，一定要亲眼“看见”——“看见”才能“相信”。在第8节，约翰“看见就信了”。一般认为，约翰相信的是耶稣复活一事。但紧接着的一节又称门徒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因此，约翰所相信的其实是马利亚告诉他的事情——有人挪走了耶稣的尸体。福音作者让读者关注到所信的内容以及信仰基础的问题。

当两位门徒离开后，叙述第二次开启，马利亚见到了两位身着白衣的天使。莫斯特教授认为，这两位白衣天使可能正是彼得和约翰所看到的细麻布和裹头巾——是马利亚把它们“看成”了天使。天使并没有足够的权威改变马利亚的错误推断，这时耶稣亲自对她说话，马利亚却把他当作了看园者。耶稣并没有用言语坦白自己的身份，而是呼唤了马利亚的名字（而非如之前所唤的“女人”）。当即马利亚便明白过来，也呼唤他“夫子”。正是因为耶稣辨认出马利亚，马利亚才辨认出耶稣。紧接着，耶稣对马利亚说“不要摸我”。这句话在希腊文中的含义非常模糊：“Μή μου ά-πτου”（拉丁文版本是“noli me tangere”），既可以表示马利亚正打算伸出手去触摸耶稣却被制止，也可以表示马利亚已经触摸到了他但被示意不要继续。语法分析并不能在以上的可能中做出选择，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马利亚都以“触摸”代替了言语。随后她前去告诉了门徒们正确的信息——“我已经看见了主”。

在第20章的第2部分，时间来到了当日晚上，门徒们聚在一起，门都关了。耶稣出现了，并向门徒们授予使命，叙述本可

以在此处终止。但在第24节，读者获知多马在当时并没有和门徒们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是唯一一位交代了多马的名字别有深意的福音作者。在第11章16节拉撒路之死和此处耶稣现身时，约翰都写出了多马的亚拉姆语名字（Aramic name）——“t'ō me”，意思是“双生、一对儿”，对应的希腊文是“Δίδυμος”。此外，当耶稣在最后晚餐向门徒明示自己将要离去，并保证自己必再来接他们到所预备的地方同住。同时，他又说这条路门徒是知道的，多马却抗议他们不知道。

多马格外鲜明地以一个怀疑者的形象出现，而在许多语言中，“怀疑”和“二”都有词源上的联系：希腊语中的“διστάζειν”（“distazein”，to doubt）和“δύο”（two），拉丁语中的“dubitare”和“duo”，德语中的“zweifeln”和“zwei”，英语中的“doubt”和“double”。多马也最有可能成为使徒中“怀疑”的象征。接下来，他的要求显然是有别于众人的：他不仅要求亲眼看见，而且要求要触摸到耶稣的伤口，才肯相信。同样地，正如天使不能让马利亚相信，众使徒也不能让多马相信。过了八日，耶稣现身了，并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放在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的话表明，他已洞悉多马所想并许可了他的要求——这是他认出多马的标志。多马即刻呼道：“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在所有福音书中第一次有人对耶稣使用这样的称呼，这对于耶稣而言是个例外，正如多马的要求也是一个例外一样。

到底是什么说服了多马？约翰并没有说多马“真正地”触摸了耶稣。长久以来，

人们都用“多马触摸了耶稣”来填补这一空白。但莫斯特教授指出，至少有两处文本反对这种猜测。首先，在28节，“多马说”（“Thomas answered and said to him”），“to answer”对应的是希腊语动词“ἀποκρίνεσθαι”，这个词在《新约》中使用了不下两百次，每一次使用都是用来回答别人已问过的话。所以多马所说的“我的主，我的神”也正是用作对耶稣的回答，而不是去触摸他。另一处文本就是第29节，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而不是“你因触摸了我才信”，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多马并没有触摸到耶稣的身体。耶稣此时将多马的“信”与“没有看见就信的”并置起来。莫斯特教授认为，这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应当是福音书的自我指涉，后世的信徒正是通过阅读福音书获得信仰。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果文本从未说明多马触摸了耶稣，那么误读从何而生？莫斯特教授从三个不同的维度考察了怀疑者多马故事的流变。首先是叙述作品，主要是经外书（The Apocrypha）及后世文本对多马故事的阐发。这些作品通常能够帮助填补正经叙述上的空白。其中，多马成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诺斯替（Gnostic）文本中，他成为了一个诺斯替圣人。莫斯特教授将诺斯替主义总结为三个特征：其一，将知识作为通往信仰的唯一道路；其二，面向精英而非面向大众；其三，强调超越肉体的精神，诺斯替主义中的救赎即从肉体中救出灵魂。在诸多诺斯替文本中，多马的生平行迹被勾勒出来，并与《约翰福音》中的多马保有一定的联系（比如同样高呼过“我的主，



格伦·莫斯特教授

我的神”）。而多马之所以被当作诺斯替派的圣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被视为耶稣的同胞兄弟。因此，当人们看见多马的时候，会被认为看见了耶稣。但兄弟有隙，故而多马远遁印度。多马身上也被打上了诺斯替主义的印痕：他“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向他现身并且准他触摸，他也印证了耶稣没有肉身。在诺斯替派的文本中，多马意图触摸但未能成功——这种叙述正中诺斯替主义的“下怀”。

莫斯特教授采用的第二个维度是从教父神学到反宗教改革派对约翰叙事的解经传统。对于教父来说，耶稣有没有肉身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福音书的叙述令他们困惑：耶稣可以从已锁的门进入房间，而墓地的石头却又被搬开。在《哥林多前书》中，耶稣肉身复活的问题尤其重要。正因为耶稣的肉体得以拯救，我们的肉体方可

得拯救，因而耶稣可以拯救整个物质世界——这与诺斯替派的“拯救”截然不同。对于教父神学而言，多马也成为了耶稣有肉身的关键证据。这在特土良

(Tertullian) 驳斥诺斯替主义者马尔西安 (Marcion) 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中世纪的教父著作和天主教对《圣经》的注解中，“多马触摸了耶稣的身体”被当作常识接受下来。只有4份文件对此提出过质疑，分别是奥古斯丁 (Augustine)、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阿奎纳 (Thomas Aquinas) 四人对《约翰福音》的评注。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教徒意欲在天主教之外开辟自己的解经传统，路德的追随者要么否认多马触摸了耶稣的身体，要么仅仅将此视为一个隐喻。改革派从部分晚期中世纪神学家那里接受了“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的原则。另外，新教教徒所宣称的“唯信得救”，也使得多马的行为 (即是否触摸了耶稣)，不再成为重要的问题。与之对应的是，在16世纪末期的反宗教改革中，诸如嘉禄·鲍荣茂 (San Carlo Borromeo) 等人的布道再次拨乱反正，坚称多马触摸到耶稣的身体无疑。



莫斯特教授采用的第三个维度是从古典时代晚期至17世纪初以来对这一故事的视觉表现。他着重分析了卡拉瓦乔作于1601年的《怀疑者多马》的图像学意涵。耶稣站在左边，肤色苍白，面庞上深深的暗影只让我们看见他的面容，却无法辨别他的情绪。可以看到，耶稣的左手有力地拽着多马右手手腕。但这个姿势用意何在？让多马的手指更深地探入伤口？抑或阻止多马把手指深深地戳进去？我们无从得知。三位门徒身穿深红和棕黄的外衣，那是血与土的颜色，象征着强劲的力量——不仅寓意着通常意义上的生命 (与死亡相对)，还是属于大地的、平凡的、粗犷的生命 (与理想化与抽象化相对)。他们的衣服是简朴的、农民的衣袍；他们身材魁梧、粗壮而强健。三个人的表情生动而富有张力。多马的手指探寻耶稣的伤口，这个细节里的性暗示足以唤起观者的同情、恐惧、愤怒和反感。

多马的面部表情和整个身体动态表达了什么情绪？他并非通常意义上地“看”，

而是成为了宗教奇迹之所在。耶稣和多马共同把画面界定为宗教奇迹的领域：耶稣是奇迹的化身，多马是奇迹的亲历者。而另外两位门徒则承载了“怀疑”的情绪，他们通过看确证奇迹的真实性。卡拉瓦乔的绘画呈现的既不是信仰也不是怀疑，既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科学怀疑，而是二者之间无法化解的冲突与不可或缺的相互依存。而此时作为凝视着画面的我们，以某种方式进入了画面，成为了查看耶稣伤口的多马。这开创了全新的复杂性与张力：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融入画面之内，我们在画面中发现了自己正在观看的形象。

随后，莫斯特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卡拉瓦乔绘画中显著特征可能的来源。对比文艺复兴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的同题材绘画，卡拉瓦乔的画作与托斯卡纳传统的处理方式

大相径庭：多马不是犹豫不决的孩子，耶稣也不是慈爱而善解人意的父亲，且情感基调绝非亲切与慈悲。莫斯特教授发现了卡拉瓦乔与德国传统的暗合：耶稣同样半裸身体，不为显示他的力量和荣耀，而是为了展示苦难留下的可怕印记；耶稣同样有力地抓着多马的手，让他把手指往伤口里戳；多马的手指同样深深地插进伤口。让身体变形的暴力和加深的苦难弥漫于画面之中，这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宗教艺术以及当时神秘主义著作的典型特质。

提问交流环节，在场师生就耶稣和门徒们的紧张关系、“多马回答”是否有别的解读可能等提问，莫斯特教授进一步辨析词义，并对宗教特征的问题做进一步拓展。

(撰稿：周观晴)

145

约翰·柯林斯 | 古犹太教中作为世界观的天启主义

2019年10月2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古犹太教中作为世界观的天启主义”。耶鲁大学神学院旧约研究 Homles 讲席教授约翰·柯林斯 (John Collins) 主讲，文研

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首先，柯林斯教授介绍了天启主义和天启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梳理了天启文学的发展脉络。“天启主义” (apocalypticism) 得名于天启文学这一文学体裁，尤其与《启

示录》关联紧密。《启示录》是《新约》末卷，人们通常认为《新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而天启文学传统，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经产生，代表了犹太教在希腊化时期的一种新现象，可视为对《旧约》先知书的继承。

但先知书与天启文学之间有很大区别。在先知书中，先知以上帝之名宣告启示，而在天启文学中，启示则通过视觉的形式（异象）得以传达。虽然先知书中也有异象，但是天启文学中的异象更加繁复，用苏珊·尼迪奇（Susan Niditch）的话说就是“巴洛克式”的。此外，天启文学中，异象以天使为中介传达给观看异象者，也由天使对各个象征加以解释；又或者，是天使引领观异象者游历圣境。这些能察看异象的人，多托名为成书前数百年的古人，《启示录》中的约翰是个例外。但天启文学的创新之处不单在文学形式上，更在于其传达的世界观，柯林斯教授称这种世界观为“天启主义”——关心历史如何产生；关心超人类的代理人（如天使和魔鬼）如何干预人间事务；关心对历史终结和彼岸生活的设想。

紧接着，柯林斯教授介绍了天启作品的分类，并讨论了产生缘由。流传至今的天启作品包含了两种类型，一类侧重历史进程，一类侧重天堂或冥界的景象。前者会假借远古人物的预言来纵览历史全程。如《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见到一座塑像，从上到下由金、银、铜、铁、泥铸成。书中，但以理将其解释为尼布甲尼撒及其下属的三个王国。就《但以理书》本身的书写背景来看，可以将三个王国解读为米底，波斯，希腊（亚历山



约翰·柯林斯教授主讲

大大帝死后的三国分立也可以进行类似解读）。天启文学对历史的描绘还可以更加细致，比如《以诺书》（Enoch）中将人类历史以“星期”为单位划分，或者用动物寓言摹写人类历史。

保罗·科斯敏（Paul Kosmin）认为以纵览历史为特征的天启文学是出于对塞琉西王朝意识形态的反抗。塞琉西王朝将塞琉西一世时期作为整个世界的起点。然而柯林斯教授反驳了这种观点，并举出三个反例。他指出，早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就已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并以不同金属来象征。波斯文化中也有天启式的历史观，虽然材料颇具争议。即使在旧约传统中，也已出现纵览历史的情况，只是不像后来那样条理分明。所以，与其说这样的历史纵览是政治反抗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发挥。又因为这种类型的天启文学主要出现在希腊化时期，

所以可能与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印度日趋大一统的局面相关联。

然后，柯林斯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历史纵览这一类型所包含的决定论思想。一方面，描绘历史全程传达出历史先定的意味。这是《旧约》与天启文学的区别。《旧约》中人可以决定事件走向，比如《申命记》中圣约的运行逻辑便是守约则兴，毁约则亡。但在天启文学中，事件无法改变。比如《但以理书》中，但以理为以色列人向上帝求情，但上帝通过异象告诉他，以色列人要经受四百九十年的磨难为自己赎罪，这是一个定论。历史自有势头，不听令于随意的干涉，就算是神也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历史先定不代表个人命运先定。相反，先定的历史使个人抉择更加尖锐。历史纵览类启示文学的典型做法是，借古人的预言来描述历史。预言很准，是因为写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也有与历史不符合的地方。虽然有这样的马脚，但是我们能够理解虚构部分的作用。由于“假预言”很准，货真价实的预言——即最终审判即将降临——的可信度也就随之提高了，正在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也就有了忍受磨难的耐心。

接着，柯林斯教授分析了天启文学对宇宙演化神话的化用。他认为《但以理书》中的异象不单着眼于马加比时期的事件，更宣称要揭露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完整历史意义。而整合历史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把神话中的创世描写运用到末世未来中。十九世纪末著名德国圣经学学者赫尔曼·袞科尔（Hermann Gunkel）发现天启异象与古代近东神话之间具有相似性。这类神

话是巴比伦创世神话。当时袞科尔能接触到的是创世叙事诗（*Enuma Elish*）。史诗描写了年轻一代的神灵马杜克（Marduk）与地母提阿马特（Tiamat）之间的旷世大战。马杜克打败提阿马特，并用她的身体创造了世界。袞科尔认出提阿马特的名字与希伯来语词 *tehom* 同源，而 *tehom* 正是《创世记》中的“远古深渊”一词。他还发现了提阿马特与《但以理书》中海怪所在的海之间有紧密联系。以此他发现了天启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世界的开端正如末世的终结。在袞科尔去世之后几年，在北叙利亚的乌加里特城发现了新的文本，与《圣经》中的天启思想更接近，讲的是迦南神话中众神争夺王位的故事。众神之父 *El*（在《旧约》中也出现，等同于以色列人的神）要将王位传给下一代，王位的主要争夺人腾云者 *Baal*（也出现于《旧约》中）与 *Yamm*（海，与海怪有关）和 *Mot*（死神）展开激战，*Baal* 最终用大棒劈开 *Yamm*。*Baal* 又被 *Mot* 吞入腹中，所幸被他姐姐救出。

柯林斯教授指出，这个迦南神话对理解《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象征十分关键。《但以理书》中一个谜题是两位神并列。犹太传统，至少早期的犹太传统，是一神论思想。但迦南神话的腾云者与亚威（*YHWH*）、即犹太人的神关系非常密切，只是在迦南神话中还有另一个神在腾云者之上。*Baal* 的神话在以色列很流行，并被化用到以色列崇拜中，只不过将主人公从 *Baal* 换成了亚威。早在先知书中，与混沌之神的大战就已经被投射到未来。比如《以赛亚书》二十四到二十七章中就写了上帝

吞噬死亡，击杀海怪利维坦，重整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个意象延续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

柯林斯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战斗神话的化用与善恶二元论之间的关系。召回远古战斗神话或创世神话的结果是简化了历史，把历史缩减为对立原则之间的冲突。而天启文学不推崇中正平和，相反，崇尚极端和不妥协。这样的思想虽然有其魅力，但也存在问题。除了内在的二元论之外，召回远古战斗神话的做法还传达了人类事务超出人类控制观念。一面体现了人的无力，因为历史进程超出人类掌控之外；一面又给了人安全感，因为最终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接下来，柯林斯教授将话题从历史进程转向天堂秩序，分析了天庭和宫廷的对应关系。天启文本中，天使与魔鬼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传达了人类生活受更高力量支配的观念。对天庭的描写，总是一幅至尊神周围簇拥着众神的画面。古代近东、《旧约》、早期天启文本和更远古的神话都将天庭和地上的宫廷对应。但天启文本中的众神参与人类事务程度更深，原来由上帝做的事情，如出战、与先知的交流都由天使代劳，这反映了波斯和希腊化时期，君主逐渐疏离，宫廷事务下放至官僚的历史背景。

天启文学相对之前神话的另一个转变，则是天国对人类更加开放。虽然《吉尔伽美什》和《以诺书》中有先例，但天国对人类的开放程度在天启文学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游历天国的形式也逐渐定型。此外，天国的开放具有另一个重要意义，



高峰枫教授主持

即表明正义者死后灵魂升天国，邪恶者死后灵魂永远受诅咒。柯林斯教授指出，《旧约》对凡人的死毫不留情，只有《但以理书》中表达了复活的希望，但还不是普遍化的复活。这里的复活不是重得生命，而是生命升华。灵魂会得到一个身体，却不是肉身。

对于基督教对天启文学的化用，柯林斯教授指出，基督教兴起让天启世界观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因为人们相信世界末日和复活即将到来，所以才更加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基督教天启文学与犹太教天启文学的区别在于，《新约》缩短了之前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侧重耶稣开启的时代，这个做法让人们对于末日审判的期待更加恳切。耶稣死而复生这一个重要范式也为早期基督教天启文学增色不少。然而柯林斯教授强调，即使是侧重个人救赎的《启示录》也根植于一种全面的世界观，这是因为受到了古代神话的深刻影响。这些神话元素

反复得到利用，恰恰反映了人类危机从没有真正消失的事实，也因此，古老文本中的意义才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讲座最后，柯林斯教授介绍了天启主义在现当代的发展。天启主义在英语世界最直接的体现是19世纪的时代论运动（Dispensational Movement），直接把现代指示物当成象征，并用来预言政治事件——典型例子有畅销书《消失的伟大地球》（*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和《末日迷踪》系列（*Left Behind series*）。柯林斯批评道，这类作品缺乏文学性，并且误导大家将天启主义理解为一种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现代天启主义似乎推崇极端和不容忍，那么这种评价能否套用

到古代天启主义上去呢？对此，柯林斯指出，许多学者认为可以套用。他们眼中的天启主义隐含暴力倾向，是不成熟、反社会秩序、反人道主义的。但柯林斯教授却表示，古代天启主义的象征意味很强，是诗性的世界观，而现当代的天启主义是非虚构的，认为书写的都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T. S. 艾略特比《末日迷踪》系列更忠于天启传统。此外，柯林斯教授还强调，单纯的灾难想象并不是真正的天启文学，经典天启文学传达了坚定的希望，虽然这种希望有时候经不起理性推敲，但可以对人类命运产生积极影响。

（撰稿：苏逸璞）

约翰·柯林斯 | 古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的迦南传统

2019年10月25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五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古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的迦南传统”。耶鲁大学神学院旧约研究Homles讲席教授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圣经《旧约》中神的宿敌巴力（Baal）是何种“邪神”？神既有宿敌，那么犹太教到底是多神论（polytheism）还是一神论（monotheism）？埃尔（El）作为迦南人的众神之神，与《旧约》中的神（上帝）是何关系？

本场讲座，柯林斯教授从迦南（Canaan）地区的神话中众神之名与犹

太教中上帝之名谈起，将上述问题的起源与学术理路娓娓道来。

同一宗教的主神在不同语言中得名各异，由此引发的冲突屡见不鲜，而这绝非翻译优劣之争或执迷文字游戏、吹毛求疵，此等看似微小的问题往往暴露出不同文明深层结构的巨大矛盾与跨文化传播信仰的重重障碍。三百年前，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于1715年明令禁止在中国以“上帝”或“天”称呼基督教主神（拉丁文 Deus），责令中国基督徒沿用广泛使用的名称“天主”，并勒令移除中国天主教教堂内全部标有“敬天”二字之匾。上帝之名的冲突仅为十八世纪中西信仰与礼仪之争的冰山一角，此次“正名”事件实质上是教皇认为儒家祭祖、祭孔仪式有违天主教教义，而当时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对中国天主教徒出入祠堂、供奉牌位过度宽纵，疏于管理，而拨乱反正须从“正名”起。这场在基督教教会史上有名的“中国礼仪之争”持续了二百余年，直到1939年底护十二世（Pius XII）颁布谕令，同意教徒进行祭祖祭孔仪式才尘埃落定。

柯林斯教授对三百年前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执着拉丁文 Deus 为神的本名颇不以为然，亦斥其封闭的文化心态为矫枉过正之源。柯林斯教授笑称，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是当代圣经学者，并受自十九世纪起蓬勃兴起的古代近东研究洗礼，便知“上帝”本名并非拉丁文 Deus，甚至并非耳熟能详的耶和華（Jehovah）。相反，在古代近东地区多种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确定犹太

教主神之名并非易事，比如公元前二世纪的《阿立斯体亚信札》（Letter of Aristeas）的作者虽为犹太人，却毫不避讳将犹太教的主神称作希腊神话中统领宇宙的天神“宙斯”（Zeus）或迪斯（Dis，即宙斯，因宙斯之名在古希腊语中属格形式为 Dios【Διός】）。柯林斯教授以在旧约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迦南地区为例，引领听众逐步探索古代犹太教与古代近东地区神话碰撞冲突而生的世界观，揭示跨文化交流可能产生的问题和研究此类问题的理路。

一、迦南地区与乌加里特（Ugarit）神话传统

柯林斯教授选取迦南人（Canaanites）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因为旧约中他们往往被刻画成与犹太人对立的“他者”，而他们的主神就是旧约中上帝的宿敌巴力。迦南地区地跨今日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临近的黎巴嫩、叙利亚的临海部分。在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之间，更无统一王国管辖，多个部落散居于此，但文化上既相互交融又各有特色，可作为一个整体考察。

1928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北部海岸沙姆拉角（Ras Shamra）的乌加里特古城遗址中发现了古代迦南文献，该文献以乌加里特语以及古埃及、苏美尔、阿卡德、赫梯等八种古代文字写成。藉此，旧约学者得以进一步理解圣经的希伯来文本，厘清古代以色列和犹太文化与邻近相似文化的联系。乌加里特语

于公元前1500年到1200年之间在迦南地区被广泛使用，在使用楔形文字的语言中，较阿卡德语更为简易，与希伯来语关系紧密。

1928年出土的乌加里特文献（the Ugaritic texts）中包含了关于旧约“邪神”巴力的史诗集《巴力故事集》（*The Baal Cycle*）。巴力对于迦南人并非邪神，而是位居众神之首的风暴之神。在众神的等级秩序中，埃尔名义上至高无上，但并不直接统领众神，而是选拔、任命王者，巴力则是实际上大权在握的众神之首。巴力的统治面临两次挑战，第一次来自于海洋之神雅木（Yam），第二次来自死神莫特（Mot）。巴力与海神雅木及其手下海怪激战，几乎不败，最终借助两根神杖魔力，大获全胜；死神

莫特的实力却不容小觑，这位劲敌张开覆盖盖地的血盆大口，将巴力吞入腹中，幸得女神亚娜（Anat）相助，巴力才死而复生。古代迦南地区降雨与土地收成和生物繁衍密切相关，所以掌管降雨的风暴之神巴力顺理成章地成为生育崇拜（fertility cult）的主要礼敬对象。

二、埃尔与亚威（Yahweh）：犹太教中的一神论与多神论

尽管巴力威慑众神，尊享人间祭祀，埃尔却始终凌驾其上，无其首肯。巴力则得位不正，故而有人推断《旧约》中屡屡钳制巴力的亚威正是迦南神话中的至高之神埃尔。E1一词本为“神”的通称，在乌加里特文献中E1总共出现五百余次，其中半数用来特指众神之王埃尔



柯林斯教授与现场观众合影

本人。他的形象是一位银发老者，贵为人神之父。至于其是否如同《旧约》中的上帝一样是造物者，学界尚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埃尔既然为父，则万物必自其出，但以更为严谨的学术眼光审视现存文献，其中并无埃尔创世之说，故而不能妄下结论。

若以一神论观之，在《旧约》中迦南神话中至高之神埃尔应与亚威合二为一。例证之一便是以色列（Israel）一词结尾的“el”源自于埃尔而非亚威。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中，上帝说道：“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全能的神”（El Shadday）是El一词的多种变体之一。更有甚者，《旧约》中犹太人反对迦南人所崇拜的异教神祇，却从未反对崇拜埃尔。可见，埃尔正是亚威。

如此看来，可否下结论犹太教坚信一神论，排斥多神论呢？尽管埃尔与亚威合一的证据甚多，柯林斯教授仍根据传世的《旧约》文献举出反例，证明《旧约》各个版本中区分二神之处也不在少数。但在《七十子圣经》（*the Septuagint*）（即新约时代通行的《旧约》希腊语译本）的众多抄本中，划分疆域的依据有些是“天使的数目”，有些是“神之子的数目”。在库兰（Qumran）出土的死海古卷残篇4QDeutj佐证了“按神之子数目划分疆界”的解读。尽管《申命记》多处将埃尔与亚威合一，符合一神教世界观，柯林斯教授与著名圣经学者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同样认为，多神论

思想仍残存在《旧约》中。柯林斯教授进一步给出材料佐证《旧约》中隐藏的多神论世界观。

三、亚威与巴力：敌对或融合？

巴力在《旧约》中是亚威的宿敌，但柯林斯教授将乌加里特神话与《旧约》中的二神关系两相对照，则发现二者关系绝非对立这样简单，有时他们甚至合二为一。比如在乌加里特神话中风暴之神巴力是“驾云者”（rider of the clouds），而在《旧约》中亚威也是“驾云者”。《申命记》第三十三章第二十六节中写道：神“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在《列王纪上》和《何西阿书》第二章中，亚威与巴力所争夺的正是雨神之位。《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八节中亚威说道：“她不知道是我给她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她的金银。她却以此供奉（或作制造）巴力。”若想要五谷、新酒和油，必得向祈求雨神风调雨顺。由此，亚威虽然在主要的圣经传统中与至高之神埃尔合体，与巴力敌对，但在一些片段中承担了与巴力同样的角色。

柯林斯教授指出，若说犹太教早期受到周边地区神话影响导致神祇身份系统紊乱尚可理解，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种亚威与巴力合一的古代迦南的神话传统竟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3年 - 公元前31年）的《旧约》文本中仍有体现。柯林斯教授认为最有趣的迦南神话意象重现是在《但以理书》中于公元前二世纪写成的篇章中。

《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先知但以理梦见海上四风陡起，四怪兽忽现，直到“亘古常在者”（an Ancient of Days）现白发老者像，坐行审判四兽。第四兽被施以火刑，其余各兽被夺去权柄，直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永恒权柄与荣耀。天使告知先知但以理，四兽即是四王，将在世上兴起，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予“至高者的圣民”。

巴力在乌加里特神话中的形象与叙事与《但以理书》第七章先知异象中的描述高度重合。如前所述，巴力是“驾云者”，与海神雅木及其手下海怪激战，被老者埃尔授予王权。柯林斯教授指出，这些重合绝非偶然，亦非孤例。他进而指出，公元前二世纪《但以理书》成书之时，犹太人被异族统治，所以化用古代神话传统刻画异族并不稀奇，奇怪的是两位主神“亘古常在尊者”（the venerable Ancient of Days）和“驾云者”竟作为不同人物在异象中同时出现。

“亘古常在尊者”若是至高之神埃尔，“驾云者”为亚威，难道犹太教直至公元前二世纪仍然相信有高于亚威的神？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亚威早与埃尔合一，此异像中的“驾云者”或为总领天使米迦勒（the archangel Michael）或为大卫王朝的某一王者。更有学者认为，这篇只是《但以理书》作者对《申命记》第三十二章与《诗篇》第八十二篇的解经，并非独立创作。柯林斯教授并不认为这是圣经内部一书对另一书的诠释。尽管迦南地区神话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流传难以

追溯，我们不得不承认，《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再现了大量乌加里特文献中《巴力故事集》中的桥段。

四、耶稣、人子、驾云者

柯林斯教授引证指出，《但以理书》第七章中“驾云而来的人子”曾被解读为耶稣，《新约》的《启示录》大量借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启示录》第十三章中记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第十四章中记有一片白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第一章第十四节有白发老者类似“亘古常在者尊者”，第十七章中巴比伦淫妇的坐骑十角怪兽与《但以理书》第七章中第四个海怪相似。对此，柯林斯教授认为，这决不能作为耶稣就可以被解释为《但以理书》第七章中“驾云而来的人子”的证据，但分析这些意象的连续性、共同点以及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迦南地区神话传统以及《旧约》与《新约》的关系。

最后，柯林斯教授强调，在信仰形成过程中与不同文明接触，执着自己一时一地的理解，强行“正名”必然是偏狭的，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性极为重要。古代迦南地区的神话传统在《旧约》和《新约》中以不同方式得以延续传承，并丰富了基督教本身的教义与修辞。在柯林斯教授看来，在开场中提到十八世纪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尊重儒家文化颇有可取之处。耶稣会士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敬天、祭祖传统与基督教并行不悖，遵循的正是《旧约》与《新约》写作者的精神。

评议阶段，高峰枫教授感谢柯林斯教授展示了深厚的古文字学、文献学与神学研究功底和稳健的学风，由扎实的文献研究入手阐释了重要的神学问题，探讨了多神论与一神论的世界观，并从古代研究入手，阐发了近现代文明交流的深刻问题，为北大师生提供了学术榜样。高峰枫教授向在座师生介绍了柯林斯教授的优秀《旧约》导读课本以及收录了《巴力故事集》的古代迦南地

区故事集英译本（*Stories from Ancient Canaan*），并邀请柯林斯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著名圣经研究学者马克·史密斯的差别与联系。问答环节，柯林斯教授进一步阐释了古代迦南地区诸神的起源和发展，并介绍了当今圣经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

（撰稿：倪云）

146

罗新 | 北魏祭天方坛上的木杆

2019年10月25日晚，“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北魏祭天方坛上的木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咎涛主持。

“北魏祭天方坛上的木杆”是罗新教授以内亚视角解决中国古代历史文献问题的一个生动案例。讲座伊始，罗新教授首先举出正史中几条反映拓跋祭天仪式的史料以引入主题。《魏书·礼志》记载，天赐二年夏四月（据其他史料可知应为四月

四日，古人重要节日之日期往往为重数，而四月四日与七月七日则是北魏传统中最重要（的两日），北魏皇帝于西郊祀天，“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女巫执鼓，十族子弟共七人执酒，并“以酒洒天神主”。《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北魏“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并描述了“木人”上的装饰。这两条史料中提到的“木主”、“天神主”、“木人”，意义相近，都是拓跋祭天仪式上用到的木棍、木杆一类的东西。对于两条史料所记载的木杆数量为何有“七”和“四十九”之差的问题，罗新教授引用《魏书·礼志》

以作解释：西郊祭天所用的木杆，按照旧制应“岁增木主七”，显祖改易前仪，“定置主七”，前后的制度规定确有变化。

北魏人称这种木杆为“木主”、“天神主”，都带有一个“主”字。那么“主”的含义是什么？过去学者多从华夏祭祀传统的角度理解，认为“主”就是其汉字所表示的“神所馆止”的意思，“木主”即祭祀中代表祭祀对象的牌位。对此，罗新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应从内亚传统视角而非华夏传统视角来看待拓跋祭天仪式中“主”的含义。“木主”不是牌位，而应是用来悬挂祭祀牲体的木柱。《魏书·礼志》记载李敞等人告祭天地之后，“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罗新教授认为这才是拓跋祭天木杆最原始与最真实的作用。他进而指出，内亚传统为我们增加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解历史资料的方式——对于拓跋西郊祭天这类问题，应尝试到内亚传统中寻找解释。

接下来，罗新教授将内亚其他时代、其他人群的祭礼与拓跋祭天仪式相对照，从内亚传统的角度分析论证拓跋祭天中的木杆是悬挂牲体所用。

第一个例子是《蒙古秘史》中有关孛端察尔家族举行“主格黎”祭祀仪式的记载。史料主要描述了一个有关祭祀与血统之争的事件：孛端察尔之妾生下的儿子沼兀列歹被质疑非孛端察尔亲生，孛端察尔承认他的血统，使其参加祭天仪式“主格黎”（*jügelü*）；孛端察尔去世后，沼兀列歹的兄弟因不承认他是父亲的血脉而将其从仪式中排除。汉文旁译对“主格黎”的解释是“以竿悬肉祭天”；在余大钧与罗依果



罗新教授

的译本中，“主格黎”也分别被直译成了“以竿悬肉祭天的典礼”与“把肉挂在木棍上献给天的牺牲仪式”。这说明，蒙古祭天仪式中的木杆也是用来悬挂牲体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主格黎”祭祀性质的讨论。罗依果认为“主格黎”不是汉文旁注所说的祭天，而应该是祭祖，因为只有祭祖才不允许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参与。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持相同看法，认为只有家庭或氏族成员可以参加的“主格黎”实际应是祭祀祖先的仪式，且该仪式的核心是在木杆上悬挂牲肉。李盖提还指出，由于喇嘛教的影响，这个词已不见于现代蒙语。另一位匈牙利学者拉约什·伯塞（Lajos Bese）亦同意“主格黎”为祭祖仪式的说法。罗新教授指出，从文献记载来看，内亚传统中的祭天与祭祖并不一定是两种不同的祭祀仪式。据王恽《中堂事记》记载，忽必烈时代的祭天仪式就有

“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的规定，可见蒙古祭天仪式同样将参与人员的范围限制在了家族或宗族之内——因而祭天与祭祖很可能是一回事。

此外，伯塞通过语言学研究与民族志、民俗学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了有关“主格黎”更多的信息：首先，这个词语在现代蒙语里依然存在，意为“献祭动物之皮（带头与四蹄）放置在木杆上”；并且，它作为一种祭祀仪式，在西布里亚特蒙古语人群中保留至今。罗新教授指出，文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往往来源于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个较大的地理空间中的人群，由于互相接触的频繁与和外界联系的相对稀少，就有可能长期保持某种一致的生活方式，并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维持某种稳定的仪式或文化传统。但他认为，我们应对伯塞企图通过搜集各种关于布里亚特人祭祀的碎片式信息来排列仪式顺序以至重建蒙古“主格黎”仪式的做法“保持距离”。

第一，在阿尔泰人群之中，即使同为某一语族甚至更小的亚文化圈的人群，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境，从而产生不同于彼此的仪式；第二，同源或因长期接触、相互影响而近似的宗教实践也会有众多细节变异，仪式更是如此。罗新教授还提到了苏联学者曼志基夫（Manzhigeev）对该问题的研究，后者提供了有关“主格黎”仪式的更多信息：比如祭祀时要将牲体挂在白桦杆上（桦树在其宗教仪式中有重大意义）；可能以日出方向为祭祀的基本方向；献祭动物的肉分成三份，分别用来敬神、分予氏族或家族成员、给予来宾。

然后，罗新教授从外国人对内亚的观察出发，进一步阐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内亚人群所共享的某种文化传统。据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记载，蒙古人布置墓葬时，先将一匹配有鞍辔的牡马的肉吃掉，向马的体内塞以干草，再将其悬挂在木杆上；《鲁布鲁克东行纪》记载了中亚草原南部的库蛮人在木杆上悬挂十六张马皮以祭奠已故者的相似做法；俄国人杰烈维扬科观察到黑龙江沿岸部落的人群也在莹地中央的木杆上悬挂连带马头的马皮和马的四肢。可见在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范围内，都存在着一种可类比的对动物的仪式性宰杀及供养的做法。罗新教授称之为“动物牺牲”。随着文明的发展，“牺牲”的选择逐渐由人转变为动物，再由野生动物过渡到驯化动物。而在没有桌案的情况下，牲体的全部或部分置于木杆上是一个普遍现象。如今，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志调查者对西伯利亚与东北地区此类仪式的观察和调查结果都非常丰富。

随后，罗新教授重新将目光投向传统文献，以观察其他内亚政治体的宗教实践。《金史·礼志八·拜天》记载了女真人同样以血缘划定参与祭天人员的范围的做法，并且特别强调现行的仪制是对辽代习俗的承袭。《辽史·礼志一·吉仪·祭山仪》介绍辽代祭山的做法是在中央立“君树”以象皇帝，前方植“群树”以象臣下，将经过切割的牲体悬于君树，太巫将酒洒向牲体以示祭奠，这与拓跋祭天仪式亦有诸多程序上的相似之处。《辽史》描述太宗祭山还用了“神主树木，悬牲告

办”之语，之所以强调“神主树木”，是为了在汉语表述上能够与华夏传统中表示牌位的“木主”相区别。在《周书·突厥传》中，埋葬死者时插木棍以悬挂羊马头的做法被称作“建标”，此处的“标”亦可视作与“木主”相当之物；除“建标”外还需“立石”，石头的数量取决于死者平生所杀人数，《伊本·法德兰游记》亦记有突厥人雕刻死者所杀之人的木像并将其立于墓前的墓葬习俗。以上正史所记录的内亚各政治体的宗教实践，虽细节上各有变异，但一定程度上皆可互相类比、参照，展现了内亚文化的连续性与多样性。

罗新教授接着指出，目前最丰富的内亚信息与最亲切的内亚材料皆来自清朝，而且它们在语言文字上以双语的形式记录下来——满清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堂子祭天”就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由于汉人不得参与，满人不言其详，外国人群起初对该仪式的观察十分有限，描述也常带有一些想象臆测的成分，比如朝鲜使节就因为“堂”与“邓”发音相近而将“堂子祭天”讹传为纪念邓将军的祭祀仪式。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昭槤《啸亭杂录》等清人的学术笔记揭开了该仪式的神秘面纱：堂子祭天是满人特有的传统祭祀仪式，实际亦叫“设杆致祭”或“立杆大祭”，以立在石头上的木杆作为祭祀的中心。

罗新教授特别提到，台北师叶高树先生对满文《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作的译注使自己的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该书提供了《清史稿·礼志》中“堂子祭天”条的材料出处，大大丰富了有关清代祭祀典礼的信息。从中，我们获知满

清祭祀分成三种，分别是祭神（满语写作 wecere，汉语直译作“跳神”）、祭天（满语写作 metere，汉语直译作“还愿”）与背灯祭（满语写作 tuibure）。祭天的场所就叫做“堂子”（满语为 tangse）。罗新教授认为，这大概直接借自明朝的汉语，很可能就如字面意义所示，表示一个房子或地点；堂子中间是一个满语称作 ordo 的“亭式殿”，“堂子亭式殿”就是清人祭天最常用的祭祀地点，殿前中间石上有神杆（满语为 siltan moo），萨满（满语为 saman）担任祝神人。

罗新教授还指出，乾隆年间职业萨满已经消失，因而此书很可能是一本帮助临时担任萨满之人学习、背诵祝神用语的教科书。萨满理应从皇室女子中挑选 a，但书中没有记录选择的具体标准。立杆大祭在一年的春、秋分两次进行，若出现皇帝皇后不能亲临典礼的情况，则由萨满捧着皇帝的衣服叩头作为代表，这或许可以和拓跋鲜卑如何处理皇帝在“岁一祭”的西郊祭天中不在场的情况相对照。“神杆”用一株只在树梢上保留九节枝叶，其余全部削去的松树制得，并用“黄布袱”包裹起来带至堂子内，于大祭前一日被立于亭式殿前中间石上。除了祭天大典中要用松木神杆，普通的家内祭祀也会用到木杆，如一种夹在两块石头之间，上部有一吸斗的楠木神杆。罗新教授指出，这些木棍在后来已经不再用来放祭祀的牲肉，而是放置纸钱，虽然满人在农耕文明的影响下逐渐改变其生活形态，已经开始使用汉人的桌案放置牲肉，但以木杆为中心的祭祀传统却保留下来。

随后，罗新老师谈到中华古老祭祀文化中的“碑”可能与内亚的“木杆”有类似的功能。《仪礼》有“祭之日，君牵牲”的记载；郑玄注云，“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文心雕龙·诔碑》对“碑”的作用也解释为“事止丽牲”。这种用来栓动物、放牲肉的碑与拓跋木杆形成了华夏文明与内亚文明的呼应。罗新教授从而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是否存在更古老的共享文化？他认为，可能存在一个中华传统文明与内亚草原文明共享文化的阶段，但这种共享文化能追溯到多古老的时候则不得而知。共享不一定同源，同源也不一定共流。随着时间推移，不同文明逐渐分流是正常的现象。

最后，罗新教授总结指出，若从华夏传统理解拓跋祭天木杆，是牌位，代表天神；若从内亚传统理解，则用来悬挂牲肉，本身不是祭祀对象。可见，如果将古典文献放在自身所代表的文化传统里去解释，

就可能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内亚文化具有连续性和多样性，而中国历史也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内亚只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只用周秦汉唐的文化传统来解释内亚历史，一些信息就可能会被遮蔽，一些问题就得不到清楚的解释。除了内亚，中华文化中的华南、长江流域、云贵等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它们在文献中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了痕迹。而只有有意识地运用多文化的视角，我们才不会忽视这些信息，才能对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所了解。

讲座最后，现场观众踊跃提问。罗新教授就“内亚”具体所指的问题补充道，“内亚”原为“内陆亚洲”（即 Inner Asia）的简称，但他所谈的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具体到本次讲座，则指的是说阿尔泰语的人群。

（撰稿：徐铨）

147

卡洛·金兹堡 | 塑造人民：马基雅维利，米开朗琪罗

2019年10月2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塑造人民：马基雅维利，米开朗琪罗”（Forging the

People: Machiavelli, Michelangelo）。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荣休教授、“微观史”进路代表学者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主讲，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章永乐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评议。

首先，章永乐教授代表文研院对金兹堡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金兹堡教授的“微观史”研究与学术经历。随后，金兹堡教授发表演讲。

金兹堡教授演讲的核心观点在于，在16世纪的意大利，存在一种流行观念——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都被视为“disegno”。这个词包含绘画、设计、计划多种含义，它在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政治家创建共和国与艺术家创作雕像被视为具有深刻的共同性。由于共享了这种观念，马基雅维利和米开朗琪罗在各自的作品中都留下了大量的隐喻（metaphor）。这场演讲将通过具体的例子，展现文本证据与视觉证据之间的微妙互动。

金兹堡教授的这项研究，缘起于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Francis Haskell）引用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两段话。在其中一段引文中，布克哈特提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类人物——雇佣军首领（即 condottieri，单数为 condottiere）。他们是一群令人生畏的、蔑视一切道德准则约束的恶棍。得益于家学熏陶，金兹堡教授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了如指掌，他向听众展示了一个著名的雇佣军首领雕像——巴巴托洛梅



卡洛·金兹堡教授

奥·科莱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

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抱有一种暧昧的态度。在他看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罪恶（vice）与伟大（greatness）的奇妙混合，而雇佣军首领就是这一时代特质的集中体现。对此，布克哈特既着迷，又憎恶。他在另一段文字中指出，米开朗琪罗奠定了现代艺术的基本要素，他不受外部限制的创造力，已经展现了未来三个世纪艺术的基本特征——主体性（subjectivity）。

但在布克哈特那里，Kunst/art 不仅仅指艺术，它的核心含义是“人为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国家，就像艺术品一样，也是人为的产物。由此，金兹堡认为，布克哈特的这两段话暗示了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某种联系——一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像艺术家创作艺术品那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不过，金兹堡教授提醒听众，布克哈特的主体性观念，是一个19世纪的后来者将自己时代的观念投射到16世纪意大利

利的客位视角，是一种时代错置。问题是，如果我们采取主位视角，历史行动者又是如何自我表述的呢？

随后，金兹堡引用了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基雅维利使用了一个隐喻。他说，一块未经加工的大理石，反而比一块拙劣雕刻过的大理石更容易雕琢成型。这段话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庭院里一直放着一块巨石。1463-1464年，一位艺术家开始雕刻这块巨石。但他的技艺十分拙劣，半途而废。将近四十年后，米开朗基罗受邀雕刻一尊大卫王的像，于是他重新处理这块巨石。三年后，他完成了工作，就是著名的大卫王雕像。

马基雅维利在其作品中不止一次使用过这个隐喻，意在表达，在那些淳朴的人民中创建共和国，要比在那些已经被文明腐蚀的人民中创建共和国容易得多。在这里，构成共和国的人民像艺术创作的材料大理石，而创建共和国的“新君主”则像雕刻大理石的艺术家。

金兹堡教授推测，米开朗基罗也知道马基雅维利对自己作品的借用，所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也使用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广为人知的“狮子-狐狸”比喻。1519年，美第奇家族的小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米开朗基罗受命为他创作雕像。在完成的作品中，洛伦佐的左臂放在一个长盒之上，这个长盒的一端有一个兼具狮子和狐狸特征动物头像。而这位小洛伦佐·美第奇，正是马基雅维利将自己的《君

主论》献给的那位佛罗伦萨君主。如此多细节的关联，很难用巧合解释。

讲座结束后，汪晖教授发表评议。他对金兹堡教授的微观史研究进路进行总结，作出高度评价，并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塑造人民”的独特经历。他进而提出一个问题：时代错置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我们经常用熟悉的概念去理解不熟悉的现象，因而容易将自己的后见之明投射到先前时代的历史行动者身上。历史事件总是在不同主体的干预、参与之下发生的，而这些主体、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时空宇宙，具有各自的背景、时间观念，因此，后人重构的历史行动者之间的对话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时代错置。尽管在我们看来，他们同属于一个时代，因而也是同步的（synchronic），但这很可能高估了他们相互之间以及那个时代的同质性，同时又低估了他们相对于时代的独特性。例如，马基雅维利和米开朗基罗都是天才，而天才完全有可能产生某些迥异于同时代其他人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他们纳入某一个显著的时代趋势，会不会反而拉平了他们呢？

对此，金兹堡教授进行回应。作为后来人，当我们探究历史时，会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些时代错置的问题开始。例如，我们会经常问，已成往事的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发？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客位视角出发的我们无法进入历史行动者的主位视角。我们应该区分问题和答案，换言之，尽管我们从客位问题出发，但却完全有可能进入历史行动者的视角，理解他们的问题意识、思考语境及其自我表述，

从而抵达主位答案（emic answers）。而要进入历史行动者的主位视角，我们必须考证文本、非文本等证据。正是这种无尽的对话与互动，使我们理解历史成为可能。

作为意大利贡献给世界的一位思想巨子，马基雅维利的学说经历了全球性的传播与接收（a global reception），很多国家的语言里都诞生了类似于“马基雅维利式的”（Machiavellian）这样的形容词。但金兹堡教授认为，概括出一个总体的马基雅维利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对他的简化，因为马基雅维利比我们大多数时候理解的更复杂。任何概括的努力，都难免是强调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一部分要素，淡化甚至掩盖另一部分。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和戏剧《曼陀罗》（Mandragola）中都使用了决疑术（casuistry），一种源自中世纪的决定规则（norms）如何适用于例外（exceptions）情形的古老裁判技艺。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纳尔多（Bernardo di Niccolò Machiavelli）还写过一本书，提到自己的众多藏书。这些书都是马基雅维利成长过程中触手可及的知识资源，因而完全可能隐含了一些对进入其思想世界至关重要的细节。从这个线索，金兹堡教授发现，在贝尔纳多的藏书中，包括一位中世界作家撰写的关于决疑术的书。正是由于决疑术思维，我们在《君主论》中经常碰到这样的句式：“君主一般而言应该如何如何，然而……”——“规则”与“例外”是之谓也。如果我们只看见“例外”，就很容易形成马基雅维利是“邪恶/犬儒主义的教导者”（the advocate of evil/

cynicism）的印象，但他的真实形象显然要比这复杂很多。

在金兹堡教授看来，“规则”与“例外”的存在容易滑向政治的悲剧一面，因为它们很可能被误用。他举了墨索里尼对马基雅维利的简化和挪用（appropriation）。在墨索里尼的时代，新的政治现象出现，那就是“大众”（the mass/la massa）。这个词既指物质（matter），又指人群的集合体，与文艺复兴时期“政治-艺术”之间的联系遥相呼应。但墨索里尼高度简化了马基雅维利，他将后者的全部教导总结成一句话：“像艺术家那样统治大众/材料（the mass）。”进而服务于自己操纵人民，实行独裁统治的目的——尽管简化与挪用也反过来证明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生命力。金兹堡教授追问的是，在今天这个互联网与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政治人物可以直达普通民众，会不会再现像墨索里尼那样试图利用互联网操纵民众的人呢？

最后，金兹堡教授回应了在场听众的若干问题，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吴双）



(二) 未名学者讲座

53

王利平 | 文明化与作为灵魂的民族文化：从涂尔干到土耳其主义的理论之旅

2019年10月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文明化与作为灵魂的民族文化——从涂尔干到土耳其主义的理论之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评议。

讲座伊始，王利平副教授首先讨论了民族(nation)界定的问题。她指出，有三种定义民族的方式值得关注。第一种方式以地理疆域为界，从领土、边界、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把民族定义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领土之上的人民整体；第二种方式形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重视基于公共政治参与的抽象身份认同，不强调原先的种族、血缘差异；第三种方式则形成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后，与法国式的普遍主义民族观念相对，将民族理解为以



李猛教授为王利平副教授(左)颁发聘书

种族和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强调族群的纯正和历史溯源。以此为基础，民族主义便可区分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和种族、血缘上的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前者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将民族看作想象的共同体，依赖强力的现代国家来维持抽象公民认同和政治参与；后者依托种族、血缘来建立民族，但容易催生集权，且一旦国家失败、政治认同无法确立，就会带来种族杀戮或者极端冲突。此二者的对立也一定程度在地缘上体现为西欧与非西欧的分野。

作为成长于普法战争后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始终关心着民族与民族国家的问题。尽管法国的民族主义通常被看作抽象政治认同的代表，涂尔干却恰恰认为个人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不足以建立一个民族。这便呈现出涂尔干与土耳其主义的关联。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在面对民族主义时，仅仅处理种族、血缘上的问题往往是不够的，前文的两种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并非二选一的绝对关系；另一方面，土耳其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卡尔普也直接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因此，理解涂尔干对格卡尔普理论资源的传导逻辑便十分重要。

王利平副教授从两个角度梳理了这一传导关系。首先是涂尔干所讨论的民族构成问题。通过在德国的考察，涂尔干指出，要想知道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就需要通过国民教育，即根据事物的自然原则去了解构成爱国信念的要素。涂尔干认为，人格是社会生活、社会存在的产物，个人无法脱离社会，民族则是构成人格的群体之一。人所必须拥有的集体情感便是爱国信念的基础。构成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中，家庭是最基础的，其上存在部族、族群等，而民族则是这些群体之上更高级的存在，与政治社会相对应，拥有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具备反思性的集体意识，不能被向下化约。其次是涂尔干对民族与世界主义关系的讨论。涂尔干并不否定普遍人性的可能，但他同时认为，普遍人性自身无法构成一个社会，也无法搭建道德共同体。因此，人可能生活的最高程度道德共同体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各民族则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普遍人性、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外，

格卡尔普所处正值奥斯曼帝国瓦解、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年代，身处帝国形态与西方民族国家形态两种世界主义的夹缝之中，处境相较法国同期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早年的格卡尔普支持奥斯曼主义，即以奥斯曼帝国为形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给予帝国内部各宗教、族群更为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打造奥斯曼-伊斯兰民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愈加强大的民族主义影响，加之意识到作为帝国的奥斯曼已然不可能保持同从前一样完整的疆域，格卡尔普转向了土耳其主义。

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土耳其主义是奥斯曼帝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从格卡尔普对土耳其主义的论述中，可见其受到了涂尔干相当的影响：格卡尔普将土耳其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土耳其民族称为“社会”(society)，拥有更集中、更清晰的集体意识，可以与爱国主义相对应；而与之相对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图兰主义则仅构成“共同体”(community)，集体意识在其间是弥散的。在格卡尔普看来，作为社会的民族不同于动物范畴的“人种”(race)，亦高于作为载体的“族群”(ethnic)，其并非个体的自愿决定，而是个体在社会的文化和教育中所吸收的情感方式。

此外，涂尔干对格卡尔普的影响也体现于民族观的进步性(progressive)上。这一时期的土耳其知识分子深受18世纪后于欧洲兴起、以语言学方法为工具的突厥学影响，但格卡尔普则在承认这一作用的基础上，反对去除奥斯曼语言中受波斯语、



讲座现场

阿拉伯语影响的部分，不提倡还原“未经沾染”的突厥文化本源。

随后，王利平副教授详细阐释了格卡尔普在当时政治思潮中的观点。在对图兰主义的辨析中，格卡尔普认为，图兰不等同于土耳其，前者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只能作为精神上乌托邦式的种族共同体存在，而无法带来实质的民族。同样，虽然伊斯兰信仰对土耳其而言是重要的精神资源，但在格卡尔普的观点中，泛伊斯兰主义亦不可构成民族，而仅是宗教群体。讨论奥斯曼主义时，格卡尔普则指出，精英阶层的突厥人在文化品位上已经被奥斯曼文明归化了，因此，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改革措施只能触及上层精英，无法在道德和价值上重新为一般的土耳其民众带来活力，进而不能在实质意义上塑造一个土耳其民族。

最后，王利平副教授总结了格卡尔普对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的辨析。在格卡尔普的观念中，文明和文化在要素上是相同

的，其区别在于：文明具备扩张性、带有世界主义倾向，是可以被传播、模仿、转借的；文化则是民族在自然演变过程中逐渐积淀的集体情感与信念，无法被习得。借助这一区分，格卡尔普希望说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许多改革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没有看到民族的文化特性，而改革所借鉴的文明要素则未能在民族形态中扎根。这正是格卡尔普强调土耳其主义的原因：他认为，首先要拥有民族这样的共同体、拥有健康的道德生活，才可能迎接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

评议阶段，李猛教授指出，格卡尔普实际将涂尔干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对比，后者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涂尔干则认为构成社会的真正核心是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情感。由此可见，涂尔干和康德的理想差异之处正在于，康德认为世界大同的共和国有可能达到，而涂尔干则认为这样的世界共和国没有道德共同体作为基础、缺乏社会内容，因而是不可能的。

接着，重新梳理格卡尔普的分析思路后，李猛教授指出，土耳其的现代策略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在于，古老的东方文明如何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其选择又受到何种限制？在宗教与民族间，格卡尔普选择了后者。从结果来看，奥斯曼的“世界主义”令人不安，但人们并未对康德式世界主义抱持过强敌意。所以，格卡尔普选择土耳其主义是否可以被视为希冀获得世界政治接纳的一种尝试？而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人们今天为何仍会对民族主义感到不安？按照布鲁贝克的分类，依据现代政治程序建立的法国式共同体及其认同政治并不会引起过多负面情绪，因为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不同的民族身份将逐渐弱化。在此意义上，欧盟正是符合

康德式世界主义方向的，但即便如此，近十年来的现实中，民族主义思潮仍不降反增。诚然，民族主义无论对内抑或对外都常被看作某种危险，但涂尔干和格卡尔普的这一关联恰恰表明，如果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道德生活，那么它也无法摆脱“民族”。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到底来自哪里，又为何这么重要？它是不是重建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需的过渡机制？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民族主义所涉及的文化遗产、历史以及地缘政治空间之间的关系，以找出民族主义的真实作用。

（撰稿：张雪冷）

54

陈斯一 | 荷马社会与荷马道德——“荷马问题”再探

2019年10月1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作题为“荷马社会与荷马道德——‘荷马问题’再探”的演讲。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晏绍祥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评议。

在研究荷马道德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棘手问题，荷马史诗到底能被视为通常的伦理学文本吗？陈斯一老师指表示自己看待这个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看山是山”，荷马史诗表达了诗人荷马心目中的英雄道德，是我们研究城邦兴起时代古希腊道德观念的经典文献；“看山不是山”，荷马史诗是口头诗歌传统历史积累的成果，不能当成通常

的伦理学文本去研究；最后，“看山还是山”，荷马史诗反映的就是荷马的道德观，我们应该将其作为重要的伦理学文本去研究。问题是，如何论证最后的“看山还是山”？为了厘清这一问题，需要从荷马问题出发，再过渡到荷马道德，最后进入到对荷马道德背后的荷马社会的讨论。



陈斯一助理教授

关于荷马问题，具体指一系列围绕荷马史诗产生的疑问：谁是荷马？他生活于何时何地？真的有过荷马这个人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还是分别由两个诗人创作，抑或二者分别都有多个作者，甚至是许多世代的作者和编者不断修正和编排的产物？在这一问题上，现代古典学研究有两种极端立场：一种是极端分析派的立场，认为荷马史诗是由许多平庸的编者拼贴而成的劣质大杂烩；另一种是极端统一派的立场，认为荷马史诗是同一位伟大的诗人极尽天赋和才华的不朽杰作。两种立场争论的核心是史诗的艺术统一性。荷马史诗有

没有艺术统一性呢？形式上（结构上）和内容上，是不是统一的？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荷马史诗是口头作品还是书面作品？

弗雷德里希·A·沃尔夫（Friedrich A. Wolf）于1795年出版的《荷马绪论》开启了现代研究界对于荷马问题的探究。沃尔夫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当时希腊人尚未发明书写。因此，荷马（生活于黑暗时代）只能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创作，其作品不可能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长篇巨制，而是短小得多的诗歌。沃尔夫是现代分析派的先驱，受他影响，整个十九世纪的分析派都认为荷马史诗有多个作者，且是漫长历史的产物，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因此重点放在寻找史诗中的历史混乱和前后矛盾。19世纪主流分析派有两大前提：一，长篇史诗不可能由单个诗人口头创作；二，荷马不会书写。对于这两个前提，从帕里到罗德再到纳吉的口头创作论事实上已经推翻了前提一，而晚近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则推翻了前提二。

关于荷马史诗的口头创作论，必须提到被称为“荷马研究界的达尔文”的美国古典学家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帕里认为，荷马史诗是一步步进化而来，他在荷马史诗中发现了“荷马程式系统”（Homeric formulaic system），并由此主张荷马史诗几乎全部是由程式语构成的。这些程式系统由一系列节律（metric）、程式（formula）、系统节省（systematic thrift）组成，对于任何观念和任何节律位置，有且只有一个可用的程式。有了这些程式，帕里认为，荷马完全可以创作出长篇诗歌。

帕里的观点得到罗德和纳吉两位学者的继承和发展。在罗德看来，荷马也许就是从传统缔造出来的程式系统和主题库中安排得比较好的诗歌而已。不过，罗德的理解也就等同于取消了荷马史诗的精神统一性。而纳吉在《最好的阿开奥斯人》中则指出，是英雄史诗的主题决定了其中的具体节律。纳吉的研究很好地克服了程式系统的机械性问题，论证了史诗的创造性。但是，纳吉完全取消了荷马作为个别诗人的作者地位，提出荷马史诗的“统一性或完整性源自于史诗生成中创作、表演、扩散的充满活力的互动”。

针对分析派的前提二，批评分析派的学者提出了书面创作论。口头派对荷马进行书面创作提出了两点质疑：一是书写技艺当时尚不成熟，与荷马史诗的纯熟品质不符（罗德提出）；二是早期书写记载都是短小的碑文或铭文，模拟第一人称的口头表述（纳吉提出）。对此，书面创作论者对这两点质疑都进行了批驳。

针对第一点质疑，奥斯温·默里（Oswyn Munay）认为，“在从口传文化向书面文献转变之时，这种转变通常为诗人尝试创作规模宏大而结构复杂的诗歌提供了动力，它仍然以口传技艺为基础，但利用了新媒介所提供的保存与总体规划的可能性。”针对第二点质疑，H·T·韦德-格里（H. T. Wade-Gery）则指出：首先，能够保存下来的碑文和铭文本来就只适用于记载短小的诗句，而荷马史诗只可能写在极易朽坏的纸莎草纸或者兽皮纸上；其次，荷马史诗本身就是第一人称的叙事。在此基础上，韦德-格里进一步认为，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字母的发明本身就是为了记录荷马史诗。



在前述讨论基础上，荷马书面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可能性目前至少是不可证伪的。那么，荷马史诗是否具有艺术统一性？陈斯一老师认为，应该将口头派和书面派的研究统一起来，它们分别看到了史诗的质料和形式，并援引了塞德里克·惠特曼（Cedric Whitman）的相关研究来佐证这一点。惠特曼认为，“荷马史诗结构的奥秘（至少对于《伊利亚特》而言）在于公元前8世纪晚期几何对称风格的心理机制对口头技术的整合。”在惠特曼看来，《伊利亚特》的结构与安提卡几何艺术（Attic Geometric Art）是相通的，它们都将传统质料（matter）纳入全新的形式（form）。因此，口头传统是史诗的质料，书面结构是史诗的形式。通过细致介绍《伊利亚特》的环形结构，陈斯一老师为大家具体分析了《伊

利亚特》在质料与形式上达到了统一的路径。

因此，我们可以将荷马史诗作为一个严肃的哲学文本来解读，这样便进入到对荷马道德的讨论当中。阿德金斯（A. Adkins）在《功绩与责任》中提出竞争德性（勇敢、智慧）和合作德性（节制、正义）的对比，并认为古希腊道德（特别是荷马道德）以前者为主，而现代道德则以后者为主。另外，阿德金斯认为，竞争德性的根源在于部族式的荷马社会。

不过，朗（A. A. Long）质疑阿德金斯对于荷马的解读。阿德金斯认为荷马道德源自于荷马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但实际上，无论是荷马道德还是荷马社会都是诗人荷马（或者整个古希腊史诗传统）的创造。尽管这一创造必然反映了某种历史现实，但是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还原诗歌和现实的确切关系。因此，朗认为，更加谨慎的做法是“主要通过诗歌的内在逻辑来阐释荷马的伦理学。”

阿德金斯和朗关于荷马道德的争论，关键在于荷马社会的“历史性”。这就转向了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即关于荷马社会的讨论。关于荷马社会的历史基础，研究界大致存在三派观点：迈锡尼起源论、黑暗时代论、城邦时代论。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荷马社会并不对应于任何历史现实，而是混合了不同时代要素的文学构建。关于迈锡尼起源论和黑暗时代论，珀森（Martin Persson）和芬利（Finley）进行过相关研究。不过，二者解释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它们都不够重视史诗的文学性。在这一问题上，陈斯一老师更偏向城邦时代论的立场。城邦时代论的代表人物莫里斯（I. Morris）指出，荷马时

代事物在史诗中的缺席是诗人刻意为之，阿开奥斯阵营的权力结构是对于城邦政治的反映。萨尔（W. Sale）也提到，荷马对特洛伊城的描述反映了古希腊城邦的自我理解，而非对于一座远古小亚细亚城邦的想象。

最后，陈斯一老师回到阿德金斯和朗关于荷马道德的争论。陈斯一老师认为，阿德金斯和朗所看到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英雄道德的张力机体。“荷马道德”并非阿伽门农、赫克托尔、阿基琉斯或奥德修斯的道德，而是诗人荷马的道德，它要展现的恰恰是人性的整全谱系和悲剧性张力。

评议阶段，晏绍祥老师指出，陈斯一老师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荷马史诗的统一性问题，另一个是荷马的道德问题。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有统一的荷马作品，才能有统一的荷马道德。晏绍祥老师表示，他赞同陈斯一老师的看法，荷马史诗应该是一个整体。陈斯一老师从环状结构讨论到几何陶的结构，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探讨当时人的生活方式，以此来论证史诗的统一性，这一论证方法非常具有创新性。但是，如何从历史学角度去证明二者的联系，依旧是个存疑的问题。此外，晏绍祥老师还就荷马史诗道德体系的统一性以及史诗中一些不太合乎逻辑的地方进行了评述。

提问环节，陈斯一老师回答了有关口头创作与书面创作对作品的影响、荷马是否是一个盲诗人、城邦习俗和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撰稿：邵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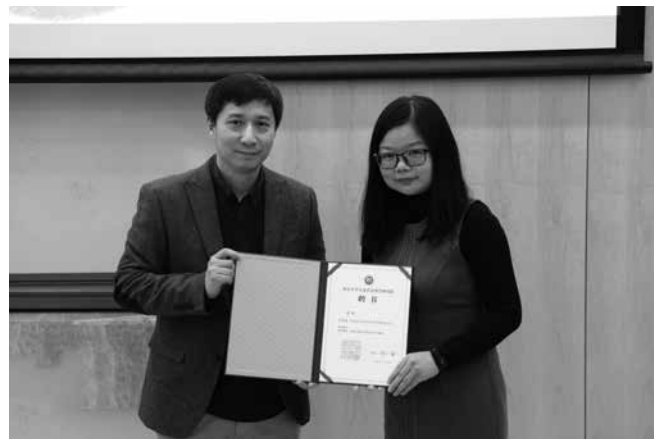
55

范晶晶 | 佛教譬喻、因缘文献从印度到中国的嬗变

2019年10月24日，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佛教譬喻、因缘文献从印度到中国的嬗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教授评议。

在中国古代，佛教曾对人们的文化生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范晶晶博士首先以《隋书·经籍志》为例介绍了六朝时期佛教文献的流行情况。《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汉地的四部经传共3127部，36078卷，其中佛教文献有1950部，6198卷，占比不小，且仅为官方记载。“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六朝时期，民众对于佛经接触较多，并不陌生。譬喻和因缘属于佛经十二分教中的两个分类。譬喻，因缘和本生是佛教文献中故事最多的几类文献，在两种文化发生接触和影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故事内容层面的影响。

其次，范晶晶博士就佛教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题材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早在唐代，段成式就已注意到譬喻因



陆扬教授为范晶晶助理教授（右）颁发聘书

缘文献对志怪小说产生影响，但当时只是发现了一些个例，尚未进行自觉的学术研究。1859年，法国汉学家儒莲从明代学者徐元太编辑的二十四卷《喻林》中，选取了112个故事进行编译。1910至1911年，沙畹选译了500个譬喻、本生故事，详细介绍了以其为代表的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提出“释氏辅教之书”的概念，陈寅恪也发表了系列文章，认为譬喻文献“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郭良鋆、丁敏、孙昌武、陈允吉等一批学者也对譬喻文献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除了前二位学者，大多数学者都基于汉语材料进行研究。同期西方学者的研究则特别强调佛教

譬喻故事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志怪小说直接来自于譬喻，是其衍生品。

上个世纪末，阿富汗发现了一批犍陀罗语的譬喻故事写本，展现了譬喻文献的初期形态，主要分为两类：现世故事（犍陀罗语：avadana；梵语：avadāna）和前世故事（犍陀罗语：provayoge；梵语：pūrvayoga）。二者不太相关，前世和现世并未明确联系起来。公元一、二世纪，在犍陀罗地区还出现了专门撰集、宣讲譬喻故事的譬喻师，这对于譬喻文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到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因果不失的概念深入人心之后，譬喻文献中前世、今生、后世才开始有了密切的关联。《撰集百缘经》即是这样一部成熟的譬喻故事集，如其法译者列昂所说：譬喻故事是“将现世命运与前世所作的业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的训示：现世被认为是前世的结果”，“所有的譬喻基本上都由两个故事构成：现世事件、前世因缘。此外，授记也被认为是广义的譬喻，即现世之业加来生之果。”

然而，总体来看，汉译佛典中的譬喻故事集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不同的梵语词汇都被翻译成“譬喻”。如修辞学意义上的打比方：upamā, aupamyā, sadṛśa；因明学中的例证、说明道理的寓言：dṛṣṭānta, nidarśana, udāharaṇa；文类意义上的譬喻：avadāna。二是梵语avadāna被译成不同的汉语词汇。如《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中的“本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中的“因缘”，《撰集百缘经》中的“缘”。三是“因缘、缘”还可以被还原成不同的梵语术语。如

十二分教中讲述说法背景的文类nidāna，十二缘起中的缘pratyaya，十二分教中讲述两世因缘的文献avadāna。翻译时出现的这种一对多或多对一的情况，给梳理各种文献的特点造成了困扰。发展到中古三部主要的譬喻故事集——《撰集百缘经》、《贤愚经》（又称《贤愚因缘经》）和《杂宝藏经》（其故事皆以“某某缘”为题）时，两世因缘的主旨得以凸显，多元混杂的故事开始向主流的“缘”汇入。

接下来，范晶晶博士梳理了汉译譬喻佛典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对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佛教类书（如《经律异相》、《金藏论》）收录了大量的譬喻故事，《法苑珠林》有73篇末尾附有记录佛教进入汉地后的灵验故事的“感应缘”。唱导师在斋集说法时宣讲譬喻故事，也促进了这类故事的流行。大体说来，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的影响分为两种。一种是题材的直接借鉴，如游地狱、投胎转世等内容。另一种是思想层面上的影响，如《幽明录》中的刘阮遇仙故事，桃源洞天的道教母题被加入了佛教的阐释元素。

敦煌的因缘变文，主要取材自佛经中的譬喻因缘或本生故事。如《金刚丑女因缘》糅合了《撰集百缘经》、《贤愚经》与《杂宝藏经》中的三个故事传本，《欢喜国王缘》出自《杂宝藏经》，《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取材自本生等。敦煌因缘变文实现了文体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的文学性大大增强，二是佛教的色彩开始弱化。

随后，范晶晶博士从文人笔记、话本小说、宝卷、杂剧、弹词等文类中举例说

明因缘轮回结构对俗文学的全面渗透。如元白二人的诗歌唱和、唐人笔记中流行的三生石故事、宋代话本中苏轼的转世传说、讲史话本中的因缘业报框架等等。历史演义中的业报框架有两重功用：一是内容上的劝善惩恶，二是结构上的捏合幻化。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从题名就可看出其因缘轮回的主题；弹词小说类的《西湖缘》、《镜花缘》、《玉钗缘》、《再生缘》等也是如此。

Avadāna（缘）或许可被视为一种文体，与思想紧密相关。首先，在印度佛教的语境下，avadāna本身即是一种文类。其次，汉地成熟的譬喻故事多以“缘”为题，具有固定的模式，讲述前世今生或今生来世的两世因缘。梵语源本的譬喻故事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和套话，传来中国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文体特征表现得相对不太显著。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看待世界、解释人生的思想方式，因缘说在我们的精神与感情

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曹植两次痛失爱女，在《行女哀辞》中质问“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而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则答道：“休怪老天公道少，生生世世宿因缘。”似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问答。

讲座结束后，王邦维教授点评道，本场报告从一个方面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印度佛教文学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关系。转世轮回是印度佛教中的重要概念，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人在思想方面的信仰问题。当前，我们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求我们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对照起来看。

最后，在场师生就譬喻文献中国化的特点、图像学表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撰稿：傅英东）

56

杨清媚 | “燕京学派”的乡土社会转型方案：基于费孝通与林耀华的比较

2019年10月3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燕京学派’的

乡土社会转型方案——基于费孝通与林耀华的比较”。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清媚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

自1920年始，“燕京学派”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新局面，该学术团体的大部分学者后来支撑了中国社会学大陆学界的主干，并承担起1980年代社会学学科重建的任务。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一直是“燕京学派”的中心议题，不同学者的理论兴趣和田野研究领域各有特点，尤其费孝通与林耀华，前者的乡土经济研究与后者的宗族经济研究，对当今学界影响深远。沿着二者研究脉络的差异，杨清媚博士从“土地制度与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气质”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二者对于乡村社会转型方案的不同取向。

关于“土地制度与社会结构”方面，费先生立足于农户经济，对江村和禄村的农民群体、地主、析产习惯、农户经

济和经济态度进行了比较。江村由于城市与乡村的金融关系恶化，对一田二主制造成了冲击。禄村仍能够维持自营小地主的局面，主要是由于雇工经济和“消遣经济”心态的支撑。

林先生的《义序的宗族》主要涉及宗族的土地所有和经营涉及两种性质的族产：一种是发挥着共同体古老的济贫功能的祭田，另一种是针对宗族的共有资源进行族内分配，以房支为单位入股分红的集体产业，比如经营性质的“公司洲”。经营和收益都遵循宗族习惯，在宗族范围内进行。《金翼》中也通过黄东林一家呈现了福建地区的“一田三主制”，也即依附在一块土地上的占有底盘的地主、占有永久租种权的自佃农和占有暂时租种权的二佃农。“一田三主”在傅衣凌的研究中被认为是一种封

建土地制度，其中的地主往往与自佃农有宗亲关系，永久租种权与这点密不可分。永久租种权被视为一种与人身依附关系紧密结合的物权，可以典当或买卖，转移时，三方都必须在场。宗族实际是为了一田三主的三方利益分配背书。东林兄弟是自佃农，分家之前两兄弟是农耕和商铺合作分成的宗族经济，随着东明突然去世，土地不得已转给二佃农，造成农业收入大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家族的经济生活。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农耕和商铺合作的经济模式正酝酿着宗族共有经济的新变化。这点通过比较东明和东林、后来东明和两个侄子之间的两次分家的时候充分表现出来。

对于费先生而言，分家析产的原因来自年轻一代对经济独立的要求，所以出现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一种财产继承方式。这里有父辈和子辈的冲突，新的社会观念和经济观念是经由子辈的斗争被带入家庭模式中。而对林先生来说，分家来自兄弟之间的斗争，首先是小农世界朴素的政治学实践；并且在家庭中出现新的伦理关系和情感关系，比费孝通所说的要复杂，不止是亲子之间，而是家庭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调整。

由此将我们带入了社会的精神方面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杨博士以消费、婚姻和诉讼为指标对费、林二人进行比较。

关于消费问题。费先生讨论过禄村的“消遣消费”，一方面是约束欲望不消费，另一方面却在养生送死关节大量支出。费先生对“消遣经济”持批评态度，原因是它有一种自给自足的心态，

与极低的经济生活水平适配，从而不可能产生接纳现代经济的态度。在《金翼》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例子，比如因为一块糖最终导致东林女儿的惨死。东林本人并不完全赞成上述“消遣经济”的态度。他坚持送三哥和小哥去教会学校读书，即便小哥有厌学情绪，依然以棍棒逼着小哥上学，这并非出于对他们从官仕途的考虑，而是认为这将决定他们以后进入更广阔的世界的机会。东林的心态从这个侧面印证了费先生对“消遣经济”的批评。

关于婚姻问题。费先生在《江村经济》中谈到“家中的儿媳妇”问题和进入工厂当女工后的变化。这个变化首先从夫妻关系开始，进而影响到婆媳关系、亲子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说，家庭伦理结构的现代化以女性进入职场为契机，使夫妻关系不得不重视情感、责任、法律等方面内容。《金翼》中所涉及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则更为复杂。以东林和三哥的比较为例。东林的爱情和婚姻适应湖口镇的商业社会，也是宗族之间联盟和两性合作的产物，而三哥和素珍的婚姻是现代爱情的实现，得到了家族的妥协。素珍和这个家族之间生活方式的摩擦，以及素珍和小哥之间爆发的冲突，都显示了金翼之家全体成员对素珍的接纳意味着对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接纳；家庭不再是一种齐整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也不再是那种基于长期共同生活培养的无需言语的熟悉感，家庭成员的个性、情感需求和经济独立都成为了家庭伦理关系考量的重要因素。

关于诉讼问题。费先生在江村和禄



杨清媚副教授（左）与王铭铭教授（右）在讲座现场

村的研究中都谈到了习俗在社会中充当法律作用，这与《乡土中国》所说的“礼治秩序”相吻合。与费先生的看法稍有不同，林先生认为新的法律观念可以通过旧的习俗制度得以实践，比如在《闽村通讯》中曾谈及的“公亲”制度。后来在《金翼》中，通过东林的山林诉讼案，则显示外部法律权威的援引成为宗族之间博弈的新资源和依据，这和公亲制度不同，不仅观念是新的，在制度形式上也是新的。

上述比较揭示了费、林两人对乡村共同体现代命运的不同理解。对费先生来说，维护家户经济目的之一是尽可能保住乡村共同体的组织形式，避免其在土地市场化过程中彻底成为城市金融的牺牲品，而社会结构转变必须由外部推动。对林先生而言，乡村共同体在现代转型中固然可能有解体的风险，但是它自身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去化解。某种意义上，作为“政治策略”，它可以在组织上适应各种现代经济内容，而现代转型是一个社会内部和外部同时发力的状态。

讲座之后，议程进入评议讨论环节。王铭铭教授在评议中指出，燕京学派具有文化矛盾性，一方面由于其成长的土壤来自于中西交融的教会大学，另一方面则是燕京学派开创者吴文藻其人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努力。杨博士针对费先生和林先生二者的现代性转型方案异同进行了精彩的比较研究，希望对以下几方面进行补充：对费、林进行比较所依托的文

本的历史背景及这些历史背景对文本塑造的影响；对费、林所使用的社区研究法的看法；对于费、林研究中的社会思想，如土地、婚姻、诉讼等，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大社会变革后在当下应如何评价。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也就费、林的研究兴趣之争、及二者经验材料差别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杨博士均做了回应，并表示，关于费先生和林先生的比较研究只是开始，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撰稿：林佩娥）

（三）北大文研论坛

99

李零、李孝聪、韦正等 | 走近历史现场——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追索

2019年9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走近历史现场——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追索”。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副教授刘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博士研究生于志霖发言。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院长助理韩笑主持本场论坛。

2018年6月19-25日，文研院组织了历史学、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甘肃陇东地区进行综合考察，本次论坛即以考察团各位成员的考察见闻及学术心得为中心展开。

论坛开始，韩笑首先介绍了本次陇东宁南地区考察的基本情况。他表示，该地区具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与极其重要、复杂的历史意义，希望在考察中通过借鉴不同学科的方法，走进历史空间，既领略跨学科的魅力，又运用各种知识与方法还原历史真实。



李零教授带来题为“西北考察”的报告。他表示，此次考察是“故地重游”，但依然收获颇丰。他首先将《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北地郡19县重新排序，将考察行经地区与秦汉行政区划对应起来。之后，他向与会者分享了沿途所见的铭刻材

料与祭祀遗址。李零教授对朝那鼎、宁县石家墓地出土铜印等文物上的铭文一一作出了释读，并发现其中大部分为秦物，另还有少许燕国、齐国之物。此外，一行人在考察途中还意外发现了一块汉北地郡瓦当，经释读，得知上面记载的乃是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30年）伐西戎事。关于祭祀遗址，李零教授着重提到了甘



李零教授

肃正宁要册湫出土的由亚驼文写成的诅楚文。诅楚文是金石学领域三件著名石刻之一，另外两件分别为位于宁夏固原朝那湫的湫渊文和位于陕西凤翔开元寺东南的巫贤文——它们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祝告之神不同，诅楚文祭告的是大神亚驼。有学者认为“亚驼”即“溱沔”，与汉安定呼池苑有关，曾经在灾年时被当作难民的安置场所。学界对溱沔河在古代所指有诸多猜测，李零教授认为，它或许就是泾河。此外，李零教授简要讲述了回中道、萧关和回中宫这三处古地名的地理位置。

陇东宁南地区位于游牧与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沿途城寨颇多，李孝聪教授经过对许多城寨的实地查访，带来题为“北宋环庆路、泾源路城镇堡寨考察散记”的报告，主要讲述环庆路（即马莲河流域）、泾源路（即葫芦河川、清水河流域）的宋代城寨的选址变化。首先是环庆路城寨的选址。从古至今，马莲河和环江河谷始终维系着连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和关中一条交通主干道，秦最终从义渠手中夺取了

此地；西汉在马莲河与柔远河（古白马河）交会处设北地郡，正式将其纳入中央控制。秦汉到隋唐时期的经营为北宋城寨选址奠定了基础与范式，北宋前中期即在马莲河、柔远河流域筑城，城寨按环、庆二州分属。此处筑城一可抵御藩部南下，二可策应延州军务、防御夏人西窜。由于环州西北横山梗阻，大小河川多咸水，不堪饮用，北宋前中期西夏军队实际上多从鄯延路之洛水上游入犯。哲宗绍圣开边以后，宋军向北推进到横山一带，在洪德砦以北至横山之间增筑城寨。这些城寨的选址多在两河川交会处，或河流弯曲处的阶地上。如此选址，既可据高险而守，扰乱敌人的后勤，同时可以给驻扎边军、迎战来敌的二线州军以支持。

其次是泾源路城寨的选址。泾源路位于清水河流域，自然环境中从南向北由半湿润、半干旱环境向干旱内陆环境转换，位于该区域的同心曾是北宋与西夏的边界。哲宗以前，清水河流域已筑有三川砦、高平砦等一些堡寨。哲宗时，章粦主持泾源

路葫芦河边事，筑平夏城、灵平寨等，将宋夏边界向北推进到古萧关一带，抵御西夏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李孝聪教授亦指出，唐人在此处招民放垦的历史遗迹与如今贫困荒瘠的区域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重视城寨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宋代以来在葫芦河川地区营建城寨的行为给当地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伤害。最后，李孝聪教授简要介绍了石道坡古道，指出该道路是不同于传统的北中南三线、并与北线平行的一条丝绸之路古道，期盼今后的考察能够继续向西延伸。

第三位发表报告的是韦正教授，他的报告题为“陇东北宋佛教遗存三题”。韦正教授首先提出了包括山西、甘肃、宁夏在内的“大陇东”概念，认为应当对该地区进行糅合考察，然后他围绕三个问题分别展开。第一，陇东南部北魏西魏石窟发达的潜在原因是长安衰落。据统计，在北魏、西魏时期，西安、咸阳地区的佛教造像不足十具，附近地区则流行佛道混合的佛道造像碑（或称“道佛造像碑”更佳），如耀县的北魏魏文朗造像碑，它们更可能是发达的道教吸收佛教以宣扬自身的产物。北魏晚期，长安佛教造像开始复兴，并形成了独特的新模式，陇东一带的石窟寺地位便随之下滑。第二个问题是北石窟寺与须弥山石窟地位此消彼长的现象，前者兴盛于北魏、西魏，在北周衰落，后者则代之而起。韦正教授从交通运输角度予以解释：从北魏前期的都城平城的视角看，控制关中主要是通过马莲河、泾河流域，因而北石窟寺附近地区对于这一从北南下控御关中的交通方向十分重要；而随着北魏

迁都长安，北石窟寺附近地区因为被拉近与都城距离而战略地位下降，由南而北的交通方向导致固原的重要性上升。第三个问题是陇东北宋佛教遗存的民间成分。以北石窟寺第165窟窟门外侧天王、力士像为例，这两具造像都穿戴着铠甲，而按照佛教造像的基本要求，力士一般不穿铠甲。对此，韦正教授认为，这是一种民间性的表现形式。

接着，刘未副教授发表了题为“环庆路城寨录”的报告，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宋夏时期环庆路区域的城寨遗迹。他首先指出，城寨是一种军事性聚落，其兴起和废弃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考古学研究应该将文献记载与实地所见联系起来，对同一区域的城寨进行串联式的研究。随后，他利用地图标点形象地向与会者展示了宋代环庆路的城寨分布情况与发展过程，并重点分析了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该地区的城多以“镇”、“堡”、“寨”命名。这几个概念有时可以互换，但一般而言，“镇”可能是从唐或更早时代的城寨发展而来。刘未副教授特别指出，这些城寨之间原本其实是有人居住的藩部，它们对理解该地区的历史非常重要。对于环庆路的防御作用，他赞同李孝聪教授的看法，认为西夏确实基本不从这条道路进犯，因此主要是用来防御东边的小国。到哲宗朝，北宋大规模向横山进军，因而新修了很多堡寨以巩固防线。这些堡寨在形态上多为三角形或梯形的爬山城，离边境线十来米，基本占据了横山的南部，周边的聚落也随着堡寨的建立与废弃由兴转衰。最后，刘未副教授归纳了军事防御体系中常

见的三种选址：河谷平地、河谷依山傍河处、山顶。其中，环庆路城寨绝大部分处于依山傍河处。

第五位发言的是马孟龙副教授，报告题目为“陇东宁南实地考察收获”。他首先从自己对汉代北地郡灵州县定位的探讨谈起。《汉书·地理志》记载灵州为“惠帝四年置”，《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定位于河水附近；而《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的记载说明，在西汉初年，中央王朝的控制范围仅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此外，反映吕后初年情况的《二年律令·秩律》中出现灵州，而同时所记载的其他西北行政建制在地理位置上均未超过秦昭襄王长城一线——这验证了《史记》关于西汉初年汉匈分界的说法，也为灵州定位于长城以内提供了又一佐证。在考察之前，马孟龙副教授认为，唐代文献所记载的“马岭县西北”这一位置较为可靠。第一，此处恰好位于秦长城以内；第二，《通典》、《太平寰宇记》皆言马岭县为“汉旧牧地”，而《汉书·地理志》也说灵州有“马苑”，两者可相互印证。综合各条信息以及汉县选址一定位于河谷冲积平原的规律性认识，他认为，最终可以将灵州县定位于环县河谷，即今张旗古城、刘旗古城。

但在实地考察这两处古城后，马孟龙副教授发现，它们从城市形制和文化堆积上看显然不是汉代城址。由此，原有的结论被推翻。随后，他却从曲子城出土的瓦当中取得重大发现。该瓦当上恰有“北地县灵州”铭文。又据《后汉书》记载，永

初羌乱中羌人以丁奚城为据点，李贤注所引的《东观汉记》记载丁奚城即在灵州。这说明当时灵州作为羌乱的核心地区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因而在灵州烧制纪念瓦当是极有可能的。通过文献与考古实物的双重印证，他得出“曲子城即为汉代灵州”的结论。马孟龙副教授又指出，该瓦当是罕见的铭文字数较多的纪年瓦当，纪念了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然后，他进一步明确了“东羌”（羌人以陇山为界分为西羌、东羌）在东汉时的活动范围。据文献记载，东汉时大量羌人部落被安置于“青山”，即今天宁夏同心县和环县交界的青龙山。安定、北地、上郡的属国都尉分别设置在青龙山的西、北、东面，据此可推知，汉代羌人应以青龙山为中心分布，其中又以灵州为核心。最后，他简要谈了环江、蒲河流域历史上高层政区治所的变迁问题，发现治所变迁呈现出在董志塬与环江谷地两处摇摆的现象：在承平时期，治所稳定在经济条件较好的董志塬上；而当军事防御需要非常突出时，治所则迁至环江谷地。马孟龙戏称此前自己只堪称“地图历史学者”，而这次凭借进入历史现场，他修正、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取得了意义非凡的收获。

下一位发言的是付马老师，他的报告题为“最后的粟特网络——9-11世纪西域至中原间的粟特人”。付马老师针对学界现存的“八世纪中叶在经历了伊斯兰化和安史之乱后，原本的粟特人网络被破坏”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唐季到五代宋初，西域至中原间依然存在粟特人网络。通过排列唐末到宋初的传世史料可



李孝聪教授



韦正教授

注意到，不同西北政权派出来到中原入贡的使团中都有粟特人的存在，如包含一份回鹘商团题记的敦煌文书中就可明确查考到不少粟特人的姓名。他接着列举了唐季宋初粟特人进入中原的路线与实物中查寻到的河西走廊的粟特人踪迹。于敦煌发现的一封景教组织间通信的信件，大约是在公元884-885年间用突厥化粟特语写成，可验证上述结论。而在此次考察中，他又注意到镇原县博物馆所藏的一个胡人碑能够补全唐季到五代宋初粟特人的分布情况，从而使粟特人网络的存在得到了实物资料的证明。

接着，于志霖带来题为“陇东宁南地区金石材料的分布”的报告。于志霖选取了分布在茹河河谷的几件金石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件是“提举亳州明道宫赐紫金鱼袋郑公墓志铭”，它揭示了宋朝上层士大夫投靠金朝的情形。由于过去所掌握的材料大都反映了宋代西北武人投靠金朝的经过，因此该墓志具有很大的史料价

值。另一件是后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存留禅院记”，通过传世材料可知，周世宗于显德二年五月七日灭佛，导致大部分寺院被毁弃，而该禅院便是一小部分被官方认可从而保留下来的寺院之一。于志霖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刻有大量粟特人姓名的一面是碑阴，这些粟特人姓名不是以集团面貌出现，而是多以与汉姓人结成各种村社的形式而存在；第二，碑阳原有的公文内容已经磨灭，今日所见的是于北宋铭刻的“开宝五年六月十五日重修西禅院记”，此文并无粟特或蕃部色彩。

最后一位发言的是邱源媛研究员。作为2019年7月内蒙古考察活动的参与者，她向与会者分享了题为“游牧与农耕：内蒙古阴山南北考察”的考察心得。邱源媛研究员首先介绍了本次考察的缘起——它聚焦于“华南”和“西域”两个中心词，关注在多语言以及历史人类学的学科背景下，两者将发生怎样的碰撞与对话。她生动地讲述了沿途所见的自然景观，如达茂

旗表现出的纯游牧风格，而返途行经的一些村落则鲜明地体现出农耕色彩。在达茂旗博物馆，考察团围绕一座多语种的划界碑展开了热烈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该碑刻制粗糙，行文表现出民间化状态，可以体现出多语种石刻材料的民间认同性（该问题由赵世瑜教授在7月19日会议中提出）。最后，邱源媛研究员分享了考察中运用多语言分析碑文的难忘经历。该碑文记录的是乾隆年间村落内百姓分水之事。上方是横排的“保”、“什”、“号”三字，考察团起初依据下方横排“甲头”二字推断上方残缺的可能是“保长”、“什长”等。经蒙古族学者包呼和木其尔提醒，“保”、“什”、“号”三字应当按照横读方式组成“保什号”一词，即蒙语的 *bošoɣo*，满语的 *bošokū*，清初期汉文写作“拨什库”，清中后期汉文改为“领催”，为八旗衙署的低级官员，司文书、饷银等事，是清朝政府在非汉地区联系底层百姓的一个重要纽带。

最后，邓小南教授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总结。她谈到，本次考察不仅横跨西周秦汉到宋夏时期，而且汇聚了不同学科背景和特长的资深专家和年轻学者，过程中充满收获和感动。邓小南教授指出，人文学者其实是离不开历史现场的，通过考察与探究，既回应或解决了一些问题，一些思考也构成了深化研究的开端，特别是不同角度的交会，开启了一种从点到面的结构性认识。无论是历史事件、仪式、秩序，还是社会生活、精神信仰，其实都嵌在一种特定时空中，空间既是物理背景的格局，也是思考、认识的格局，在空间中把握时

间的流程，历史才有了流动和立体的可能。通过田野考察，既可获得寻求理解的贴切感，又有宏观层面的格局感。最后，她表示，文研院的考察活动还将继续，欢迎诸位有兴趣有准备的学者，共同推进从书斋到田野的综合研究的历程。

（撰稿：徐铖）

（四）文研汇讲

01

叶晔 | 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固及其意义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为叶晔教授（左）颁发聘书

2019年9月3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作主题报告，题为“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固及其意义”。第七期邀请学者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近年来，文本研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写本时代中文学文本的不稳定性问题，不同代际、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叶晔老师表示，他的研究方向在宋明文学，这一历史时期因为印刷业的发展，文学文本的形态及其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宋明的情况本不适合去讨论中古的话题。但古代文学研究亦须具有通贯意识，他希望在解决明代文学实际问题的同时，看看在“文本”研究的内部，

有否可能形成近世文学与上古、中古文学的一些对话。

叶晔老师首先提出了“文本凝固”的概念，指出这是一种建立在印本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为“全录式”分体总集与大型文学丛刻的编纂、刊印。它由“文本稳定”与“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二者有先后之别，“文本稳定”是一种无关人之精神的技术必然，主要借助宋代印刷业的兴起得以实现；而“文本汇集”是一种时代风气及读者需求驱动下的使然，得益于明代延绵持久的文学复古生态，及明嘉靖以后出版业的复苏与再繁荣。上一个文学复古期（中唐至北宋），因尚未发生印刷革命；上一个商业出版的发展期（南宋中晚期），因没有文学复古之氛围，都不足以完成古典文学文本凝固的时代使命。

近年来，作品异文被视为经典“变动不居”的一种反映，明代在汉唐文学经典化进程中的意义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以莫砺锋、陈尚君先生为代表的唐代文学专家，对明代在唐诗流传、分歧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一视角同样为海外汉学家所认同，包括《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内的诸多研究成果，也强调晚明是“伟大经典的共识得以确立”的时代。在回顾学界已有的研究路径之后，叶晔老师希望将关注点从有关读者接受的社会文化问题，转移至较纯粹的文献文化史问题。他认为可以暂时不去讨论“意义的凝固”，而是先试着讨论“凝固的意义”，探究“文本凝固”如何在阅读史层面形成“经典时代”及“文学代胜”的文学观。

叶晔老师坦言，古代文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一般来说，是作家及其原创的文学作品。

作家的创造力与能动性是评价古典文学的重要标准。明代因有文学复古运动相始终，故评价一贯不高，唯有通俗文学与晚明性灵文学闪光于文学史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学史观中，“经典的终结”的衔接对象理应是“新经典的开始”。但如果我们将“经典的终结”的衔接对象视为“凝固的开始”，那便是一个“古典文学”从鲜活的生长者转变为稳定的宗法对象的过程。若此路径成立，我们或可对“先作者后读者”的传统范式作出调整，换以“先读者后作者”的角度，探究作家个体的阅读经历与知识结构，甚至可以代表某一时代“标准读者”的普遍阅读书籍与常规知识体系。复古思潮中的明代文学，尤其具有代表性。

最后，叶晔老师指出，有关“经典终结”与“凝固开始”的话题，明代并非唯一的朝代，汉代同样是一个“经典终结”与“凝固开始”的时代。西汉五经博士的设立，以及刘向、刘歆等人的古籍整理活动，让先秦文献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各种经部、子部著述，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西汉学人重新编定后的文本。以上文献特别是经部著述在汉代的凝固，深刻地影响了先秦学术在后世的传播。而事实上，集部文献在明代的凝固，对汉唐文学之批评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人“以复古为创新”，正是古人经学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及批评上的一种投射。如果我们将文献文化史视野下的“汉”与“明”，同置于中华文献之文本凝固与思想再创造的历史长河之中，或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亦未可知。

（撰稿：叶晔）

02

李开元 | 跨文类写作与学术研究——以历史学为例

2019年9月10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跨文类写作与学术研究——以历史学为例”。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概要

历史学是什么，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如何从事历史学的工作？是李开元教授多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近年来，思考较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术界将历史叙事排除于历史学之外的做法，是否得当？历史学=历史研究的思维定式，是否是走偏了路？

2000年，李开元教授完成了历史研究的论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以后，就一直在思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为了不流于空想，除了理论思考而外，同时开始做实践的尝试，先后写成《秦崩 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 从项羽到韩信》和《秦谜 重新认识秦始皇》。《秦崩》

和《楚亡》是历史叙事，《秦谜》是历史推理。不过，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历史研究。也就是说，李教授所实践的历史叙事，是基于历史研究的叙事，是打通文史哲的尝试。特别是《秦谜》，更特殊一些，形式上是历史推理讲座，方法上是沟通历史考证与侦探破案的一种尝试。

眼下，李开元教授正在写《汉兴——从吕后到文帝》，是历史叙事三部曲的终结篇。按照新的历史认识，西汉初年是后战国时代，汉初各个诸侯王国的兴亡，是叙事的重要部分。在关于长沙国的叙事中，长沙国丞相—鞅侯利苍的事迹，将是叙事的看点之一。

在今天的报告中，李开元教授用如何补写史书所无的《鞅侯利苍传》的事例，谈谈如何结合文献、出土资料、先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地考察，先做历史研究，再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历史叙事。重点在于从方法和理论上阐述研究、叙事和思想（也就是文史哲）之间的，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

李教授首先写成一篇文章《释“功比”——说鞅侯利苍与平暴侯刘它一》，然后基于这篇研究论文的结论，用文言文补写了《鞅侯利苍列传》，约有一千一百字。

从形式上看，《鞅侯利苍列传》是历史叙事，用今天的分类来说，相当于人物



李开元教授

传记。从方法上看，在历史叙事之前，我们首先有一个历史研究，有了研究的结果，我们才能比较可信地，从整体到个案，从原则到施行，做演绎和推论，进而将史书失载的鞅侯利苍的身世补写出来。

这个案例，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研究和叙事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历史研究和历史叙事，都是历史学的一部分。

进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看法，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有实践的经验，也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也就是历史学的知识结构中加以考虑后的结论。

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思考，李开元教授对作为知识系统的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有了新的认识。借

用一个词“世界”，来表达知识领域。历史学的知识结构，可以用“3 + N”的世界来概括。“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可以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史真）、第二历史（史料）和第三历史（史书）。“N”，是历史学三个基础世界之外的多重延伸，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对于这个“3 + N”的历史学知识世界，稍作解释如下：

1，第一历史：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这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或者叫作第一历，我们可以简称为史真。

2，第二历史：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残存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叫作史料。往事遗留下来的史料，我们叫作历史学的第二世界，或者叫作第二历史。

3，第三历史：根据史料所写成的历史著作，是历史学中的第三世界，或者叫作第三历史。我们可以简称为史书。

以上，是历史学的基础世界。

4，根据已有的历史著作再作编撰所形成的历史作品，属于历史学的第四世界，也就是第四历史了。

5，如果有人再根据这部历史作品再作编撰，比如编成一部历史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属于第五世界，成了第五历史了。同样的延伸，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

从第四历史开始，历史学进入了延伸的世界，也就是N的世界，可以通称为N的历史。

有了“3 + N”的知识结构的归纳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探求不同的历史世界之间的关系。概括而言：信用伴随层次增高（世

界增大）而递减。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历史的史料距离历史真相最近，到了史书的第三历史，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一旦进入N的历史，距离逐渐变远，变形随之加大，信用也愈发地降低。与此相反，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编撰的史书，演生出来的历史故事，编导出来的历史影视剧，则可能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结合上述历史学的知识结构，知识特点来看，历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历史学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科学基础，有两点含义：（1）史料的可信度；（2）解释的合理度。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的人文性，也有两点含义：（1）在历史学的五个基本要素之时间、空间、事情、物品和人当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中心。（2）历史学的本源，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

基于历史学的知识构成，我们可以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所有关于第一历史，也就是关于史真的表述，都是推想，得到的都是史真的镜像或者影像。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阔思路，构筑开放和拓展的大历史学新观念。

一，历史学，是后人基于往事留存的信息，重新认识往事的知识体系，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在科学和艺术之间）

二，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叙事，接近于艺术，须要追求美。研究，接近于科学，必须追

求真。历史叙事，是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叙事，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研究与叙事并重，科学与艺术互补）

三，历史学是人类既有知识的贮存库，是所有学问赖以生成和发展的母体。人类自身和所有学问的演变，都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一切皆是历史）

四，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是“3 + N”的世界。（“3 + N”的历史学）

五，历史学是基于史料对于史真（往事）的推想。（一切历史都是推想）

六，历史是当代的镜鉴，历史学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工具。（一切历史都是镜像）

七，展望历史学的未来，孕育了各种非虚构写作的巨大空间。（历史学是非虚构写作的摇篮）

（撰稿：李开元）



03

姚达兑 | 中国神怪小说的近代英译之聊斋英译



2019年9月17日，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姚达兑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神怪小说的近代英译之聊斋英译”。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闵雪飞老师出席并参与讨论。

姚达兑老师首先介绍了他目前所处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些情况，进而介绍其在文研院所从事的研究计划。在入驻文研院期间，姚达兑老师主要研究近代时段外国人、传教士所翻译的中国神怪小说。这次的报告会分为两方面进行，一是介绍整个写作计划的情况，二是以其中的一个案例（《聊斋志异》的近代英译）作进一步详细解释。姚达兑老师认为，“近代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的外译情况颇为复杂，翻译中的误读，或带一定目的的重新阐释，往往与中外文明互动相关，有时也与时代潮流、社会风气和精神重建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中外文明的近代接触和碰撞，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姚老师首先介绍了整个研究计划的三大部分，依中国神怪小说近代外译的前后顺序而划分，分别归类为“搜神”、“述异”和“朝圣”三个主题。第一个部分主要是讨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人所翻译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神仙通鉴》）等一类的故事。姚达兑老师指出，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正是通过《搜神大全》这类的偏近道教的故事来理解中国的诸神谱系，他们的翻译和阐释是为批评中国和准备传教而作准备的。第二个部分的主题是“述异”，姚老师讨论的是仙鬼狐妖故事（白蛇传、聊斋、妖怪故事等）的近代英译，以此来看外国人对中国人神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认知，进而解释中国神怪小说在近代英语世界的影响。这一部分，姚老师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个案研究，比如关于传教士吴板桥英译的《白蛇传》。姚老师发现，吴板桥（Samuel Isett Woodbridge）通过英译《白蛇传》和《西游记》来“述异中国”，进而批判晚清中国，并宣扬了在中国传教的合理性。吴板桥这种东方主义的翻译，有其时代的局限性。第三部分主题为“朝圣”，姚达兑老师从两方面讨论西方人如何和为何要翻译《西游记》等作品。西方人喜欢将《西游记》、《四游记》一类的小说比作英语小说《天路历程》，突出其历练和朝圣的主题。比如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的英译《西游记》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体现了李提摩太在晚清中国融合中西文化、沟通儒释道耶的种种努力。

姚达兑老师在介绍完整个写作计划之后，还分享了一个刚完成的个案研究——关于晚清在华外交官汉学家阿连璧（Clement F. R. Allen）的英译《聊斋志异》。1874年至1875年间，阿连璧在香港的汉学杂志《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连载其英译的18篇聊斋故事。阿连璧运用了删略、增添、扩写、附注，甚至带有其个人解读的策略来翻译中国故事，意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文明，以便迎合当时该杂志的主编德呢克（Nicholas B. Dennys）关于比较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的思想观念。阿连璧的翻译对各个故事背后涉及的中国文化、制度、风俗、典故，多有详细的介绍。这种阐释性的翻译，具有中外比较文学的视野，同时也涉及了中外比较神话学和民俗学的内容。

姚老师认为，将阿连璧英译《聊斋志异》与此前的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以及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译聊斋相比较，便能发现其译文的更多优点。郭、卫二人因为传教士的身份和基督教的知识背景，采取了“述异”的翻译策略——两人在译介《聊斋志异》时，将中国和中国文化呈现成异质的、落后的、野蛮的状态。这样的



姚达兑副教授

译文带有很强烈的抨击中国社会现实并进行传教的宗旨，而身为外交官、报人的阿连璧则关注于“求同”，其译文相对更加客观忠实。因而，可以说阿连璧的英译《聊斋志异》是一种跨文化阐释，带有其中外比较和文化阐释的目的，也促进了近代中外文化的互动和交流，在其时代有独特的意义。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最后，姚老师在总结时指出，近年来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方面，已渐成备受关注的领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专著。现在学界基本有了一些共识：从明清以降的天主教耶稣会再到近代新教传教士，他们在带来思想冲击、促进文体新变、与本土文化交融的同时，也与社会转型和文化精神的重建密切联系在一起。

（撰稿：姚达兑）



04

肖铁 | 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现代中国的方式



肖铁副教授

2019年9月24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肖铁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现代中国的方式”。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姜南、石立善、李放春、周月峰、田雷、彭春凌、叶晔、姚达兑，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肖铁老师于201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革命之涛：现代中国的群众》（*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研究了

中国从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中，“群众”如何作为核心概念，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思考自我和国家探寻启蒙与革命的想像载体。这本书通过对小说、哲学、诗歌和心理学论著的细读，分析现代中国文化与政治想象中群众的核心性和历史性，更把中国群众话语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全球知识语境下，挖掘被忽视的跨国互动和差异。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综合文学研究、思想史、批判理论和人类科学史，凸显现代人类科学知识的形式、新兴艺术的表现和不断变化的政治诉求之间的纠葛。本次内部报告会，肖铁介绍了这本书在内容和方法维度展现的几个主要问题。

群众的崛起是二十世纪的核心叙述之一。在普遍的政治、文化叙述中，群众不再是帝王或社会精英实施仁政的被动的对象，而成为行动的主体，历史的主角，有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声音。从政客、学者到小说家、诗人，人们都说，现代是群众的时代，现代的人是群众的人，而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动力。在他们看来，呼喊沸腾的群众的爆发成了对鲁迅所说的“无声的中国”的救赎。群众成了现代身体政治最重要、也最持久的想像载体之一。群众的形象与一种关于集合的道德话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与群众的形象在现代中国文化、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相比，关于群众话语的研究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一方面，就关于现代群众叙述的研究来说，近年来，欧美学界出现了一批重要著作。但这些著作都以欧美为中心、立足点，该区域外关于群众的理论和文学作品少有人涉及，更鲜有人把它们放在一个全球性的知识文化流动的语境下来考察。肖铁老师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希望在关于现代群众的故事里填上中国的一页，而且更希望以此反射出欧美案例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中关于群众的研究，也还有问题值得讨论和扩展。肖铁老师举了两个例子。第一是关于群众之“发现”的语境的问题。关于群众话语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文学中的群众形象，而且大多是在两个语境下讨论——一是二十世纪初国民性讨论（鲁迅的小说是例子），二是革命集体主义的流行（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出现是例子）。但二十世纪上半叶，群众成为研究对象的方式以及它被分析被言说的特定形式，不能仅从国民性话语或革命集体主义里找答案。肖铁的研究表明，群众作为研究、表现的对象在现代中国的出现和心理学作为一种现代人类科学学科在中国建立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将其放在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考和处理人类行为的方式在全球流行这个语境下考量。他在书中集中讨论了中国从清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群众被心理学化的过程和方式，分析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语言和阐释方式以如何形式渗入进现代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从而希望读者得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群众理论和叙述的历史性和特殊性。

就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而言，肖铁老师介绍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个人”的发现和现代性的“内转”（inward turn）。现代文学研究往往把这两者视为现代性的标志。这样的解读把对内在真实自我的发现与一些文类（比如日记、自传、成长小说）和叙述方式的流行联系在一起，并将现代心理学视为这种“内转”的理论动因和表现之一。这种理解往往把现代性的主体定义为内向的、孤独的、压抑的、甚至变态的个体自我，并把这个自我与社会/大众、与政治革命对立起来。而肖铁的研究揭示了“群众”的发现和个体性的歌颂之间共时辩证的关系。很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群众的书写，在响应现代性的内转、发现自我的同时，体现出的恰恰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超越个体限制、突破孤寂的欲望。阅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群众的书写，给了我们重新观察这种欲望展开形式的机会。

最后，肖铁老师提出，现代中国群众话语激发主体性，鼓舞行动，既促进也限制了关于团结的表达，因此同时扩展并约束了大众政治兴起时期政治的“地平线”。作为第一本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中群众美学与政治的深度研究，《革命之涛》一书不仅审视革命时期现代群集想像的许诺和羁绊，也同时放眼于后革命时期对集体生命的重新思考。

（撰稿：肖铁）

05

彭春凌 | 从宇宙进化到社会进步：近代中日交互语境中的斯宾塞

2019年10月8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宇宙进化到社会进步——近代中日交互语境中的斯宾塞”。第七期访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姜南、石立善、李放春、周月峰、肖铁、田雷、叶晔、姚达兑、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报告会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斯宾塞与十九世纪的全球思想流动。赫伯

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代表性的思想家，是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学运动公认的知识领袖。作为“第一位全球公共知识人”，他关于政治、宗教、科学乃至生活伦理的种种言论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如巨浪般拍击着大西洋及太平洋沿岸。但是在一战之后，他曾经巨大影响力却几乎被大众和知识界所遗忘。从《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 1851），到十卷本的《综合哲学》（*Synthetic Philosophy*, 1859-1896），他卷帙浩繁、论题纷呈的著述也少有人阅读。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J. D. Y. 皮尔（J. D. Y. Peel）、T. S. 格雷（T. S.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彭春凌副研究员（左）颁发聘书

Gray）、J. H. 特纳（J. H. Turner）等学者致力于对斯宾塞的认知纠偏，认为对斯宾塞的诋毁和唾骂是不公正的——他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2000年之后，还出现了麦克·W·泰勒（Michael W. Taylor）的《斯宾塞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以及马克·弗朗西斯（Mark Francis）的《斯宾塞与现代生活的发明》（*Herbert Spencer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Life*）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著作。与建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理论的达尔文不同，斯宾塞是拉马克主义者，他的进化理论并不聚焦于物种演变，他对进化具有进步性质的信心并不来自于自然选择和竞争。斯宾塞与赫胥黎的差别，则体现在社会政策上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与人为干涉的理念之争。

严复翻译《天演论》（1898），通过赫胥黎的著作来介绍斯宾塞的学说。进化学说强调“天数”（势之自然）的“决定论”（determinism），与中国文化推崇“人力”（人为过程）的“决心论”（determinationism）和唯意志论之间的冲突，乃是观察该学说在中国产生反响的重要面向。斯宾塞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学的基础，可以这样说，一战爆发前，没有一个知识人对美国思想界的影响能够超过他。同时，他也成为明治时期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思想家。

接下来，彭春凌老师以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1898）作为中介，讨论斯宾塞从宇宙进化论到社会进步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从颜永京1882年译《肄业要览》，到1898年曾广铨、章太炎合译《斯

宾塞尔文集》，乃至1903年严复出版翻译的《群学肄言》，中国知识界关注斯宾塞的焦点也从颇有洋务运动色彩的“格致”，渐次转向社会变革等契合戊戌维新变法的命题。以翻译斯宾塞为嚆矢，在十九世纪末，章太炎与严复推动社会进化学说叩开了中国知识界的大门。而曾广铨、章太炎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与日本关系尤深。

章太炎翻译斯宾塞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按自己意愿“再造”斯宾塞的过程——他不仅是译者（传播者），更是斯氏学说的对话者、消费者与生产者。当我们关注的问题从文本翻译转换到思想的对话、消费和生产时，需要引入全球史的视域。这里的全球史视域具体指从18世纪末期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到20世纪初期革命党人章太炎流亡日本时，位于大西洋与太平洋沿岸的英、中、日三地及它们所辐射的三种语言圈交叉和互动的历史。全球史视域也成为解析汉译《斯宾塞尔文集》必要的方法论视域。

从原作和译作的差别来看，进化学说试图以普遍历史的姿态，整体解释宇宙、自然、万物演变，它在进入中国之初，就天然伴随着某种负面的、带有悲情色彩的伦理判断。这样的伦理判断，也成为我们观察进化学说在中国产生效应时不可忽视的心情底色。而针对宇宙天体演变、种群进化变迁以及文字礼俗更革等诸问题，来自不同文明传统的两位知识人隔着时空对话。近代中英间彼此认知的两条接触线，为我们勾勒了衍生上述各项问题的基本知识框架。

最后，彭春凌老师讨论了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斯宾塞及其社会学说。《斯宾塞

尔文集》虽然译自英文作品，但理解其中关键译词的选用，译文所寄予的黄白两种同为“贵种”的情怀，都不能离开彼时以《时务报》为中心的中、英、日间的思想连锁脉络。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斯宾塞热已然退潮。整体说来，日本学界从风靡英国哲学，转向陶醉于德国哲学。而来自英语圈内部反思斯宾塞社会学说的著作亦颇为风行。章太炎于1902年在日本涉猎的西学，大半属于斯宾塞及其后学的作品。而斯氏后学在传承之余，对斯宾塞多有批评，比如，美国社会学家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沃德（Lester F. Ward）。英国学者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传入日本时，也产生了影响。

在此之前，章太炎通过翻译《斯宾塞尔文集》，已建立了一套关于宇宙、社会、人的知识观念。他如何受到在日本所获得的、对斯氏学说新认知的冲击，又怎样因应，并调整自己的观念。这些在之前未见讨论，但却是明治思潮影响章太炎最有意思的关节点。这里面既有负负相加的跨文化误读，也有无意识的曲折影响和继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出中日双向的思想交流拘囿，将近代中日间的思想文化关系具体化地、真正地在全球知识流动、连锁、生产的版图中进行还原和呈现。

（撰稿：彭春凌）

06

李放春 | 探究革命之“道”：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

2019年10月15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李放春作主题报告，题为“探究革命之‘道’——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出席并参与讨论。

李放春老师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自己从事革命研究特别是北方土改研究的缘起、主旨与思想转进的过程。他把个人的治学经历扼要概括为存在自觉、历史自觉、理

论自觉与文化自觉四个环节，并着重提出研究过程中贯穿的两个轴心性问题关怀：中国革命的“现代性”问题与革命现代性的“中国特点”（及其中国文明/文化内涵）问题。

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围绕共产党革命的“现代性”

特征展开。现代性（作为）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基于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特别是革命经验）与以英美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之间的紧张，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以利奥塔、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在中国学界造成的冲击。“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个历史设问乃是针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与现代化理论范式相呼应）提出，以矫治其对中共革命的“封建性”意象的过度渲染。不过，李放春老师认为，研究不宜从先入为主的概念界定出发，而应该（也只能）在这个问题关怀下逐步把握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在以往的实质研究中，通过引入话语—历史矛盾分析、权力分析等研究策略，他尝试考察、勾勒中共在革命中对生产的高度关注、介入、领导及其与翻身（革命）之间生成的“系统矛盾”等现代内容。

报告的后半部分转入革命现代性的“中国特点”及其“文明/文化”内涵这一题域。据李放春老师介绍，晚近十余年来，他的



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为李放春研究员（右）颁发聘书

研究旨趣发生了“文明转向”，越来越关注从中国文明与文化史的长线视野来观照中共革命的“中国特点”，把握革命与文明的深层勾连。譬如，领导权力这一现代权力形式，既有着“国际共运”的观念渊源，而在实践中又烙上了深刻的中国风格。又如，诉苦翻心是中国革命非常独特的政治实践，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或俄国革命经验那里舶来的。那么，中国革命中为什么会生成这样的政治现象？共产党闹革命，为什么特别注重这样的政治实践？如果把它置放在中国的文化脉络里，就有可能得到某种贯通的理解。

李放春老师在报告中介绍了爱森斯塔特等比较历史社会学家倡导的“文明分析”对于中国革命研究的启发意义，同时也回顾并梳理了中国学术史的相关思想资源，如梁漱溟在1950年代初关于共产党革命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开创性探究。进而，他还提出未来开展实质研究的可能方向，特别是韦伯式“谱系学”方法的运用。开

展关于中共革命中的观念、制度等“谱系学”历史考察时，尤其要克服仅仅满足于古、今之间表面的、显性的相似性，应注重挖掘那些深层的、被遮蔽的历史与文化关联。他指出，“谱系学”式的历史考察非常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想当然的目的论式论证，在保持历史研究及其问题意识的时代性的同时避免落入时代的（包括新一轮的“文明”论述在内的）各种话语陷阱。

最后，李放春老师在结语中将自己关于革命之“道”的探究进路概括地表述为“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所谓“道”，不是指先验的“道体”或形上的“道统”，而首先是指那些需要我们经验地探究、梳理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线路，涉及到心态、价值、行动、制度等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在研究中应避免把“文明”“现代性”物化为两种孤立存在的实体，更不能将之

彼此割裂地理解为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性。事实上恰恰相反，它们在实践中是一体而不可分的。他指出，立足于历史实践，探究现代性与文明之际，“致广大而尽精微”，才有可能深刻认识中共革命之“道”。

报告结束后，李开元教授对李放春老师将学术进路作为个体生命历程来加以梳理、反思的报告方式表示了赞赏，并表示，李老师有机地结合了个人感性的体悟与理性的总结。随后，与会学者围绕本次报告的主题展开讨论。景跃进教授提出如何在社会科学更为经验趋向的史学之间有效搭建桥梁的问题，周绍明教授提出普通农民与“枢轴文明”的关系问题及中国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差异问题等。

（撰稿：李放春）

07 周月峰 | 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2019年10月22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周月峰作主题报告，题为“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第七期邀请学者李开元、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

铁、彭春凌、姚达兑、路国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周月峰老师的报告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既有叙述，认为以往的叙述大致分两条脉络，一条聚焦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所代表的倾向

于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胡适等为代表的偏文艺的、改良的轨迹。两种脉络影响深远，但实际上都是以《新青年》同人的声音概括新文化运动，而遮蔽了其他群体的方案。直到1980年代开始，梁启超、《学衡》派等新文化运动“配角”的主张才被重新“发现”。不过，他们有些仍受整体论影响，心中有“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图像，以此为标准，规范、选择甚至裁剪其他方案与行动，反而忽视了其他新文化方案、实践自身的独特性，也未能进一步呈现他们展开“新文化运动”的故事。

梁启超诸人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

报告第二部分，周月峰老师具体分析了“梁启超诸人”（以梁启超为核心的一个读书人群体，包括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勱、蒋百里等）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派在当时所举办的文化事业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办报（包括《时事新报》、《晨报》、《国民公报》）；创刊（《解放与改造》）；成立共学社，出版“共学社丛书”；成立讲学社，邀请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人讲学；接办中国公学，创办自治学院，讲学清华、南开、东南大学等。他们几乎在每一种事业里都成为一股重要力量，转移风气，激起新潮。同时，他们在几项事业背后又生成有一个大致清晰的新文化方案，希望“以解放求改造”，创造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新文化，实现再造文明。其目标和方式都与北大师生辈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既有理念，又有行动的群体，一度让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产生了被包



周月峰副教授

围的紧迫感，可见他们在当时的声势有多么高。并且，他们对当时的观察以及对未来的思考，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在追随与反对之间的文化追求

对“梁启超诸人”新文化方案与行动的考察，不仅让我们重新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同时也加深我们对五四思想界中各群体关系的理解。从以往有关梁启超诸人的研究看来，他们与《新青年》同人的关系，常常是被关注的重点，不过大多是一种“赞同”与“反对”的定性研究。其实，正因为梁启超一派有自己的新文化方案，且方式、目标异于时流，故与其他方案时相冲突。但他们的目的是实行其新文化方案，而不是为了“赞同”与“反对”《新青年》同人。比如，他们前期侧重社会，虽与国民党人相近，但与胡适所主导的“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不同；即使是均侧重社会，却又因主张在预备期

“少管小事”、“养精蓄锐”、“不要做零碎的牺牲”，而被运动中的学生及主张“去作大破坏与大建设的工夫”的国民党人责难。他们后期的文化方案虽调整为多谈思想、学术，却因东方文化的倾向与《新青年》对立常与国民党人为敌，且因放弃了社会主义及具有革命性的社会改造方案而与后来的共产党人为敌。

整体来说，五四思想界是由《新青年》所主导的。梁启超一派想要进入思想界，就无法回避《新青年》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有追随的一面。不过，他们虽整体倾向于新派，但即使在追随时，也常常有调节以《新青年》一派为主导的时代横流的努力——白话文如此，在民主与科学之外强调哲学如是，其他如社会主义、整理国故诸方面也是如此。两派之间的关系是追随、角逐，又有调节。在面对旧势力时，他们都属于新派阵营，但其实又潜伏着矛盾。正因双方同在新文化运动之中，本有竞赛，而新文化方案又有重要不同，且梁启超他们常常想要调节后者，才使胡适一方如临大敌。这样的关系，与其说是赞成或反对，不如说是两种（多种）新文化方案的竞争。

在竞合关系中理解新文化运动的过程

从梁启超诸人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梁启超诸人的理解，甚至有助于理解《新青年》同人，更重要的，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故事的发生情况。梁启超诸人因怀抱以自己的理想调节时代潮流，故在当时的思想界与其他势力常处于时而追随、时而竞争、时而合作、时而对立的交错、动态的关系

之中，深刻影响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走向。他们在竞合中形成自己的主张，塑造自己的形象，又在互动中影响其他群体，最后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整个新文化运动。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他们有没有统一的蓝图，是否完成都不是第一位的——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对于作为整体的新文化运动的构成作用。作为配角的梁启超等人不是整体新文化运动的外在对立物，也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独立的一部分，而是参与整体的新文化运动创造的建设性力量。这对于整体的新文化运动有构成性作用。他们参与了时代的思考，形塑了时代的思潮，在新文化运动风气转变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所以，被历史记忆所抹去的，也不单只是他们的文化观点与作为，更是这一构成性作用。

总之，将《新青年》同人这一“主角”、类似梁启超诸人的“配角”，甚至其他“反派”一起纳入思考，其意义在于为历史提供一个更原生态的舞台。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新文化运动真正回归于历史，我们的研究才能尽可能体现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并且让读者看到文化运动者如何“运动”，以及在当时各方的互动中展现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这样也就改变了我们看待新文化运动的眼光，从考察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东西）转向将新文化运动当作一个过程。这也是“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第二层含义，即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多个群体多种方案互动中形成的一场复合的运动。

（撰稿：周月峰）

08

姜南 | 佛经翻译与汉语演变——“见”字新解、“将无”重考

2019年10月29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佛经翻译与汉语演变——‘见’字新解、‘将无’重考”。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周绍明（McDermott Joseph）、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田雷、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开启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历时千年的文化交流，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汉文大藏经，给汉语和汉文化带来深刻影响，由此构筑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华夏文明。汉译佛经作为汉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可考查的汉外语言接触的产物，不仅是进行中古汉语研究的必用资料，更是研究古代中印语言接触及其对汉语发展产生影响的珍贵资料。然而，如此深远的影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音和词汇层面，更应触及语言的深层组织原则，即语法结构的层面。姜南老师的研究重心就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姜南副研究员（左）颁发聘书

是致力于发掘佛经翻译对汉语演变特别是语法演变产生的影响。方法则是将汉译佛经同其梵文原典进行对勘比较，辨析厘清受到原典影响的演变内容，在此基础上讨论译经语法与汉语语法发展的可能关系。本次报告会，姜南老师分别从“是”（to be）和“不是”（not to be）两方面例说：

一、“见”字新解——从“见笑方家”到“慈父见背”、“人见断绝”

对于汉语史上先后产生又共现于中古的三个“见”字式：“见笑方家”、“慈父见背”和“人见断绝”，以往研究虽能说出它们的分别，却道不明它们的联系，结果难免造成对“见”字用法的误读和诸多解释困境。中古译经及其梵汉对勘则别开生面，有望厘清几个“见”字式间扑朔迷离的关系。它们相继出现，实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合流，即由表被动的狭义受事主语句向表状态的广义受事主语句派生扩展的结果。前附于动词的“见”字，其意义虽渐趋虚泛，但作为语态标记的性质未变。这也符合跨语言的共性。

根据表层构造的不同，汉语史上先后出现过以下三种“见”字结构。

第一类：受事 + 见 + 及物动词 + （于）施事。如：吾尝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曾子见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论衡·感虚》）| 绍、简亦见重当世。（《世说新语·赏誉》）

第二类：施事 + 见 + 及物动词。如：生孩六月，慈父见背。（李密《陈情表》）| 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见吊勉。（《后汉书·虞诩传》）| 吾相遇甚厚，何以见负？（《晋



姜南副研究员

书·罗企生传》）| 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第三类：话题主语 + 见 + 不及物动词 / 形容词。如：旋复在市中乞，衣不见污如故。（《搜神记》卷一）| 向于夜半，人见断绝。（晋竺法护《生经》卷五）| 病不见好 | 个头见长 | ……

第一类“见”字式的特点是，主语位置只能出现动作的受事，而施事须位于动词之后，靠“于”引介，有时也可省略介词“于”。它是汉语最古老的被动句式，甲骨文里已有，其中“见”字用为被动标记。第二类“见”字式，由于施事非同寻常地出现在“见V”前的主语位置而引发热议，主流观点（杨树达 1928；吕叔湘 1943；何乐士 1992 等）认为这种“见”字式不表被动，“见”字为指代词“我”，代动词之后的受事宾语。但这种提法却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问题，如屡见不鲜的受事宾

语浮现（《论语义疏·宪问》：“人不见知我，我不怨不尤者，唯天知之耳。”）、所谓的省略宾语不限于第一人称等。根本问题则是未能说清施事如何出现在动词前的主语位置，如“增删说”（吕叔湘 1943）、“空位说”（王洪君 1991）、“两源说”（魏培泉 2004）、“动词说”（姚振武 1990），等等。

汉译佛经作为中古汉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望厘清几个“见”字式间扑朔迷离的关系，还原“见”字的真实本性。佛经翻译模仿原文被动句语序，使得汉译佛经出现大量“受事 + 施事 + 见V”变异，造成古汉语“见V”被动句语序的重新排列。如：

我闻授记音，心欢喜充满，如甘露见灌。（《妙法莲花经·受记品第九》）< śrutvā vyākaraṇaṃ idam amṛtena yathā siktāḥ sukhitā sma

我等同人法性，云何如来以小乘法而见济度？（《妙法莲花经·譬喻品第三》）< tulye nāma dharma-dhātu-praveśe vayaṃ bhagavatā hīnena yānena niryātāḥ

即白太子曰：大王先见勅，为子作良友。（《佛所行赞·离欲品第四》）< ...ahaṃ nṛpatinā dattaḥ sakhā tubhyaṃ kṣamaḥ kila 等等。

第三类“见”字的出现则代表了人类语言被动语态从表被动到表状态的派生路线，佛经翻译也可反映出这一具有语言共性的演变。如：

闻佛授我决 世光见饱满。（《正法华经·受记品第九》）< tṛptās sma loka-pradyota śrutvā vyākaraṇam idam

古汉语“见”字式的派生扩展和“见”字的稳定属性很好诠释了语言接触和语言派生引发的两种演变，可视为语言演变的一个缩影，即语言接触带来的外部动因和符合语言共性的内在动因，皆可触发并推动语言的发展演变。当然，外部的接触影响须以内在的结构规则为基础，而仅靠内因有些演变也难以发生，如第二类“见”字式的形成。

二、“将无”重考

接下来，姜南老师从汉语史上“将无”类情态词和语言共性角度重新探讨“将无”一词中冗余的否定语素的来源。“将无”或许并非如朱庆之在《“将无”考》中所言，是佛经翻译对原典梵语否定副词 m ā 的仿造，而是情态词“将”及其引导的推测句内隐性否定语义溢出、转移到表层句法平面的结果，旨在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意愿，具有类型学意义。

首先是汉语史上的“将无”及其同类词：

【将无 / 将非 / 将不】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世说新语·文学》）

【其不 / 不其】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左传·宣公四年》）

【得无 / 得微 / 得毋 / 得非】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庄子·盗跖》）

【怕不】这事有七八年了，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岁。（《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

【莫非 / 莫不 / 莫不是】夫人曰：“莺已许张珙。”恒曰“莫非新进张学士否？”（《董解元西厢记》卷 7）

【别不是】车停了一会儿，别不是前边出事儿了。（《曹禺选集》）

其次是具有共性特征的否定赘词。无独有偶，否定词的委婉用法不仅在汉语中常见，世界上许多语言（包括梵语）普遍存在用以增强语义和感情色彩的否定赘词。Horn（2010）等学者称之为冗余否定（pleonastic negation），既见于句法层面，如古英语、法语、斯拉夫语中的 ne 或 n-，中古德语中的 en 或 n-，希腊语中的 ou，拉丁语中的 non，日语中的 nai 等；也见于构词层面，如英语中的否定前缀 un-/de-/dis-（unloosen=loosen；unthaw=thaw）等，是语言共性特征的反映。

曾被认定为“将无”一词来源的梵文否定副词 mā 也是在由祈愿式、将来式等标识的非实然情态句中失去否定功能、成为否定赘词的。所以确切地说，与“将无”对应的是原典梵语非实然情态中的 mā， “将”和“无”分别与“非实然情态”和 mā 相对应。而这种对应是反映语言共性的类型对应，不存在仿译来源关系。

最后，姜南老师探讨“将无”类情态词的产生机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冗余否定产生的动因和机制是在一些词语及相关句子的语义结构中包含隐性否定意义，当说话人感到有必要强调否定的意思时，就加上事实上是赘余的否定词。也就是说，为了强调句子中的否定意义，为了让听话人充分理解说话人的否定意图，说话人不惜为否定意义比较隐晦的词语，在句子的相关成分上再另加一个否定成分。一般总是在否定不如意的事情时，这种强调否定才尤为必要（Jespersen 1924；沈家

焯 1999）。强调对不如意的事情的否定，正是为了突出正面的、积极的事情，其语用动因是人类普遍的乐观原则（袁毓林 2012）。比如：“差点儿 VP”与“差点儿没 VP”、“VP 之前”与“没 VP 之前”等。又如，汉语里含隐性否定的动词：

怎样才能避免今后犯错误 = 怎样才能避免今后不犯错误

我就欠打他一顿了 = 我就欠没打他一顿了

你们一定要小心滑倒 = 你们一定要小心别滑倒

我真后悔买了这件衣服 = 我真后悔不该买了这件衣服

姜南老师最后总结说，“将无”类情态词中冗余的否定语素，也是在强烈的感情影响下，多为强调说话人不乐见的主观意愿时，才从幕后走上台前，作为隐性否定意义的词汇实现，表达更加委婉的推测语气。

（撰稿：姜南）

（五）文研读书

18

樊锦诗 |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的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

2019年10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的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研院首位特邀访问教授樊锦诗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资深教授叶朗，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我心归处是敦煌》撰写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参加讨论。数百名校内外师生聆听讨论。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一本由樊锦诗教授口述、顾春芳教授整理撰写的口述史著作。该书以时间为线索，生动描绘了樊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求学往事，数十年来扎根敦煌、守护敦煌的治学经历，以及与武汉大学考



樊锦诗先生手持口述史著作《我心归处是敦煌》

古系创始人彭金章教授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集中展现了敦煌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甘于寂寞、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传统。

讲座伊始，樊锦诗教授结合自身在敦煌开展研究的心路历程，生动讲述了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两方面的工作经历。提及石窟考古报告，外行人往往将其视为简单的观察记录；然而事实上，要实现报告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是非常困难的。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即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我心归处是敦煌》撰写者顾春芳教授

临行前，苏秉琦教授专门找到她问道：“你去敦煌是做考古报告的，你知道它的重要性吗？”苏教授告诉她，敦煌考古报告就如同汉史学界的二十四史，是历史、考古、人文社科等以敦煌为主题的多领域研究赖以存续的基础材料。带着沉甸甸的学术责任和使命，樊锦诗开启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敦煌之旅，但在编写报告的过程中，她仍遇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困难。第一是报告的完整性。石窟考古报告不仅要求记录石窟壁画本身的故事，更要求对考古所见的全部内容加以描述，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往往会被编纂者忽视。第二是报告的系统性。敦煌石窟规模很大、种类庞杂，因此必须事先对报告内容进行整体规划，特别要统一编写体例，进而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更为系统的科学档案。第三是报告的科学性。石窟考古涉及的知识领域相当庞

杂，仅仅具备考古专业背景尚且不足，而编写团队中的许多人员连基本的考古背景也不具备，“软件”的短板带给樊锦诗教授及其团队很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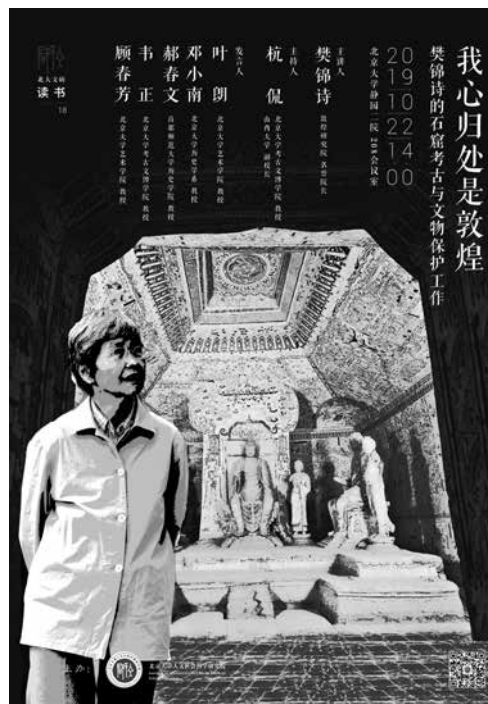
然而为传承石窟考古学的研究传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敦煌学人提供便利，樊锦诗教授并未退缩，唯有一步步摸索、琢磨、前进，最终迎来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问世。报告出版后，她也没有沾沾自喜，而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同行和社会的批评。“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卷报告不仅获得了中国石窟考古学的开创者——宿白先生的首肯，更是获得了英国、日本等敦煌学专家的一致好评。该报告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敦煌石窟考古的原始资料空白，更揭示了石窟考古报告的一般规律，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对此，她轻描淡写地总结说：“我们的人才储备远不及北大、清华、社科院，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既然我们是一个管理机构、研究机构，就有责任向社会提供资料。”

谈及石窟保护，樊锦诗教授则显得万分焦急和忧虑。她指出，保护是第一位的。我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仍有许多待解的疑惑，必须向原始文献和文物求取答案，只要文物和遗产地还存在，后辈学人就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研究。而在没有文字或文字刚刚诞生的历史时期，文物就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依托，如果文物都消失了，研究和开发只能是“水月镜花”。“文物不是玩物”，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应以牺牲文物为代价，更不能乱拆乱改，这是敦煌莫高窟人代代坚守的行为底线，更应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指南。

樊锦诗教授有关石窟考古的所思所感，大多被收录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叶朗教授对该书价值予以高度肯定。他指出，这本书写得好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求口述人的人生经历足够精彩，第二要求执笔人能够把精彩的故事写出来。而要把故事写得好，又对执笔人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她必须和樊锦诗心灵相通，方能深切领悟其人生价值，二是必须为这本书下大工夫。樊锦诗的人生涉及敦煌历史、石窟艺术、佛教哲学和考古学，而这些并不是执笔人顾春芳的专业，因此，顾春芳必须重新学习、下大功夫。上述条件的兼备，才确保了《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高度的思想性、学养性和情趣性。

叶朗教授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本书不仅描绘了樊锦诗这个人，更刻画了敦煌莫高窟人这个光辉灿烂的群体。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提及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还提及了一大批为敦煌保护事业献身的、默默无闻的人。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会计，到手工技艺突出的工匠，再到勤勤恳恳的园林工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扎根于本职工作岗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的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默默无闻，他们人生的神圣性也在于默默无闻。第二，这本书不仅讲述了樊锦诗自己的人生，还讲述了追求永恒价值的“莫高”精神。“莫高”精神就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高度依赖于心灵深处的处变不惊。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为例，敦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

其艰苦，冬天气温在零下四十二度左右，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与此同时，段文杰还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但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段文杰仍坚持思考和研究敦煌艺术，创作出一大批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他说：“只要进了洞，我就会全然忘了烦恼，内心一片平静，‘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叶朗教授认为，贯穿《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的思想内核正是对永恒价值的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仅为亲历者的人生注入了一种神圣性，更照亮了每个读者的心灵。



邓小南教授着重分享了樊锦诗教授与北大、与文研院的密切渊源。敦煌一直是历史学人的圣地，因而，樊锦诗教授与之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2015年，邓

小南教授突然接到了樊锦诗教授的电话，谈及敦煌莫高窟的保护情况，急迫和忧虑溢于言表；同年6月，邓小南教授赴敦煌调研，樊锦诗教授亲自带领团队实地考察洞窟的情况，条分缕析地介绍现状、分析材料，一言一行都阐释着敦煌莫高窟人的使命与担当。正如樊锦诗本人所说，敦煌莫高窟的事业是一步步摸索、试探、总结出来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守护和研究敦煌的事业中耗尽了毕生心血和精力，最终使莫高窟的考古和保护工作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邓小南教授回忆说，樊先生是文研院建立以来邀请的第一批特邀访问教授。2016年9月8日，樊锦诗第一次在文研院举行论坛。此后，有关敦煌莫高窟考古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论坛和讲座，亦在北大乃至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樊锦诗离开北大半个多世纪，但对母校的情感从未淡忘——凡是来自母校师生的请求，她都事必躬亲、尽力去办。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樊锦诗从不避讳自己心路历程中的苦闷与挣扎，句句真实，从不辗转逢迎。然而，这恰恰体现出了她的质朴本真，她看似说话慢慢的、平平淡淡的，但句句经历了深思熟虑，时时展现着敦煌学人的敏锐性和前瞻性。近年来，樊锦诗所获奖项不计其数，然而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心愿还没有完成，也从未停下守护敦煌、研究敦煌的脚步和追求。无论前路多艰难、世事多繁复，她永远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初衷。樊锦诗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脊梁”，她永远是代代学人效法的榜样。

郝春文教授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经历指出，敦煌莫高窟生活条件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体验和承受的。1984年，郝教授第一次到敦煌考察，当地研究人员的生活环境令他十分震惊：宿舍的桌子全部由土坯搭建而成，整个冬天都没有蔬菜供应——而这样恶劣的条件已经优于此前数十年的情况。1996年，他带领学生再次前往莫高窟，在鸣沙山沿途遇到了沙尘暴。沙尘暴如同横亘在大漠的一堵黄墙，几乎要将行人埋在黄沙之下。而敦煌莫高窟人对这样的风沙灾害早已习以为常。可以说，他们所背负的重担非常人所能背负，他们承担的艰辛也非常人所能承担。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樊锦诗教授仍然坚守着敦煌学者的担当和风骨——《敦煌石窟全集》的问世即为明证。郝春文教授指出，这部考古报告至少有以下几点价值：第一，该报告的问世填补了中国学界对石窟考古记载的空白，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第二，开创了石窟考古报告的新范式，为此后的考古报告提供了全新的编写模板和格局；第三，使用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GPS定位等最新辅助技术开展研究，大大提高了报告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说，这部报告是具有双重价值的里程碑式成果，它不仅高度凝炼了宿白、苏秉琦、樊锦诗等学者的探索经验和成果，更为后代学者提供了绝佳的参照范本，可谓总结性、开创性兼具。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夙兴夜寐、皓首穷经，取得了一大批举世公认的原创性成果，从而掌握了敦煌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后辈

学者应以他们为榜样，继续将该领域研究引向深入，为世界贡献中国人应有的智慧。

韦正教授指出，当前国内石窟与佛教考古领域面临较大困境，主要表现在石窟保护和人才培养两方面。一方面，石窟遗址的基础保护工作仍有欠缺，许多重要遗址存在严重破坏和过度开发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敦煌研究院所管理和保护的石窟遗址大多保持了相对完好的面貌，这离不开樊先生及其同事多年的努力和疾呼。面对各方施加的压力，他们迎难而上、通力合作，完成了极具前瞻性的敦煌保护规划，建立了科学的保护体系，为有效保护石窟遗址的原貌树立了杰出典范。另一方面，石窟考古的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存在缺陷，缺少复合型背景人才。石窟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最特殊的门类，仅有普通的考古知识是不足以研究好的，如果没有非常好的考古训练，也无法完成石窟考古。

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开创者宿白先生是历史、考古、佛教等多领域的大家，几乎具备了石窟寺考古所需的全部学科背景。但在现有学科体系下，很难培养出像前辈学人一样兼具多学科背景的考古人才。石窟考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韦正教授还对樊锦诗及其团队数十年如一日的报告撰写工作表示高度赞扬和钦佩。在韦教授看来，每个考古人一生至少应该编写一次考古报告，否则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考古学者。然而，若要一生从事这项工作，却极其考验学者的耐心和恒心。初到敦煌考察的人很容易对当地的一物、一景保持强烈的好奇心；但长期身处敦煌的学者，需要一颗极为强大而平静的内心，才能时刻保持对研究对象的新鲜感和敏锐度，尽量减少报告撰写的差错。这显然是比物质环境或其他困难更沉重的心理压力。



樊锦诗先生与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合影

最后，执笔人顾春芳教授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自己与樊锦诗教授的密切接触与交流经历。在她看来，樊锦诗教授的可贵之处有两方面，一是为学，二是为人。在为学方面，樊锦诗教授总是尽自己所能，提携和鼓励后辈的学术研究。顾春芳教授曾写信向樊教授请教与敦煌研究相关的材料，过了不久就收到了樊教授的回信，信中详细描述了相关材料所在的书籍，甚至具体到书籍的版本和页码。这对于年至耄耋且长期从事繁重的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学者而言，是相当可贵的。为人方面，樊锦诗教授的平易近人和勤俭节约也令人折服。由于敦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长期以来，樊锦诗已经养成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习惯。衣服破了，就找一块新料子补起来；外出吃饭，必定餐餐光盘；旅居宾馆时，她会将用过的一次性制品带回家继续使用。2018年，樊锦诗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荣誉称号，一时间，采访、活动邀约纷至沓来，但她推却了一系列安排，坚持要亲自完成新书的校对工作。这样一位功勋人物，在选择新书的封面时却犯了难——因为樊先生从未拍过一张正式的单人照。震惊之余，顾春芳教授约请摄影师，用一天的时间拍下了这张封面照片。用顾教授的话说：“我们应该把欠她的都补偿回来。”顾春芳教授最后指出，北大的考古学科一直有一种精神传统，就是要守护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之根。贯穿樊先生考古报告和她一生考古事业的正是这种精神气质。

《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不仅记载了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展现了敦煌莫高

窟研究的发展史，更描绘了一代代敦煌莫高窟人的心灵史。为保护这座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一生，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研院也将持续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发挥多学科交流互动的平台优势，与敦煌研究院开展密切合作，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作出贡献。

（撰稿：毕悦）

（六）文研纪念

06

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9年10月12日，由文研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

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富人格内涵、最有思想原创力的学者之一。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成就极其卓越的史学家，先生对中古史、佛教史和语言学等领域有着开创性贡献，对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值此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文研院特举办本次研讨会，以期从不同的视野和全新的研究深入探讨其史学思想和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绵延不绝的影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台湾中研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余位知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家属代表以及两百余位听众参加了此次会议。

上半场

研讨会上半场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三联书店党委书记李三秋、陈寅恪家属

陈美延女士致辞。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桂生，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国蒙古学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迎胜做主题发言。

研讨会伊始，邓小南教授首先回顾了父亲邓广铭受教于陈寅恪先生的始末。1942年邓广铭写成《宋史职官志考证》后，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肯定。先生进而纵论中华文化的变迁，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小南教授深感这一论断简洁深刻、高屋建瓴，不仅激励了有志于宋史研究的学人，也从宏观层面树立了文化评价的准则标杆。陈寅恪先生的一生与学术思想界，与家国民族的命运同乐同愁，对先生的怀念与追思也构成了今日学界的聚焦点之一。

接着，李三秋书记代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辞。他的发言呈现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为人在当代社会的接受历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学术事业的全面复苏和陈寅恪文集的出版，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新世纪史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典范，引发第一次陈寅恪研



究的热潮。如中山大学召开了三次与陈寅恪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也编辑出版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此外，一批个人研究专著也陆续出版。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更是让陈寅恪先生的高洁人格和不屈风骨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三个字也成为精神和风骨的代名词。进入新世纪以来，对陈寅恪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新一代的学人带着自己时代的研究课题、问题意识重新阅读陈寅恪，重新与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展开对话。此外，李三秋书记还梳理了三联书店和陈寅恪先生的渊源，重点回顾了《陈寅恪集》的出版历程。陆键东所

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撰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吴学昭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也皆由三联书店出版。李三秋书记表示，一家出版社的出版品格与作者和出版物息息相关。三联书店早在1956年便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相遇，90年代赓续前缘。这是三联书店的幸运与光荣，三联书店将继续从一代学人学品中汲取精神，坚持自己的出版精神，并向广大的读者传播。

陈寅恪先生之女陈美延女士的致辞着重表达了对三联书店及学界各位专家的感谢。《陈寅恪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刚开始并不顺利，所幸得到三联书店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来自学界专家、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陈美延女士表示，姊妹三人仍致力于搜集先父的文字，特别是手记遗墨，准备出版《陈寅恪手稿集》（暂时定名，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这套手稿集面世，以寄托对先父母永远的怀念。

在学者发言的环节，刘桂生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寅恪师治学精神之感召力——课堂讲授及侍侧忆记”的讲话。作为陈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历史系时期的高足，刘桂生教授回忆了许多陈寅恪先生在讲课时的细节。刘桂生教授称陈寅恪先生为性情中人，他的讲授往往充满激情，带有各种手势，这种情绪在精神上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使学生领悟治学为人务必真切的道理。另外，刘桂生教授特别对陈寅恪先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将来”的教诲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强调，“不忘本来”并不等同于“根据本来”，“本来”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材料。随着科技、学术的进步，对远古的了解也会更加丰富和深刻。考古学为今天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材料，便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外来，则需“充分地吸收、尽量地吸收”，只有这样，创造的“将来”才能是我们自己的“将来”。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蔡鸿生师从陈寅恪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到场，其发言稿由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老师代为宣读。蔡鸿生教授在文中谈及个人对陈寅恪先生学理的认知，认为其中理念与理路，抽象与具体兼而有之。陈寅恪先生的“夫子自道”已讲明：其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1929年《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二，陈寅恪先生以“三目”概括治学轨则：“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934年《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遗书序》）蔡鸿生教授将“脱俗求真”概括为一个理念，将“互证互补互参”概括为三条理路。

从学术实践来看，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两项学术主张，“预流”和“发覆”，正如彩凤双飞翼，两项缺一不可。他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蔡鸿生教授认为，这个

著名的“预流说”为闭门造车的陋儒敲起警钟，有力地促进了敦煌学在我国的发展。陈寅恪先生本人也身体力行地贡献了一批相关论著，如《莲花色尼出家姻缘跋》。至于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发覆”和如何“发覆”，则无论早年问世之作，还是晚年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都现身说法，不同程度地颠覆俗见和旧说，产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应。像这样双向治学，非高手不能左右逢源。就此两项，蔡鸿生教授做进一步辨析：“预流”和“发覆”孰重孰轻？比较而言，新材料的发现可遇不可求，治学之士不能停工待料，其工作常规状态只能是温故知新，即从旧材料（传世的史籍、诗文、碑铭、档案）去找新问题，对旧事物寻求新解释，在故纸堆中化腐为奇。这同样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可惜陈寅恪“发覆”名篇《支愍度学说考》，虽创获实多，却不入时眼，似乎已被忘却。最后，蔡鸿生教授总结道，陈寅恪先生的重大关切是如何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并非什么现世功利。面对陈寅恪的精神世界，切莫随意浮想，做出非学人化的解释。对此，后人应具“了解之同情”。

刘梦溪教授发言的题目为“陈诗‘明清痛史新兼旧’寻解——《柳如是别传》历史书写的‘古典’‘今典’和‘近典’”。刘梦溪教授从陈寅恪诗作入手，重点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家国兴亡”之感。刘梦溪教授认为，陈诗中的“家国兴亡”常与湖南联系起来，如“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或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戊戌政变前后的遭际有直接的关系。



纪念会现场

其父陈三立诗中亦多“家国”之思，以1901年秋所作《遣兴二首其二》为例，刘梦溪教授认为，“俯仰已迷兰芷地，伶俜余吊属镂魂”一句中的“属镂”一典正是以“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自刎”事暗指陈宝箴被慈禧赐死的真相。

陈寅恪先生作于1965年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中“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几乎可以用作陈寅恪先生全部著作的主题曲。陈寅恪先生在历史书写中所用的典故往往投射有自己的家国身世之感，刘梦溪教授谓之“近典”，即“近取诸身”之意。如陈寅恪先生多部著作的命名——《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记梦》或与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一词相关。而词中的“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正是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关键词，“春日酿成秋日雨”也隐含着对悲剧酿成原因的反思，这种反思同样体现在对国民党败亡之速的书写中。刘梦溪教授认为，作于

1963年的“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其中的“新”字或可指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再如《题小忽雷传奇旧刊本》一诗中的“唯有义山超党见”一句，陈寅恪先生流露了对李商隐超越党派之见的赞赏，这也是陈寅恪先生对陈氏家族在晚清历史舞台上超越党争、“优美门风”的体认。

研讨会上半场，最后发言的刘迎胜教授在陈寅恪先生《元代汉人译名考》的基础上引出了若干考证的内容。陈寅恪先生的《元代汉人译名考》以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氏族”记载的“汉人八种”这一史料为基础，针对日本学者箭内互在《元代社会的三阶级》中提出的“汉人和南人未被包括在内”的质疑，运用欧洲东方学的方法，将元代《事林广记》、《元朝秘史》与若干波斯文史料相对照，得出了“陶宗仪记录下的应是‘汉人’一词在蒙古语的音译”这一结论，推测陶宗仪所抄录的资料可能是非汉文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刘迎胜教授进一步指出，“汉人八种”应是

元朝政府为了统治的便利进行族群归类的结果，并不等同于时人的自我认同，也即这一史料并不能说明“汉人八种”所列的族群都已被汉化。第二，刘迎胜教授还针对陈寅恪先生引证的一条波斯文史料（见于拉施特《中国史》）提出了新的翻译和读解。第三，刘迎胜教授特别强调，辽金元时代的南人北人区隔明晰，史料的上下文语境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陶宗仪提及“汉人”时不写“南人”情有可原，箭内互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历史语境。最后，刘迎胜教授在陈寅恪先生的结论上提出进一步的假说，认为陶宗仪在誊录氏族材料时很可能不理解这些外文材料的意思，且元代知识分子追溯氏族的行为或许出现在科举这样的场合。刘迎胜教授总结道，时至今日，纪念陈寅恪先生最好的方式，应当不墨守成规，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继续前进。

下半场

研讨会下半场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国强，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湄参与讨论。

座谈会开始，杨国强教授从陈寅恪先生的三段话入手，谈论了文化迁流中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第一段话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知

识分子必须回应西方，直到五四运动时要求彻底反传统，陈寅恪的“不古不今”正是对这一段思想历程的反思，认为需要确定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第二段话是陈寅恪预言“将来所止之境”乃“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中国文化自繁至简，造极于宋学，近千年的文化发展脉络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当西学变为中国之新学的时候，只有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才能更好地吸收西学。第三段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其实是在要求激发文化与思想的自觉性。面对外在世界潮流的挑战，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潮流作为存在方式，但是陈寅恪正是要求摆脱潮流，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具有精神上的斗争性。

王汎森研究员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与《论再生缘》中使用证据和推理的方式。王汎森教授指出，陈寅恪先生使用的许多论述证据其实是带有象征性的。他注重发掘普通的事实背后的多层次的诠释空间，其创造与生成背后的动力。对层层文本套叠、种种的事实杂糅，以及对文本编排顺序、时间与空间变迁的重视，构成了陈寅恪之论述证据与论述方式的独特面向。陈寅恪在坚实的史料功底基础上，将这些无法明言的证据运用地神龙见首不见尾。此外，《柳如是别传》中叙述了文人之间互相标榜、党社斗争、书生谈兵、舆论风起的故事故，生动地反映了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风气。王汎森教授认为，《柳如是别传》就是通过特殊性显现了社会普遍的风貌，绝非仅仅是柳如是与钱谦益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接下来，陆扬教授以“为何唐史，再论陈寅恪史学方法的思想资源”为题谈论了他的看法。陆扬教授认为陈寅恪可能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史家，把现代性的学术方法融入传统研究，但是有其特殊性，使得陈寅恪的方法难以完全模仿。陈寅恪方法的精髓是古典与现代方法的不断对话。他对史学的论证可能存在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地方，但是也正是在这里，反而体现出了陈寅恪先生的历史感。他有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但是大论断最终会落在十分具体的史实上。这两者结合的背后是一种特殊的思想结构，这特别体现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有着极强的想象力，也有着对士大夫之间默会之意的精确而微妙的把握。

陆扬教授指出，陈寅恪先生对唐史的特别关注仍然需要进一步解读。陈寅恪转向唐史研究，固然与中国学术的专业化、清华大学的学制改革有关，但是也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陈寅恪对唐史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他将晚清与晚唐相比，存在着一种视域融合。两者都存在种族、胡汉、党争、外来威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晚唐有相当长的承平时代。陈寅恪对唐史的观察来自两个不同的传统，并且两个传统中存在断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完全是制度史的研究方法，但是到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却是延续着宋代史学的脉络。进一步地，陆扬教授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写作很可能受到欧阳修、司马光、朱熹、张之洞的重要影响。陈寅恪先生的知识结构值得进一步探索。最后，陆扬教授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极强

的自我意识，使得他获得了极为敏锐的历史感觉。

接下来，侯旭东教授就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句话发表了看法。这句话体现了中西汇通背景下的一代学者立基传统，融汇新知，开辟新途的构想。在他的影响下，学人虽有所实践，但这一方法可拓展的空间广大，值得我们赓续前贤，继续探索。清代出现的训诂通经明道的传统，与西方学术的刺激，以及与史语所同仁的交流，都是陈寅恪先生这一看法的渊源。这一看法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杨联陞与罗常培。杨联陞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文化中的“报”、“保”、“包”》以及他所提倡的“训诂治史”，罗常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都是对训诂学方法在社会历史政治领域运用的进一步拓展。到了21世纪，文字学、训诂学、历史学之间断裂的传统还占据主流：文字学与训诂学之间打通不易，文字学与史学之间亦是相互分离的。侯旭东教授强调，借助语言学的积累，可以打通古今中外、表达与实践等等，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沈卫荣教授主要谈论了陈寅恪先生在语文学上的贡献。从陈寅恪先生主要的学术著作来看，他是一个杰出的东方语文学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从世界范围内也是语言学的黄金时代，直到学术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才把语文学遗忘了。陈寅恪先生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学习掌握了多种语言，并且不限于语言，在其广博学识的基础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于一隅，其对语言的学习是为历史研究、佛教思想研究服务的。

接下来，景蜀慧教授从缪彦威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段交往谈起，申发了陈寅恪对缪彦威的学术影响。景蜀慧教授详细分辨了陈寅恪、方豪、缪钺的书信往来，厘清了三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得知缪钺先生虽然没有能够亲自见到陈寅恪先生，但是得到过陈寅恪先生的书信勉励，并深受陈寅恪“文史互证”方法的影响。

最后，江涓教授以“陈寅恪的‘士大夫’论——陈寅恪与中国史学传统”为题发表了看法。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在中国现代史学界有研究示范作用，他勾画了统治集团势力形成、竞争、消长的长时期历史过程，给出了中古历史脉络的总轮廓。江涓教授认为，陈寅恪历史研究与撰写的主角始终是士大夫阶层，其看待事件、制度、结构动力关系都因人而起。陈寅恪的历史情感主要体现在《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但是在中古士大夫身上也是寄托颇深，存在古今的对话关系，借助这种对话关系，能够进入历史内在的心灵世界，产生古今相容之境。

江涓教授指出，陈寅恪的“知人论世、读诗治史”两句话，对他的整体研究有方法论意义。传统史家通常以“究盛衰之故”为自己治史的目的，陈寅恪也以此为目的，但是他并不将盛衰之故推给天道。陈寅恪先生把自己研究的眼光，从个体的人深入到集体的人，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史的眼光和方法。个人的因素、偶然的事变都有关键的作用，但是政治家的成功也有其原因，是因为能够以人力利用和造就时事，关键在于能够“操纵分合”，从而用科学的方

法呈现了历史的变动。江涓教授着重强调了陈寅恪先生对历史主体性的重视。此外，江涓教授指出，陈寅恪特别强调从家学门风——家世传统和少时熏习——入手对个人的理解。这两点又不是被动地作用于人，而是通过主体性的酿造和创成，成就了人的历史塑成。

最后，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作总结发言。他谈到，《论再生缘》的文本流传过程反映了陈寅恪先生与他的弟子周一良、蒋天枢等有十分深厚的传承关系；八十年代开始对陈寅恪先生的纪念，其实是对其学术衣钵分门别类进行继承的表现。陈寅恪先生启发我们思考，在今天如何建立起中国的人文学术传统。传承学脉是一代代学人的使命，也是文研院举办“文研纪念”系列学术活动的意义——纪念学术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寄托后辈学人的怀念，学习为人、为学之精神。

（撰稿：周观晴、王诗瑜）



（七）菊生学术论坛

15

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典籍传承与学科融合

2019年10月13日，“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典籍传承与学科融合”。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数字图书馆实验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中宣部出版局古籍处处长章隆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张久珍到会并致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数字人文领域资深研究人员以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书局等相关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记者全程参与。

嘉宾致辞

论坛伊始，王博副校长、邓小南院长、章隆江处长与张久珍主任分别致辞。王博教授表示，很高兴看到多位兄弟院校的同行们在共同推动数字人文领域的工作，这彰显了这个领域的活力。数字人文本身是

学科融合的产物，在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各学科都会有新的发展。在学校层面，北大致力于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增长点；在教师的层面，老师们对学术有执着的追求，勇于探索新的领域，学校也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邓小南教授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为当代的学术提供了各类电子资源和研究工具，而且改变了人们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方式。数字环境下的中华典籍传承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传承是纵向的脉络，学科融合是横向的疏通。用新兴技术来重构和利用古典文献，在互联网背景下传承典籍的同时，也激发新的研究课题，形成新的研究契机。互联网的优势正在于跨领域的学者互联，数字与人文的连接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综合研究平台的构建，是人文与科技连接与整合所带来的根本性突破。

章隆江老师回顾了全国古籍整体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取得的成果，并梳理了今后古籍数字化的思路和重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从编制国家古籍数字化的中长期规划、制定国际古籍数字化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加

强对古籍数字化及其开发利用研究的支持保障力度和推进古籍数字化人才教育培训等几个方面来贯彻落实中央提出来的“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政策。

张久珍教授就数字人文如何在国内发展提出了几点看法。第一，期待国内富有远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能够尽快建巢，为数字人文人才提供平台。第二，数字人文的理念方法，能够成为国家新文科建设，跨越人文和社会，促使信息技术与人文相结合。第三，注重人文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聂华介绍了国内外数字人文发展的整体概况以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的已有积淀，作为此次论坛的预热。她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球已经建立了二百多个数字人文中心或研究机构，但百分之九十以上位于北美和欧洲，我国亟待加强数字人文领域的建设。



王博副校长发言

主旨报告

接下来，论坛进入主旨报告阶段。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军教授首先作主旨发言。他认为，传统典籍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而网络化、社会化、智能化的数字媒体已经彻底改变了各门学科的学术生态环境，我们需要用新技术来重构传统人文资料，以互联网新生代所习惯的阅读和认知方式来呈现传统典籍，在触屏时代传承优秀中华文化。

王军和数字图书馆实验室的同学们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宋元学案》知识图谱可视化系统”的设计和研发。将二百四十万字《宋元学案》所记录的两千多宋元理学学者、近百个学术流派所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著作等提取出来构造知识图谱，提供可视化展现、交互式浏览、语义化查询等功能。读者可以纵观宋元两朝学术史的衍化脉络和师承关系网络；然后选择感兴趣的人物、地点、事件或者学说来汇聚相关的资料，观察学者的游历行迹，阅读其学说的精华片段等。除了便利学术研究，该项目为青少年通过互联网接触、学习儒家理学思想提供了路径。

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石教授与中国出版集团编审、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张力伟研究员一同介绍了清华大学的数字人文研究及中国古代知识工程建设计划。

刘石教授提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整合了学校中文、计算机、统计学三个学科的力量，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开展了“大数据时代的古代文学文本分析技术研究”课题；拟结合重大招标项

目进行古典诗歌分词及知识图谱、声律模式、风格等研究；紧锣密鼓地筹办拟于今年底或明年年初创刊的《数字人文》。同时，人文学院也希望开展基于全部存世古籍的“中国古代知识工程”项目以构建巨型“古籍数据库”。随后张力伟研究员回顾构建古典知识库的起源，并介绍了以人物事件为知识单元的古典知识库的原理以及基于此的相关研究。

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王厚峰教授以词表示为例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的最新进展。王厚峰教授先是总结了语言处理的两类问题（一是分类问题，二是序列转化问题），再说明机器对于古典文献的理解的困难所在，最后介绍其团队在构建词表上的工作与取得的进展。近几年来，一种全新深度学习的词的表示方法——动态词——在基于大量训练预料的模型上表现优异，并适用于多种任务。比如，在问答应用中，训练好的模型不仅可以处理词语层级的任务，也可以处理句子层级的任务。

随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教授讨论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的发展与未来。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在历史地理学科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这也就使得GIS对资料数据的要求更高，需要大量的考定工作。历史地理信息化方面研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不同时期数据的基准地图的选定问题，数据来源复杂且精度不一等。张晓虹教授也对GIS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包括发展面向历史信息数据的应用分析、数据的标准化以及贡献者的地理信息系统。在未来的工作计划中，GIS将建设成一个提供时空框

架、地名查询以及古旧地图浏览的综合性数据平台。

古联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洪涛介绍了从古籍整理数字化到数字出版的转变。他指出，在此过程中，中华书局承担了两项重要责任：一是古籍整理，二是技术支持。同时，中华书局也为编辑出版提供了服务。在编辑方面，通过开发编校平台来帮助编辑完成工作量最大的引文核对的任务；在校对方面，通过流程的改造设计了众包平台，实现了大量从底本到整理本的校对；在排版方面，基于同一平台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自动生成已排版文件。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晓光教授讨论了面向数字人文的智慧数据资源建设的逻辑与路径。回顾数字人文发展的历程，文献资料的数字化不仅仅是文献资料载体的转型，也带来了思维的变化。计算思维在人文领域里的萌芽致使出现了人文计算这样一个概念。而今天之所以不叫人文计算，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是我们对一个事物认识的转换过程。同时，人文的发展对整个人文学科来说也带来了三个层面的创新：在方法层面，我们可以利用新的数据资源；在工具层面，我们还开发了新的工具平台；在问题层面，人文实际上转化成数字人文。王晓光教授强调了数据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重要性，数据资源的建设（尤其是海量数据的汇集）或许可成为重大学术创新的关键。数据本身应该具有情景化的特征，可作为微型出版物，并可通过如知识图谱的关键技术来处理。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永明讲解了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的今与明。通过与哈佛



论坛现场

大学合作，我们构建了学术地图平台。目前在平台上发布了六百多幅地图，包括涉及各个领域的六十多万条数据，主要偏重于人文领域——既有个体的数据，也有群体的数据、作者的分布、或目录的分布。学术地图有这样一些功能，比如说浏览，可以在一幅地图清楚地看到密度情况，也可以在地图上阅读四库全书提要，还可以提供985高校的航拍图。这样的平台有几点意义：第一，提供一个综合性地理信息数据发布平台；第二，提高中国在大数据建设中的话语权，避免出现“数据在中国但数据库在国外”现象的发生；第三，为政策决策、社会服务、科学研究提供服务；第四，大数据学术平台加S技术运用，为智慧旅游助力；第五是为中小学生学习国情、省情、地情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涛介绍了数字时代历史叙述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家是通过感知文本、感知史料来表达对这个

世界的看法。书写历史就是所谓的叙事的过程。传统的历史书写有各种各样的表述，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词是文字、文本、文献。历史的书写大都是用文字、用语言，或者说它的载体主要是文本的。除了数字人文数据库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用新方式、新媒介、新手段，去表达我们对世界的感悟。很多史学学者已经在做相关的尝试，如网络史学、公众史学。但这样一个新兴发展的、概念还不统一的研究领域，还需要学院派的理解和关照，用一种更通俗的、更活泼的语言传递给公众。所谓的故事地图，实际上就是为历史叙述创造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对于故事的展开、历史的叙述非常重要。即便故事地图给大家展示的是学者虚构的一本书，其提供的非常场景化的状态也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京臣汇报了社会网络分析视阈中的家谱、家族与家学研究。数字人文对古代文

学的研究而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的方法和新的领域。方志和家谱是两种结构性是非常强的文献，便于利用技术的手段抽取信息进行结构化的处理。通过处理家谱文献，可以来判断这种文献能否包含真正意义上的家学，其中包含了一个家族所有的诗文、辞赋、科举等。在研究家风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基于家谱构建一个时空系统。这里包含两类研究：一是纯地理类的系统（用于具体定位），二是家谱中所反映的人文地理类的系统，如迁徙模式、家族世系图，从而以家谱、家集所收的家族成员的文本来看社会网络关系。刘京臣研究员也通过两个不同类型的家族——清溪沈氏和太原王氏介绍家学研究的背景与框架。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讲师胡韧奋与文学院讲师诸雨辰展示了他们利用计算语言学处理古籍的进展。胡韧奋老师首先介绍了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在自动断

句和标点工作上表现优异的神经网络模型——BERT，并通过和词向量的表示方法比较说明使用BERT训练语料最终应用于中文处理任务的优势所在。随后，诸雨辰老师分享如何将自然语言处理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话语部分进行数字人文研究。在唐诗题材的自动分类任务中，通过尝试可以发现诗体和主题之间是有关系的，也发现可以通过机器学习来验证“拗救问题”。此外，构建领域知识图谱以及搭建基于知识图谱的搜索引擎，不仅可以进行可视化的展示，也可以基于计算来进行其他研究。比如，知识挖掘、云计算和难度分级、微信小程序，既可以从教育的角度，也可以从传统的角度去做尝试。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战蓓蓓介绍了其在数字人文教学方面的经验。在如何面对数字人文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的问题上是无法避免学科差异的，现有的工作模式只能提供大概的印象。比如说，

人文学者（或技术人员）若要按需开发项目，跨学科的挑战和常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且我们对彼此之间有想象力的制约。就教学来说，我们面临个体教学、团队教学、远程教学和现场教学等场景，还包括技术、知识和项目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之间要合作，导师之间要合作，项目之间更要合作。

圆桌讨论

接下来，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史睿主持了主题为“数字人文与学科融合”的圆桌讨论。他表示，数字时代下的知识载体迁移问题值得各学科的学者们深入思考。来自学界和业界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的角度阐述了对主题的见解和看法，并展开热烈讨论。

史睿老师提到，现有的数字人文项目可保证知识迁移过程中比历史以往更顺利妥当，不会丢失人类既有的知识经验智慧方面的成果，同时也启发着我们，在载体和人类的思维之间建立新型关系

。在线性阅读中，把典籍呈现出的丰富的思维过程和历史的书写过程还原到历史情景中时，我们感到非常无力，无法得知原来的历史情境和过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上，数据、经验、知识、智慧等操作需要我们反思。数字时代，建设学科间的基础设施、建立新知识模型以及提出新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数字人文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新工具、新范式，更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新天地。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片天地中建立学术的现代性，如何开辟学术的新境界。

一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从两方面分享其对于数字人文的感受。其一是学科融合，数字人文就是为了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回归到传统文化里。打破壁垒需要学者在哲学、医学、文学等各方面的造诣都很高，而现有环境培养不出这样的学者。另一方面，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占有资源已经不再掌握话语权了，未来的大趋势是资源开发。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老师提到了现在的网络文学研究。据研究显示，2016年以后，整个网络文学出现了数字库性的转型，却未见数字人文思维。这需要我们修订原来的思维来解决现有问题，比如情感模式变迁和价值观变迁等一系列问题。

论坛最后，与会嘉宾希望，北京大学能继续发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引领作用，与兄弟院校一道共同推动数字人文在中国的发展，响应胡适先生百年前“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倡议，在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环境下用知识图谱等新兴技术整理典籍文献，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再造数字化的中华文明。

（撰稿：KVision 实验室）



与会代表合影





专题展览

“文研院海报展”专题展览精选

海报是一种视觉传达的表现形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充当活动的推动者。文研院是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学术机构，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倡导“清新风气，一流标准”。举办学术活动是文研院的重点工作之一。

如何将学术活动海报做“活”、做“新”，既能呈现宣传的活跃性、又能凸显活动的严肃性，是文研院自创立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如今，文研院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

视觉传达语言，也在探索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设计师。每一场活动都有相应的海报，每一张海报都反映出文研院关注的学术问题，反映出文研院平台上的学人活动，也反映出我们的视觉设计思路。

值此文研院成立三周年之际，“文研院海报展”于2019年9月17日至12月30日举办，精选一部分学术活动海报和相关设计作品，深度剖析海报背后的设计思路，展示有趣的工作流程。以下为精选海报及设计说明。



观展



展厅



展品



设计制作流程



1、未名学者讲座第43期：
《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
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



2、未名学者讲座第16期：
国族建设中的“边疆”——近
代康巴藏区的政治整合



3、未名学者讲座第37期：
《堂吉珂德》中的伊拉斯谟
“幽灵”

1、演讲的主题是“《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释经学与近代科学的兴起”，关键之处落在两者之间的过渡和变化。演讲从全新角度给出了对《圣经》的内容、诠释方式和新教改革在16、17世纪自然科学兴起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考察。新教的文本处理方法宣告了中世纪象征性世界观的结束，为科学地研究自然和用技术开发自然确立了条件。而中世纪的“两本书”即《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的分离，则预示着科学与人文在后世的分裂。

博斯的《人间乐园》代表着一种神性的寓言和鬼魅的力量。自然之书出现的时候，这些鬼魅的力量都被祛除了，所以这幅画恰好是过渡时期的一个代表。

《人间乐园》原图是色彩特别丰富的一张画，我们采用了去色和统一色温的处理，想更进一步表达从一个多彩世界转向一个均质化世界的变化。海报四周加上暗角，弥补了去色以后立体感和透视感的缺失。

2、这幅海报设计的巧妙构思在于没有直接去呈现西康省的政治问题，而是采用了一种迂回的方式。演讲的主题是民国期间西康省的民主和政治问题。政治有许多符号或者标志，比如货币、债券或者是发布的各种带有行政性或者政治性的标志物。我们采用了西康省发行的纸币作为西康省政治的直观表现。

在构图上，纸币设计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构图。我们选择把纸币的边界往四周拓宽，把演讲的内容放在其中，营造一种“由此进入西康世界之中”的效果。这样，纸币的边框不仅仅是图纸的界限，同时也具有了些许疆域方面的暗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图案，和演讲内容叠加在一起，扩展出了各种意象之间组合的可能性。

3、讲座的话题从堂吉珂德的小说里挖掘伊拉斯谟思想的影响，或者说思想的幽灵。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学术话题。伊拉斯谟的思想和堂吉珂德的故事本身并不能直接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用了剪影和版画两重叠加的方式。思想的背景是一个整体性的背景，



4、北大文研讲座第 62 期：
共和自治的理念：安布罗乔·
洛伦泽蒂的“好政府”壁画



5、未名学者讲座第 25 期：
围城考——东方世界的希腊
知识



6、未名学者讲座第 25 期：
修昔底德论城邦内乱

表现为一个巨大的剪影。堂吉珂德的故事有着更多生动的细节，我们选取了堂吉珂德和桑丘大战风车的故事，以版画的形式叠加在剪影之上。这样组合之后，堂吉珂德既是在和风车作战，又好像置于伊拉斯谟的思想背景中，更能体现出我们常说的文学背后的思想关联。在形式上，剪影的平面感和版画的线条感之间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颜色上形成了白 - 黑 - 白之间的三重关系。

4、在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和图像的研究、艺术史的研究是并行而现的。讲座希望从一幅 14 世纪著名的意大利壁画《好政府的寓言》来讨论共和政治的问题。这幅海报的设计采用了直接呈现图像本身的方式，但我们把壁画的上端切割并且拉高，一方面表现出对这幅画解释和伸展的无限空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也是直接切题的。《好政府的寓言》对应的另外一幅壁画是《坏政府的寓言》，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政治讨论仍然需要面对天堂和地狱的隐喻，而被抬高的边界刚好有这样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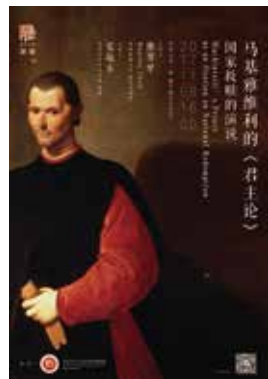
5、演讲主题“围城考——东方世界的希腊知识”，意图在东西方交融意义上讨论“围城”这个意象。我们可以联想到古典世界围城问题的起源，也可以联想到钱钟书写的《围城》。鸟笼，在这里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意象。一方面，不同形状的鸟笼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文化，而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鸟笼）里又都有着围城的隐喻。在形式上，大小前后错落的灵动布局增强了围城带来的矛盾感。

6、修昔底德的故事，简单说是有一个雅典从前到后衰败的过程，而整个故事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两个人就是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这张海报就是截取了这样两个可以代表雅典前后变迁的时刻，刚好又都是雅典民众围绕着他们的场合，色彩画和线条画之间也形成一个对比。

而这个设计更有趣的地方是，重新处理了两幅画里的人物的色彩关系。在雅典的全盛时期用了黑白，而在雅典已经显现出颓势的时候用了光芒耀眼的彩色，背后恰恰是这两个



7、北大文研讲座第 57 期：
三江源与游牧民的未来



8、北大文研讲座第 62 期：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国家救赎的演说



9、北大文研讲座第 31 期：
古埃及秘传知识、等级与仪
式 & 托勒密时期埃及本土
贵族的身份表达

人与雅典政治之间的张力。这种人为构造出的反差对比，也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7、三江源是中国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和典型区域。我们表达三江源和游牧民的这个主题，就是希望呈现人和空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海报想要体现出来的首先是这块地区的地理位置，所以上部放了三江源的地图。而最重要的是想要体现出三江源的自然风貌和它特有的自然的活力和神性，所以海报主体是在广袤的土地上奔跑的野驴，奔向了远处的雪山和白云，这其实表现了一个非常单纯的、带有神性意味的自然世界，以及动物的自由性。这幅场景让我们能由衷地体会到人跟自然之间是一种欣赏和敬畏的关系，这个才是所有自然保护和动物保护的核心精神所在。

8、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开端。许多作品都含有一些隐喻和隐匿的思想，我们如何把握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精髓，并且传递出来呢？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一幅最经典的肖像。海报中的肖像原来是一个正像，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把正像裁切了一部分，变成了偏像，再用电脑拉大了背影，使得背影和实像的比重相当，更能体现出马基雅维利思想背后的微妙不清的、模糊的、待人挖掘的深度。同时，也把马基雅维利思想中诡异和难于分辨的部分通过侧像体现出来。阴影和实像以及面部亮暗之间的强烈对比，正体现出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特质和特有的魅力。

9、两次演讲讨论的都是与古埃及相关的主题，演讲者是牛津大学著名的埃及学教授。我们在设计中采取了金字塔和象形文字的组合。通过墓室的门体现出文明的神秘感，再打出一束光，以照亮的方式体现出象形文字的魅力。这束光从天窗上发出并照进密室，象征着埃及学本身也是一束光，它在不断地解读那些秘密。整个画面实际上是由方形和斜线撑起，构图特别简单，但有力量，能体现出学术发现的魅力，还包含着多重比喻在其中。



10、北大文研论坛第13期：
百年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破坏



11、未名学者讲座第4期：
雍正朝火耗归公与国家能力



12、北大文研讲座第76期：
普遍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
大叙事

10、本场论坛的主题是百年传统文化和遗产保护。遗产保护本身是一个历史流动的过程，对遗产的记录，其实也是保护本身。我们首先选用了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实景作为底图，而历史是一个层垒的过程，保护也是一个层垒的过程，所以我们接下来选用了梁思成先生手绘的佛光寺大殿立面图叠加在底图之上，将现实感和平面感，及其分别突出的立体空间和历史时间叠加在一起，同时还将黑和白叠加在一起，呈现出多重对比，体现出我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多重理解。

11、本场讲座的主题和经济史相关，主要是研究雍正时期的经济制度和国家能力建设。雍正是一位身先士卒、日理万机的皇帝，但应该怎么表现出来呢？我们想到了《雍正耕织图》，耕织图可以把整个社会的不同层面和雍正进行的经济、政治改革的内在动力和资源体现出来。我们将耕织图中雍正务农的形象节选出来，做了四连屏风画，在构图上更有新意。

12、马克斯·韦伯最重要的研究就是理性化问题，本次讲座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一个更重要的推进——把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判断和叙事理解成一个普遍理性化的问题。海报的设计并没有直接去凸显韦伯或者是西方某一些历史的片段，而恰恰选择去表现理性化最根本、极致的状态——就像钟表一样。如同学者研究社会时，将如钟表一般理性化的社会拆解开来一样，我们选用了一张钟表的拆解图，一方面带有强烈的圆形的韵律感，另一方面则体现钟表的精致有效。这样能够突出地体现现代世界普遍理性化的基本意象，同时画面也比较清楚干净。

13、“走进历史现场——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追踪”的海报设计重点在于底图的设计。原图是文研院举行的此次考察活动的一张现场照片。我们通过加大对比度，突出明暗对比。又通过剪裁重新构图，突出了海报的主体：一条古道。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考察队员在古道行进的状态，



13、北大文研论坛第99期：
走近历史现场——陇东宁南
地区的史地追踪



14、北大文研论坛第20期：
下鞍进房——游牧民族在中
国城市规划上的贡献



15、北大文研讲座第78期：
绘画·政治·摄影：马莱内·杜
马斯、卢蒙巴夫人与非洲
女性图像

营造历史现场感，他们像音符一样，形成了流动的脉络。同时，剪裁的照片也刻意保留了丰富的几何和线条变化。纵向的古道处于画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和左侧横向的梯田构成的图像中最亮的部分，与右侧植被覆盖区域在比例上达到平衡，在色彩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纵横线条变化以及护栏的点缀也给图像带来了流畅的线条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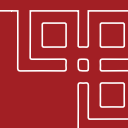
14、游牧民族是非定居的民族，当他们征服了文明世界之后就要面临定居的问题。论坛的主题就是讨论游牧民族在中国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定居后，在城市规划上所做的贡献。这是一个矛盾的主题。我们取用了《元世祖出猎图》中最重要的三个骑马的人物，代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将其放置到了城址图的左上角，暗示游牧民族进入到了定居的城市生活中。人物丰富的色彩和城址图的黑白色形成鲜明的对比，隐喻着游牧民族从原先彩色的、自由的、奔放的、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而进入到一个约束的、方框的世界，这是一种游牧的律动和定居的规制的矛盾，也许会激发听众的一些想象。

15、海报用图来源于 Marlene Dumas 所绘的 Widower (《孀妇》)。该作品的原型为曾见报的一张新闻照片，Dumas 据以创作。原照片主角是首位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Patrice Lumumba 的遗孀 Pauline Lumumba。Dumas 创作的画面中，被暗杀的总统夫人被众人簇拥，裸露着上半身，面容哀伤。该图与讲座内容相关度高，视觉冲击强烈。

海报设计以作品核心人物“孀妇”为中心，从原画作截取部分图像作为海报要素，以此改变原画作横式的布局特点，观者视线变窄，但纵深延长，要素集中，众人簇拥下的“孀妇”仍然牢牢占据视线中心。在布局上，图像元素居中偏右布局，海报的上、左、下三边留白，一来文字要素布局空间丰裕，不致过于侵入图像造成干扰，图文关系和谐，二来三边留白缀以黑字呼应图像的黑白色块，整体视觉效果简单干净、核心突出。



静园学术



尾崎文昭 | 东京大学中文系与鲁迅研究会的中文传统

2019年9月12日下午，“东京大学中文系与鲁迅研究会的中文传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尾崎文昭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吴晓东教授以新近出版的尾崎文昭与西川优子的口述《与中国结缘》引入主题。该书作为一部留学生口述实录，详细记述了尾崎文昭与夫人西川优子在中国留学的经历、感受与中国情缘。作为讲述者，尾崎文昭教授可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本次讲座中，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回忆在东京大学攻读中文的岁月，梳理呈现东京大学中文系及鲁迅研究会的发展脉络与中文传统，并就日本学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出反思性关照与思考。

尾崎教授详细梳理东京大学中文系发展的来龙去脉，指出其在中国语言与文学教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及其形成的学术传统。东京大学在成立初期，曾采用“国外进口、国内贩卖”的学科建设模式，学习西方体制，后才加入日本与中国的文学课。东方学术起初在东京大学算是附带多余的，是西方学术的“配电盘”，当时的学科建设，亦具有很



尾崎文昭教授

强的实用主义与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色彩。而在尾崎教授的家乡，即日本南方九州中央的熊本，则具有较为“保守”的、尊重中国古代文化与经典的传统，也产生以横井小楠、元田永孚、井上毅为代表的儒者群。支那文学与哲学，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曾经历几次建制的调整与变化，在曲折中慢慢成型。二战中后期，曾在中国留过学的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学人跳出日本本土框架关切转向中国文化；而在日本战败后，仓石武四郎反省日本的侵略政策，认为过去的日本汉语教学助长了侵略战争的蔓延，进而想要改变日本的

中文教学方式，建构作为文化外语的中文教学，因此可被看作领路人、带头人以及中文教育方面最重要、最有功劳的改革者。二战后，伴随着新的大学制度的建立，中国文学学科在东京大学逐渐发展、趋于成熟，后来又衍生出尾崎文昭教授曾长期任职的东洋文化研究所。

尾崎教授认为，日本鲁迅研究的起点是竹内好1944年出版的《鲁迅》。20世纪50年代，以东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为中心力量创立的鲁迅研究会，对日本的鲁迅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影响深远。梳理鲁迅研究会的发展历史，尾崎文昭教授认为，鲁迅研究会的成立，发端自亦回应着1952年“五一”事件后社会“左派”人士对于时政的抗争思潮。当时，这些人士常引用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以北京的“三一八”惨案来比附“五一”事件，表达内心的抗议与愤怒。不同于社会“左派”，东京大学中文系的一部分“左派”学生认为，摘引鲁迅的句子来宣泄自己政治性的愤怒是不科学的，不应将其套用照搬到1952年的日本，而是要认真真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强调用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鲁迅。换言之，不能跟着社会上政治运动的路子走。

因此，从1952年到1966年，他们组织起鲁迅研究会，展开了对于鲁迅文章的认真研读，并出版了自己的刊物《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进而指出，鲁迅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最后结晶为丸山升先生的著作《鲁迅》，而从研究会成长起来的学者也有很多——在丸山升之外，还有尾上兼英、高田淳、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北冈

正子等也成为日本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

尾上兼英曾将丸山升与木山英雄视作鲁迅研究的“双峰”。对此，尾崎文昭教授进一步梳理分析，认为丸山升在其著述《鲁迅：其文学与革命》（1965）中，批评政治主义，反对粗暴的政治性判断，提倡对异见充分理解后进行批判；亦批评文学主义，即批判按照自己（日本）的感性将自己的影子投到对象以解释对象的方法，转向强调实证主义研究路径。丸山升继承竹内好的几个观点（如反对依靠进口的近代主义，反对教条马克思主义），进而强调鲁迅“革命人”的面向，并关照观察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的鲁迅，在其交接面的具体运作中，发现了鲁迅所以鲁迅的思想特点。木山英雄全面否定竹内好在《鲁迅》中提出的北京黑暗时期“回心”论，详细分析《野草》文本，写著《〈野草〉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分析出鲁迅1925年前后通过思想崩溃后苏生回归而成功重构定位的心理过程，形成了深邃而独到的理解。

尾崎教授进而评述同一阶段的相关学者研究：高田淳在鲁迅的旧体诗中观察鲁迅的生动情感，写著《鲁迅诗话》（1971）；而伊藤虎丸则分析鲁迅在日本接受尼采的过程，继承、消化“竹内鲁迅”，提出两次“回心”论（东京与北京），并以“终末论”（末世论）角度分析解释鲁迅的思想；新岛淳良详细研读鲁迅文本、敏锐洞察；北冈正子详细调查鲁迅在东京接受西方文化的具体材料；而丸尾常喜则采用了完全摆脱竹内好框架的新的鲁迅思想分析，善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大传统与小传统里的

两个“鬼”来分析鲁迅，可谓“鲁迅研究会”鲁迅论的集大成。诸学者们通过精读文本，开掘出了许多有意思的“概念”与研究路径，推进与深化了鲁迅研究。而在尾崎文昭教授看来，这些“概念”并非源起外来并套用于鲁迅，而是鲁迅思想里面提炼出来的核心要点，不同的学者通过自己寻找出这些概念，形塑出带有自身研究烙印的鲁迅形象。

讲座结束后，吴晓东教授做出评论。他认为，尾崎文昭教授在讲座中详细介绍了日本近代汉学史与近代中文教育史，梳理了诸多相关研究学者，对于中国学界较为熟悉的汉学家们也进行了简明概括、梳理与阐释。讨论环节，尾崎文昭教授与会嘉宾、听众就历史梳理部分中的相关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尾崎教授回应认为，在“回心”论层面，竹内好与伊藤虎丸、木山英雄所寻求的要点具有一致性，伊藤

虎丸继承了竹内好在《鲁迅》中的理解，而木山英雄则继承了竹内好战后对于鲁迅的理解。陈平原教授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最初与日本学者接触时，大批学者均在做鲁迅研究。鲁迅在当时的研究界存在感非常强，但年青一代却鲜有研究推进。在他看来，这一现象的产生既受到年青一代与鲁迅在年代上的距离感影响，亦是前人研究已较为充分的体现。而尾崎文昭教授对此进一步补充，90年代以后，对于鲁迅思想方面研究的新思路不多，而作品研究和翻译研究却进展了很多。他认为，日本学界研究中国作家的同时亦是在研究自身，作家思想研究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密不可分，由此可进一步反思日本现代的汉语教育。

(撰稿：章涵青)

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 | 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 ——夏尔·安德勒《社会主义文明》导论

2019年9月18日晚，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系列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夏尔·安德勒《社会主义文明》导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燎宇评议。本次讲座是普罗夏松教授系列讲座第一场。

诚如普罗夏松教授在讲座开场白中所言，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并不

如圣西门那样为公共知识界所熟知。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此。出生于186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夏尔·安德勒以独特而敏锐的嗅觉在《社会主义文明》中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另一“文明”道路，却鲜为世人所熟知。

普罗夏松教授首先介绍了安德勒的个人成长经历。1871年的普法战争席卷了安德勒的出生地——斯特拉斯堡。幼年的安德勒在这股历史潮流的推动下转而以法语为其求学语言，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成为一战前后法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普罗夏松教授认为，德-法语的转换，促成了安德勒日后对德国的双重心态。在安德勒心中，一方面有一个普鲁士的政治德国，另一方面有一个歌德式的、康德式的诗意德国。他对德国的双重心态亦反映在对马克思的反叛，和对尼采的追随当中。在安德勒写给他的好友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的信中讲述自己在德国的见闻，他将德国的政治领袖形容为“像‘教皇’一样”，可见他对德国政治家冰冷的傲慢之厌恶。1919年，安德勒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体》。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在学术、学科和运动等层面都没有实际的“民主”经验。而同时，对马克思原旨的信奉导致无人敢对革命导师的理论思想进行阐释，“我们的思考和阐释本身即是对革命导师进行破坏”。这实际上阻隔了对马克思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也阻碍了德国社会主义的进步。普罗夏松教授认为，安德勒对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批评立场使得他更亲近那些批评马克思的思想家们。而从实践层次上看，安德勒则一向较为亲近非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倾



普罗夏松教授

向的政党。他对知识分子和等级制度始终持有高度的怀疑，虽然他自己曾是法兰西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

普罗夏松教授总结说，安德勒对马克思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批评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如地租、商业获益模式等，安德勒认为其解释路径是过时的。第二，反对经济决定论。在强调经济的“决定性”地位时，马克思忽略了司法和道德的存在。

那么，在安德勒批评马克思之余，又提出了怎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创想呢？普罗夏松教授认为，安德勒社会主义观首先是奠基在两大基石之上的，一个是司法与法制，一个是道德。同时是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对等级制度和社会权威进行全面的反叛。因而安德勒的社会主义观并不是脱胎于民主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全盘的重建，其各要素是重生的，司法制度和生产要素

应全面革新。这种“革新”投射到个人层面，则是“我们要（进行）自我内在的，精神的，全面重建与重生”。安德勒在法国的互助经济中看到了这种全面“革新”希望。这也是他十分推崇经济合作社的原因。安德勒认为，经济合作社能够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且这种对个人的重建，并不依赖国家的主导。因而互助经济可谓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人们在互助经济中，通过合作，实现个人的完善。

安德勒的社会主义观，鲜为法国知识界所熟知。普罗夏松教授通过他的历史学研究将这颗蒙尘的思想遗珠展现于世人面前。他希望以安德勒的社会主义观表明：在众多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尚存在一种有关文明的道路。

评议阶段，黄燎宇教授首先发言。他赞同普罗夏松教授以普法战争为切入点来理解安德勒的思想史。他同时提出“德国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法国有启蒙运动，英国有大宪章，而德国更似一个“迟到”的民族。安德勒的社会主义思想历程始终激荡着一对矛盾，即所谓“好”的德国与“坏”的德国。另外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安德勒将尼采与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因安德勒二战前便去世了，若他经历二战，会否对他的社会主义观有所更新呢。黄燎宇教授继而表示，虽然安德勒抱怨马克思“偷”了法国思想家的果实，但实际上马克思却对法国深有好感。德国并没有发生一场实际的革命，而法国革命却持续不断。

普罗夏松教授笑称，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是法国的“铁粉”。他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嫁给了法国人，等三女儿要嫁给法国人时，

他表示实在受够了。这当然是学术讨论之外的逸闻。回到民族性的讨论，英法德的民族个性是各美其美的。法国是政治的民族，德国是哲学的民族，英国则是经济的民族，这表明各个民族有其不同的力量。而对于“两个德国”的问题，安德勒则如当时一战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一样，始终想要在思想上将另一个诗意的德国“解救”出来。从已发现的文书和通信来看，安德勒从未提及希特勒，可见他终生未亲历过纳粹的德国，也未对希特勒有任何评论。

现场另有学者现场发言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境况中，这背后似乎是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普罗夏松教授回应道，他赞同世界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判断。法国思想界普遍认为二战之后，这种不平等日益恶化。然而，法国却比世界其他地方，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缓和一些。虽然法国社会也处在崩坏的边缘，但相对来说，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仍在保护贫苦的群体。但是整个西欧的主流声音却为新自由主义所萦绕，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普罗夏松承认自己成长于法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之中的，因而坚信社会主义仍有未来——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对西方国家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有重要的启发。

董强教授最后总结道，普罗夏松教授的历史研究为我们思考“社会主义是通往未来社会的方式和途径之一”提供了更多法国思想史的资源，亦让听众感受到了法国作为思想大国的独特魅力。

（撰稿：孙静）

薛龙春 | “碑痴”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世界

2019年9月25日，“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十四讲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碑痴’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世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主讲，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副研究员史睿主持。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涛，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秦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馆员谷卿出席并参与讨论。

首先，史睿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简要介绍。薛龙春教授主要研究16-17世纪中国书法史、尺牍文献，主要著作有《郑簠研究》《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王铎年谱长编》等，而今日所探讨的新书《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是他去年秋天在文研院驻访期间完成的新书。

讲座伊始，薛龙春教授表示，《古欢》并不是一本具体研究金石学问的书，而他的研究旨趣在于，观察黄易的社交圈展，可以对乾嘉时代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经典化策略等有更为深入的把握，他希望能够藉此重构乾嘉金石学的成长环境及社会生态样貌。

“古欢”一词出自汉诗中的“良人惟古欢”，就是往日欢愉的意思，也指旧友，或



薛龙春教授

是尚友古人，如王士禛《古欢录》所录的都是古代贤达。在黄易及其周边，“古欢”这个词的使用非常频繁，置诸金石学的特殊语境中，古欢更是一种与古为徒、与友人交换关于“古”的知识的乐趣。副标题中的“时尚”一词，晚明的袁宏道就已经开始使用，潘有为在致札黄易时，特别谈到因拓片抢手，“金石亦时尚”。尽管他们笔下的“时尚”与今天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充分说明，关于金石拓片的知识是乾嘉文人所必备的，否则如同没有掌握与他人交流密码，不仅无法参与学问的切磋、知识的交流，也无法加入到流行的话题之中。

宋代以后，金石学曾沉寂数百年，直到17世纪初才再一次引起文人的兴趣，并在18世纪形成一股潮流。在今天，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乾嘉时期的金石学，不仅重视金石考证经史的价值，对于铭文的书法趣味、拓本的美感等也有足够的关注。由于此一时期出土的多为碑刻，如黄易发现的《祀三公山碑》《武梁祠画像》等，碑刻移动、搬运都非常困难，因此金石收藏主要是拓片的收藏，拓片因而成为文化圈的一种时尚。

在介绍了新书创作缘起和名字来源后，薛龙春教授对本书的构架进行了大致的介绍。这本书的主角黄易（1744-1802），字小松、号秋盦，又号秋影庵主、散花滩人，浙江钱塘人。少年时期就开始在汉上、伍佑、南宮、清苑等地佐幕，后来报捐成功，分发济宁，成为运河道的一名低级官员。黄易是一位对金石拓片极度痴迷的文人，社交圈也极为庞大，在薛教授另外一本《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中，搜集、考证了黄易友朋约200余人650余札。这些书札中，委托拓碑与如何回报是最为集中的主题。他并未过多讨论黄易的学术贡献，而更关心他所扮演的角色、他的自我塑造，以及一个事实存在的金石学共同体在乾嘉时期是如何运作的。比如，通过哪些渠道可以快速掌握金石信息？所谓精拓本有哪些要求？人们如何征集？有哪些资源可以用于动员？拓片如何在知识圈流通？共同体中不同身份的人各有怎样的贡献，又有怎样的所得？诸如此类。

薛龙春教授认为，黄易之所以以低级官员成为乾嘉金石学的风云人物，是因为收藏拓片的门槛较低，同时黄易又拥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交换资源。首先，黄易长时间在济宁运河当差，可为经过济宁的官员、友人提供各种帮助与服务，比如济宁古运河河水短少，舟行非易，且闸口多，往来者无论官员或商人都无法顺利通过，提供船只的放行文件（溜子）能节省旅途等待的时间。如周震荣致札黄易说，“道经济宁，所有溜差等事，大兄必为之一一熟筹之”。那些获得黄易帮助的人，无论是之任四方的官员，还是四处游历的墨客，往往都带着寻访椎拓碑刻的任务前往各地；其次，济宁富产碑刻，黄易发现了大量副本用于赠送与交换，像翁方纲、钱大昕、王昶、王念孙、阮元等人研究武梁祠铭文的拓本，都是黄易赠予的；黄易本人精通书画篆刻，颇有声名，那些寄往济宁运河厅的信札，大多会有书画印的请索。如游幕山左的吴友松在写给黄易的信中说：“友松爱先生之画与印章，犹乎先生之爱金石文字，先生能以一画一印以副友松之望乎？”他眼中的黄易书画印，与黄易眼中的金石文字具有等同的意义，都是“古”的象征。黄易在30年中集聚5000件拓本，正是他拥有地利、拥有更多交换资源的结果。

黄易另一过人之处是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收藏。其中最著名的，是《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出版与武梁祠的重建，《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收录了黄易收藏的11碑，不仅钩摹铭文，也刊印友人的题跋，这部书因此成为兼顾书法与学术的综合性图书，这是黄易将个人收藏经典化的一个策略。

而1787-1794年间，黄易通过众筹重建武梁祠，大批官员、金石学者、地方贤达、收藏家、爱好者被裹挟其中，此举极大地提升了武梁祠的知名度，身在江南的吴騫甚至将之比况为象征三代的《石鼓文》。此外，黄易擅长绘事，他发展出的非常特别的访碑题材，在朋友圈中极受欢迎，它甚至影响到当日知识阶层的视觉趣味。在薛龙春教授看来，1796-1797年连续的高洛访碑与岱麓访碑，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但两次访碑四十八图的描绘与传播，却极大地塑造了黄易“访碑使”“访碑第一人”的公众形象。

在讲座的最后，薛龙春教授也谈到官员“职”与“志”的分歧。黄易的本职是一名河道官员，日常主持勘察、挑工、筑堤、防汛等工作。他的访碑与收藏、他的出版事业、他的书画印创作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无从计算。但我们未必就可以说，他的志业对他的本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认为文献遗存的偏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我们的判断。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仍可发现黄易运河厅的工作异常繁忙，他甚至到任济宁20年后才第一次来到省城济南。除了乾嘉之交居忧期间的两次远足，他在济宁及周边的访碑极其有限，大量的访拓活动大多由家中仆隶完成的。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强调职业性自然会带来了更高的效率，但同时也失去了像乾嘉金石学这样广泛的“学术中间阶层”，以及各种日常交往中所获得的研究素材与研究机会。

接下来，诸位专家学者针对薛龙春教授的讲座与新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白谦慎教授表示，这本书为乾嘉金石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他特别赞同黄一农先生对于《古欢》

一书的评价：“这是一本用细节与温度勾勒乾嘉金石学世界的书，它复原了遮蔽的历史和遮蔽的情感”。白谦慎认为黄易是一个慷慨的人，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并诙谐地将其比喻为“河道总督的办公厅主任”。金石学虽然与器物直接相关，其研究却主要依赖从器物之上剥下的拓片。拓片虽然不同于真迹，但是这种收藏方式使得乾嘉时期金石学参与人数众多，为日后的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很多颇具价值的拓片。白谦慎教授还指出，就艺术史研究而言，无论路径的内、外，无论是研究笔墨问题还是社会史问题，最后一定要落实到准确无误的细节，切不可大而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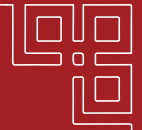
尹吉男教授则提出自己对金石学的一些观点。古时文人士大夫的收藏已经形成规模，而拓片的收藏方式则与这种贵族收藏的发展产生区别——他们虽在题跋上依旧发表自己的态度，但是在价值观上开始转变，贵族群体逐渐可以接受地方文化。这种文化发展或许是幕僚群体的扩大所带来的。就文献学方面，刘玉才教授指出，在当下文献中大家更多关注书籍文献，而《古欢》拓展了文献学的广度。在过去，这种个案研究常常是比较散乱的，而《古欢》则非常全面地整合了各种散乱资料进行探讨，对当下乃至对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作用。谷卿先生则表示，《古欢》一书突出了古和今的差异，每一次大范围的复古风潮都会引发新的时尚，有关黄易和乾嘉学者的探讨，虽然是在碑石的探讨，却具有十分高的历史价值。

（撰稿：张若瑾）





文研回望



文研院举办第七期邀请学者欢迎会

2019年9月2日,伴随夏末的余热,文研院迎来了第七期邀请学者,他们即将在静园二院开展为期四个月的研究与交流工作。下午三时,邀请学者欢迎会在208会议室召开。十五位本期邀请学者、往期邀请学者代表、院务会成员、全体行政人员参加,杨弘博副院长主持。

一段汇集第六期邀请学者驻院感言的视频情真意切,道出了学者们在此的丰富收获与不舍之情。“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此时再回看成立时的初心,文研院已在探索与执着中走过了三年,吸引了越来越多同道者的参与。透过视频,新一期学者加深了对北大和文研院的了解,也对即将开展的驻访生活充满殷切的盼望。

院长邓小南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她表示,文研院创立的目标是为文科根本性的发展助力,搭建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推动校内外跨学科交叉研究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接下来,邓小南从凝聚议题出发,对各系列学术活动(尤其是本学期重点)与邀请学者项目进行详细介绍。她表示,文研院致力于提供良好的学术条件与广阔开放的学术平台,激发激活思想里路。理解从共同实践中来,她希望学者们同文研院一起,共同摸索出新的学术道路。

接下来,两位往期邀请学者代表发表感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怀念激烈纯粹的学术辩论,感念文研院提供的优渥环境,希望能“常

回家看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熊春文谈及自己最大的收获,便是以务虚的精神重拾对知识的敬畏。短短四个月的思想交锋,使他们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复杂周密的立场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

随后,七期邀请学者分别就研究领域与学术兴趣进行介绍。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对作为历史系旧址的二院有着特殊的感情,文革结束后,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和工作八年。文研院成立以来,他一直关注这里的学术动态,向往宽松而自由的问学环境,并参加了文研院组织的内蒙古长城沿线的学术考察。接下来的四个月,他计划完成历史叙事写作三部曲的终结篇——《汉兴》的结尾工作。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曾长期担任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主席一职,对西方经济思想史有专深研究。他本人也对中西方经济思想和制度的比较很感兴趣,曾撰写有关《盐铁论》的文章。他希望利用这次难得的驻访机会获得跨学科研究视角,并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的历史理解。

文研院将那些对学术有不懈追求又寻求突破的学者聚集在一起,激发激活既有的思维范式,共同塑造广阔的思辨空间。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的研究对象为美国宪法,他在延续传统治学方式时发现西学研究愈发困难,希望利用驻访机会突破研究困境、厘清研究思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周月峰专治中国近代思想史,他

计划通过新的研究论题突破既有的思考方式,在文研院接受一次“再教育”。专攻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彭春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她将利用本次驻访机会,拓展对19世纪以来的全球思想流动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形成之间关系的研究。她表示,新题目是冒险,也是挑战,需要借鉴文研院倡导的跨学科视角,打破思想的壁垒。

文研院成立伊始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更多跨学科界限的互动交流,孕育有活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分享了一直在反思的学科分裂问题,他期待借助文研院搭建的跨学科交流平台与同道中人对话交流。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期待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充分交流,继续深化“基于梵汉对勘的中古译经语言研究”。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姚达兑所从事的中国神怪小说近代英译研究,涉及比较文学、历史、民俗学、文献学、翻译研究和比较宗教学等领域,他将充分利用跨学科交流平台与北大学术共同体资源,增益研究和写作。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叶晔期待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交流活动捕捉前沿议题。

在这里,学者卸下量化评审与行政负累的纷扰,静心沉潜在鼓励包容的环境中深耕自己的领域。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吴雅婷以移动的视角观察宋代文化社会,希望在驻访期间邀集研究伙伴展开中国近世知识史相关主题工作坊。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欢迎会合影

院教授石立善研究中国早期经典在日本的传承、阅读和接受情况，他将在未来几个月进行文献搜集和调查工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盈盈尤其关注边缘人的跨学科研究，她希望能进一步增补人文历史知识，思考将边缘作为方法的构成路径。

本期，有多位学者与北大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他们感念母校的培养，此次以全新的身份再回来，不变的还是那颗纯粹的求学问道之心。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李放春希望通过文史专业知识的助力重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整体观照韦伯在前“社会学”时期的方法论并达成对其历史方法的再认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肖铁计划搜集石油文学相关资料，拓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路国权计划在本学期重新梳理春秋史与考古的时间、空间结果，吸取法学与社会学

知识，学习、借鉴文研院学术活动组织经验与管理机制。

最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做总结发言。他指出，文研院期望将各个学科具有跨学科愿望的人汇聚在一起，通过一场场具体的学术活动感受、想象作为学者的应有之义，并让其回归纯粹自主的工作状态。好学问来自学者间互相激发的收获，应以最简单的方式求得。文研院希望学者的经验得以永续。

九月是丰富的季节。即将迎来成立三周年的文研院也气象一新。研讨室内，邀请学者的赠书陈列已经上架，引来学者们驻足观看。新学期学术活动、学术展览也将陆续拉开。新的面孔带来新的思想，二院的灯光，依旧闪亮。

（本文于2019年9月10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文研院举办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周年报道。

（本文于2019年9月23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未名学者讲座”：扶助青年学者，助力文科发展

“未名学者讲座”系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学术讲座项目，旨在鼓励青年学者学术研究，促进文科基础学科发展和青年学者进步。该项目由兴全基金出资赞助设立，三年来兴全基金的大力支持，为该项目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早在文研院尚在酝酿和筹备之时，“未名学者讲座”就已纳入文研院的工作计划。文研院刚成立不久，2016年9月27日晚，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平就受邀担任“未名学者讲座”首位主讲人，以“自由的海洋还是封闭的海洋？——古典国际法视野下的海洋秩序”为题发表演讲，正式拉开这一系列讲座的帷幕。

截止2019年7月，文研院已陆续举办了五十二场“未名学者讲座”。受邀的主讲人以北京大学校内各个院系70后、80后中青年学者为主体，讲座内容涉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艺术史等多个基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随着“未名学者讲座”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校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也不断地加入到“未名学者”大家庭中来。

文研院自立院以来，一直秉持“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诚如邓小南院长所言，所谓“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就是要依托北大的综合优势，立足于服务学术、服务学科、服务学者。



未名学者雅聚合影

文研院启动“未名学者讲座”计划，即用意于发掘北京大学校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秀青年学者，培养新生力量，为北京大学文科发展凝聚动力。百年来，北京大学素以文科见长，曾出现过一批为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立学科规范的前贤学人及其著作。“未名学者”主讲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在“未名学者”校庆讲坛中曾谈及，北大的前辈学人身上有着“超越学科分工或职能之上的‘北大性’”。但随着现代学科分工的不断细化，如何打破不同基础学科之间的壁垒，重建跨学科的对话，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迫切问题。文研院发起的“未名学者讲座”计划，将北大各院系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凝聚起来，鼓励大家围绕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基础、交叉、前沿问题进行讨论，对于继承和发扬北大文脉、北大传统具有深远意义。

文研院迄今为止已举办了三场“传承”活动，用“北大人”讲述“北大故事”的方式铭记北大传统。“传承”也是文研院一直以来秉持的学术信念，传承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后学对前辈知识、学养、研究方法、人格品行的学习，也体现在前辈学者对后学的提携、鼓励与认可。这也是当初文研院希望开启“未名学者讲座”的初衷，希望以此鼓励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

文研院举办的每期“未名学者讲座”都会邀请一位相关领域的资深教授，对主讲人的讲座内容进行深度评议。通过建立起青年学者与资深学者对话的方式，激发青年学者的思想，完善其正在进行

的学术研究计划。第三期“未名学者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老师主讲：“拾遗补艺，整齐百家——《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历史系陆扬教授称，以程苏东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正在引领着一场“静悄悄的学术革命”。他评价程苏东老师的研究具有一种内在的“跨学科”性，需要打通文史哲，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陆扬教授的点评切中肯綮，指明了未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即要以问题，而非学科划分为导向，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比如，哲学系宁晓萌副教授，从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风格概念切入对绘画史的研究；历史系林丽娟助理教授从文学作品《围城》中的婚姻譬喻出发展开了一场历史追索；历史系副教授韩巍主讲“西汉竹书《周训》与黄老道家”，涉及出土文献、历史学、诸子学等不同领域的方法。

2018年12月16日，文研院邀请“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及其家属相聚静园二院，举办了一场氛围温馨融洽的聚会。活动中，大家从年轻学者成长的角度，谈到从文研院所获得的滋养。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李溪副教授表示，如今大学的学科建制愈趋精细，学科纵深发展，专业化倾向明显。学者往往专精于某个领域，分身乏术，很难深入讨论跨学科、跨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年轻学者资历尚浅，似乎还不够资格讨论根本性问题，而文研院不仅为年轻学者创造了思考根本性问题的可能性，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了畅所欲言的交流平

台，更重要的是给了年轻学者思考并讨论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勇气。历史系副教授陈侃理表示，接到文研院的讲座邀请其实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因为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似乎还没有值得拿到公众跟前进行宣讲的学术成果，而文研院的肯定给了他莫大的鼓励。陈侃理的这一感受得到了“未名学者”的一致认同。

支持青年学者本身就是一个沉淀并涵育学术的过程，文研院启动“未名学者讲座”计划，就是要为青年学者创造一个可以轻松、自由地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心得的平台，将不同领域的青年学者凝聚起来，营造多学科交流、互通有无的学术环境，

让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滋养年轻一代的学者，产生思想的激荡。

“未名学者讲座”的影响逐渐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界青年学者的支持与响应，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学术理念也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可。2019年10月8日，新一期的“未名学者讲座”也将拉开帷幕，首位主讲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王利平副教授，报告题目为“文明化与作为灵魂的民族文化：从涂尔干到土耳其主义的理论之旅”。

（本文于2019年10月3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文研院举办第三期“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

具体内容参见“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学缘报道。

（本文于2019年9月27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教授访问文研院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教授于2019年9月17日至22日访问北京大学并讲学。访问期间，普罗夏松院长主讲两场讲座，并特别受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普罗夏松教授

学研究院（以下称“文研院”）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中发表主题演讲。此外，他还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就双方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来访由北京大学文研院与国际合作部共同主办，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赞助。

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教授曾求学于法国圣克鲁高等师范学校（现里昂高等师范学校），1989年在巴黎第一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院长、雷蒙·阿隆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中心（CESPRA）主任研究员。他曾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学府任教，并曾在奥朗德执政期间担任总统顾问。普罗夏松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19至20世纪的法国

历史，尤其侧重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想史以及一战研究。

2019年9月18日晚，普罗夏松教授首场讲座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进行，报告题目为“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夏尔·安德勒《社会主义文明》导论”。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教授担任评议，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担任主持。普罗夏松教授坦言，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作为一战前后法国知识界重要人物之一，他的社会主义观并未被法国学界所熟知，但其独特而敏锐的有关文明的视角应该被关注。普罗夏松教授从安德勒的成长经历讲起，指出安德勒德法语言的转换促成了日后他对德国的双重心态，这体现在他对马克思的反叛，和对尼采的追随当中。安德勒所

提出的社会主义观是奠基在两大基石之上的，一个是司法与法制，一个是道德。他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全盘的重建，其各要素是重生的，司法制度和生产要素应全面革新。而这种革新，也要投射到个人层面。安德勒十分推崇经济合作社，他在法国的互助经济中看到了革新的希望。他相信经济合作社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依赖于国家的主导，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9月19日下午，普罗夏松教授访问文研院，并与院务会成员会谈。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北大法语系助理教授章文参加会见。渠院长首先向普罗夏松教授的到访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文研院的运作理念和宗旨。渠院长强调了文研院对于跨学科交流的重视，邀请学者计划汇聚了来自各个地区、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普罗夏松教授对文研院的治学理念表示认同，并且强调了学习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在他看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文研院的学术理念相似，双方都是国际化的机构，并且重视国际化对学术的影响，这十分令人鼓舞。教授还表示，欧洲学术传统在全球学界的影响还需加强。当谈及有关文明等核心问题时，双方都表示希望能够进行更多交流和探讨。

9月20日下午，文研院成立三周年主题学术报告在二体地下报告厅如期举行。普罗夏松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在讲座开始，普罗夏松教授首先说明，圣西门是后天逐渐发展成为的社会主义者，并且他反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即人人只为自己，忽视贫苦的大多数人的解放。而圣西门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却又不仅仅是正式活动家，他也在大革命期间从事了经济投机活动。教授认为，圣西门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摸棱两可的。通过对圣西门作品的分析，教授指出，在圣西门思想中体现出了他对于科学天真的迷信，而这一点也对孔德、涂尔干等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圣西门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思想，他着重探讨了如何在保有欧洲各国民族国家性和身份认同的条件下建立统一的欧洲。教授认为，圣西门作为社会学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新按照阶级来组织社会，以回应大革命后等级社会断裂的问题。普罗夏松教授表示，圣西门的思想融合了作为学科基础的科学观、作为历史取向的进步观，以及维护最贫困阶层利益的道德观，展示出超越时代的敏感性，为人类勾勒出社会主义的明天。

普罗夏松教授担任院长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是一所专为研究生开设，在法国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界都独树一帜的机构，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博士生（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该院拥有一大批举世闻名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在上世纪成为法国年鉴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等重大思潮和思想运动的策源地与中心，因而在法国学

术界占据着中心位置，在全球也产生广泛影响。该院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课程建设方面有长期合作，并逐步建立起与北大文研院的合作。过去两年中，该院两名研究员，弗雷德里克·布拉哈米（Frédéric Brahami）教授，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教授曾先后以

文研院访问教授的身份，在北大开展访问研究和讲学。

（本文于2019年10月7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参加文研院《我心归处是敦煌》研讨活动

2019年10月，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回访母校。10月22日下午，樊老师受邀参加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院）主办的“文研读书”活动，就新出版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同校内外资深学者探讨交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资深教授叶朗，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以及该书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参加讨论。活动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主持。数百名校内外师生聆听了讨论。

樊锦诗老师与文研院有着深厚的渊源。2016年9月，樊锦诗老师受邀担任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后的首位访问学者，同彭金章老师一起来院访问，在举办论坛和讲座的同时，也将“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展”带回校园。近年来，樊锦诗教授回访母校时必探访静园二院，对文研院的发展十分关心，“来这里就像回家一样”。当天下午活动开始前，樊老师还与正在文研院开展驻访研究的第七期访问学者亲切合影。

本次“文研读书”活动，围绕《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邀请考古学、历史学、艺术研究领域的学者，探讨樊锦诗老师在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领域的杰出贡献。在引言阶段，樊锦诗教授结合自身在敦煌数十年奋斗的心路历程，重点阐述了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两方面

的内容。在石窟考古方面，她指出，要做出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清晰的全局规划，还需要考古、历史、艺术、理工等多学科专家的跨界合作。在文物保护方面，她呼吁社会应进一步加大文物和遗产地的保护力度，为文物工作者提供更好的研究环境。

从选题策划到书的最终出版，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一直关心着这本书的写作。他高度肯定了该书的价值，并表示，该书不仅描绘了樊锦诗个人的人生图景，还描绘了敦煌莫高窟守护者这一光辉灿烂的群体及其追求永恒价值的“莫高”精神。这种精神追求为敦煌莫高窟人的人生注入了一种神圣性，也必将照亮每个读者的心灵。“在莫高窟工作的人，能待在那里就是贡献”，郝春文教授感念以樊锦诗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甘于寂寞、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取得了一大批举世公认的原创性成果，从而掌握了该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此外，他们还勤奋探究，以新的技术记录，为考古报告开创了新范式。后辈学者应以他们为榜样，继续将敦煌学研究引向深入。

接下来发言的韦正教授是宿白先生的弟子，他长期奔走于石窟考古一线，对西北地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深有体会，因而极为感念樊锦诗老师的工作。他指出，石窟考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并加强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顾春芳教授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自己与樊锦诗教授的密切接触与交流经历。她认为，这书记载



樊锦诗先生参加研讨活动

了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更呈现了敦煌莫高窟研究的发展史。一代代莫高窟人为保护这座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甘愿献出自己的一生，为国家和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更多年轻人阅读此书，让难得的莫高精神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扬光大。

邓小南教授着重分享了樊锦诗教授与北大、与文研院的密切渊源。樊先生是文研院建立后的首位特邀访问教授，其关于莫高窟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主题论坛在学校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反响。正如樊锦诗本人所说，敦煌莫高窟的事业是一步步摸索、试探、总结出来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守护和研究敦煌的事业中耗尽了毕生心血和精力，最终使莫高窟的考古和保护工作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

“母校北京大学的精神和学风滋养了我的一生，使我始终不忘报效祖国，不忘

所从事的敦煌石窟事业责任重大。”樊锦诗教授秉承母校精神学风，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五十余载。文研院也将持续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发挥多学科交流互动的平台优势，与敦煌研究院开展密切合作，

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作出贡献。

(本文于2019年10月24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文研院和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共同推出“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

2019年10月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与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共同策划推动，邀请海内外科学史及科学与人文交叉领域的一流学者，隆重推出“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

现代科学在西方的诞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历史

来看，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并且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随着科学的发达而日益增大。与此同时，与科学发展的初衷相背离的生态危机、伦理危机、价值危机等也接踵而至，人类对其文明进步的前景谨慎乐观。未来科学走向何处？人类文明又将因此而发生怎样的变化？这



韩启德院士在讲座现场

是“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希望探讨的问题，主办方也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引发知识界和社会公众对文明中的科学问题的关注。

10月22日晚，“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报告厅B101举行，主题为“科学与文明之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

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主讲，文研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三百余名师生聆听讨论，现场座无虚席。

邓小南院长首先介绍了该系列讲座的发起背景。她指出，“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希望能够搭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对话平台，直面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激活科学与文明这个经典性的对话。也希望能够在文明的视域中认识科学的意义，在科学的基础上促进文明的养育，为中国科学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生机与活力。

讲座伊始，韩启德教授即指出，若讨论科学与文明，应当针对三个方面的系列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科学是什么，进而思考科学与文明的关系为何，最后讨论在中国背景下科学与文明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随后，韩启德教授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首先，若要回答科学是什么，需要理解关于科学所存在的不同定义，关注科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探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的深层次影响，从科学演化的角度判断当前科学是否处于以及处于什么样的突破阶段。其次，讨论科学与文明的关系，需要在理解什么是文明的基础上，讨论科学发展是否一定与西方文明深度绑定，科学是否一定需要转化为技术才能影响文明，人类社会是否能控制科学发展的方向等若干问题。最后，至于中国背景下科学与文明的特殊关系，既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存在，传统文化对于科学产生和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也需要基于现代中国的发

展，分析当前中国科技在世界上所处的水平地位，并尝试探讨何为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环节。

自2018年以来，文研院先后推出的“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两个系列讲座，以角度各异的交叉视角关注制度研究和文明研究的不同面向，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此次与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合作推出的“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预计分为十讲，将在2019年秋季学期及2020年春季学期分别推出。

(本文于2019年10月25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波特伦·谢弗德教授访问文研院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的邀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荣誉主席，法兰克福大学高级教授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于2019年9月1日至10月31日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院的特邀访问教授，谢弗德教授在文研院和北大经济学院分别做了两场主题讲座，参加了多场文研院的学术活动，与来自北大校内外的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和北大的同学们进行深入和广泛的交流。

波特伦·谢弗德教授，1942年出生于瑞士巴塞尔的一个学术世家，其外公是德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其父亲是欧洲著名考古学家。得益于家学渊源，谢弗德教授早年深入学习了数学、哲学，在巴塞尔大学取得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师从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和卡尔多等人，成为新剑桥学派的重要成员。在“两个剑桥之争”中躬身入局，与萨缪尔森、希克斯等人进行学术争论。自1974年之后，谢弗德教授正式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至今已逾四十多年，期间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主席，现任荣誉主席。谢弗德教授，在资本理论、经济思想史、环境经济学等领域出版了五十余本著作，发表了三百余篇论文，并撰写了众多的学术评论。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国、意大利、日本、挪

威、印度等国家，作为访问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欧洲，曾参与编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权威。主要著作有《Great Economic Thinkers》（上下卷），《Normal Prices, Technical Change and Accumulatio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Joint Production and Other Essays》，编著《Business Cycles in Economic Thought》。

2019年9月7日，谢弗德教授参加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冀门对话：外来文化传播与中国金融业创新”。参会者围绕中国古代宗教文化和金融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广泛交流。谢弗德教授从欧洲经验出发，介绍了“新费雪效应”以及欧洲央行在金融实践中的操作。谢弗德教授的发言为此次对话增添了国际化的色彩和更广阔的交流背景。

9月18日，谢弗德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了一次主题讲座——“欧洲如何崛起：经济知识在制度构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同时期的中国、印度、阿拉伯？无数的学者都给出了纷繁的答案。谢弗德教授将目光转向经济知识的增长。在中世纪末期，西欧人对经济体系的理解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学者对高利贷、利息计算和众多经济现象进行探讨，民众对于经济知识的理解也在深入。这都促进了更加适应经济增长的制度的构建和变革。经济知识的

积累，是欧洲经济发生质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主持讲座，平新乔教授、周建波教授、郝煜副教授参加并作发言。

9月25日，谢弗德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关于《资本论》中“转形问题”的主题讲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转化为价格，这一关键问题是历代学者争论的焦点。谢弗德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在随机系统中，价值转形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张亚光教授主持讲座，平新乔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聂志红教授参加并作发言。

9月27日，谢弗德教授参加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成立大会。谢弗德教授以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荣誉主席身份，对经济史学系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发言指出经济史研究对于经济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寄语未来，祝福北大经济史学系。

10月7日，谢弗德教授在北大文研院举办主题讲座——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古代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经济学标榜自己是对经济系统的普遍性解释，那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形态是否可以作为“标本”进行分析。谢弗德教授从19世纪欧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入手，介绍了历代学者的观点，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众多文研院的访问学者参加，并热烈讨论。

10月17日，谢弗德教授在文研院邀请学者交流会上做主题报告——《盐铁论》：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著作。谢弗德教授在欧洲学界极力推广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关注和研究，并选择《盐铁论》作为经典著作进行研究。谢弗德教授认为《盐铁论》中蕴含着现代经济思想的萌芽，并和《管子》一道，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年经济治理的经典性著作。



文研院向谢弗德教授（左）颁发聘书

在中国的两个月期间，谢弗德教授还受邀到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和青岛大学进行讲座和交流。在中国的访学经历，给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弗德教授和文研院的邀访学者以及校内外的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讨论，深入交换意见，既为中国学者提

供了欧洲视角，也为自己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

(本文于2019年11月8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 姜宏)

文研院承办北京论坛“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起源、构成与融通”分论坛

2019年11月2日至3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北京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顺利召开。其中，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院）承办了“早期文明的书写实践：起源、构成与融通”分论坛。来自中国，法国，美国，德国，英国，荷兰以及日本的26位学者参加论坛，就早期中国，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埃及的书写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其中包括如英国学术院院士辛威廉（Nicholas Sims-Williams），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伍兹（Christopher Woods），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荷兰莱顿大学佛教学教授司空竺

（Jonathan Silk）等著名学者。本次分论坛为关注早期文明的书写行为及文字符号的中外学者提供了国际化的交流平台。

围绕早期文明的书写文化，文研院与国际学术机构的探讨与合作由来已久。此前，巴黎文理研究大学（Paris Sciences & Lettres，以下简称PSL）校方及学者曾多次来访，探讨在相关领域与文研院展开合作。2018年10月，文研院与PSL，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合作，在法国举办了“古代字体与古代文本”（Ancient Scripts, Ancient Texts）学术会议，并取得圆满成功。作为这次会议的延伸，文研院在北京论坛大会框架支持下，举办本次分论坛，无论是议题还是学者范围，都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本次分论坛着眼于我们身处的世界正在经历的书写文明巨变。国内外优秀学



文研院承办北京论坛分论坛

者，从书写实践的角度，探讨文明的起源、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构成与融通，包括如下议题：首先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立足于各早期文明的出土材料，讨论早期书写所依赖的承载媒介，如中国的甲骨文和楔形文字的泥板，关注其物质性，它们被制作、刻写、保存的方式；其次是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讨论早期文字的起源，文字符号的抽象化过程，象形文字与表音符号之关系，早期文字表达语言的方法等，或是符号独立于语言；第三，则是将书写视作一种社会实践，探讨书写在早期文明发展与国家形成中的关系，制约书写传播的因素以及精英阶层书写文化的起源；第四，把讨论对象从较大的文明单位，聚焦到中国新疆地区，以该地区出土的“胡语”写本为中心，集中探讨处在交融状态中的中西文明。中国新疆地区，处于不同文明交汇地带，包括古代的希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都曾经活跃在新疆绿洲，印证了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论坛主旨。“胡语”书写文化，有其鲜明的特征，记录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生动案例。所谓“胡语”写本，记录了公元后一千年里，生活在新疆丝路南道的各个绿洲居民所使用的印欧语系古代语言。“胡语”原非书写语言，却先后发展出书写文化。“胡语”何时、如何采纳了非原创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写文化，也是本分论坛的关注点之一。

在学术会议的环节之外，11月2日晚，文研院在静园二院举办招待会，邀请参加分论坛以及校内相关领域的学者齐聚一堂，增进友谊，延伸交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在发言中，代表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对到场的各位学者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文研院以“文明：中华与世界”为核心关怀所开展的学术活动。渠敬东教授回顾了2018年在法国召开的学术会议，并希望这种学术上的联系和交流能够长久地进行下去。

作为 PSL “书写的历史与实践”项目负责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伊凡·盖尔缪（Ivan Guermeur）介绍了 PSL 为研究历史和书写创立的国际研究型项目 Scripta，之后谈到了于 2018 年举办的联合会议，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成果斐然，并期待 PSL 和文研院能有更多合作机会。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是世界顶尖的从事近东文明研究的学术机构，今年适逢该研究所成立 100 周年。该所所长克里斯托弗·伍兹（Christopher Woods）教授在发言中介绍了东方研究所的历史，并表示作为研究东方文明和文化的机构，他十分高兴能够和众多研究多文明写本的学者交流探讨。他向文研院赠予了两本记录东方研究所百

年历程的纪念出版物，并希望可以和文研院建立联系。

作为分论坛的主要召集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中心主任朱凤瀚教授发言，他首先欢迎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并感慨道希望可以掌握多种的语言以便更深入地研究不同的写本。朱凤瀚教授认为对于研究不同文化的学者来说，可以通过彼此相互借鉴以获得更多视角。

参与本次分论坛的各方学者都表示对此次交流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并期待明年可以继续这种讨论，进一步深化主题，扩大影响力。

（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赵相宜）

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访问北京大学文研院

2019 年 10 月 7 日 - 11 月 7 日，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院）的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先生访问北京大学，并作为特邀访问教授在文研院作为期一个月的讲学。

访问期间，王汎森先生先后以“性格与历史”和“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为题，做了两场公开讲座。在第一场讲座中，

王汎森先生详细辨析了人物之性格与历史和历史研究之间的既隐微又重要的关联，强调人性万殊，只有“量才适性”才能有所成就。第二场讲座，王汎森先生从“性格”的角度切入，论述历史之用。他认为，读史可以帮助人们防止集体失忆，克服“本质化”现实的倾向，使人们得到一种解放。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历史增长见识，而见识本身即是一种能力。

10 月 12 日，文研院举办“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暨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王汎森先生在会上作了“陈寅恪的明清之学”的发言，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先生晚年研究明清的两部著作《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使用证据和推理的方式。会后他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专访，分享了他

对陈寅恪晚年争议最大的一部作品《柳如是别传》的理解。王汎森先生认为，《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一次“史学实验”，是进一步运用“以诗证史”的力作。他认同“心史”的说法。虽然陈寅恪的有些著作并不符合现代学术对“客观性”的要求，但他的著作无不是基于深厚的史学功力和对世人的细腻观察，其表现出的“历史的想象力”造就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而这正是在现代史学研究中渐渐消失的东西。

驻访期间，王汎森先生还在院内开设了“英美思想文化史名篇选读”班（四讲）。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院校和机构的青年学者参与。读书班每次由王汎森先生先做引言，简单介绍本周所读文章的相关背景，然后由 2-3 位报告人就所选篇目作报告，嗣后再由王汎森先生作评论并与在场的各位青年学者作进一步的讨论。

在离院之时，王汎森先生表示，在他所到访过的各类研究机构中，文研院是最像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而且文研院的



王汎森读书班结业后在二院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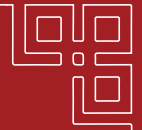
学术环境和学者之间讨论的氛围还要尤为热烈。他借用散文家陈之藩的话，称文研院是一个“智者的旅店”。兼具效率和美感的各种学术活动在这里“日夜上演”，令他收获良多。他也希望并祝愿，文研院所搭建的平台和运作模式可以长久的发展下去。

王汎森先生在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等领域成绩卓著，近年来更将其研究领域延伸至所谓中国的“新传统时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学思想的政治意涵等问题。2016 年，时任中研院副院长的王汎森，曾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在北大做三场系列演讲，在人文学术界刮起一阵旋风。本次系列演讲的成果后由王汎森先生编订为《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受到广泛好评。

（本文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王瑞）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18-19
2019-07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对话”。本次论坛由文研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来自爱默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19-24
2019-07

文研院组织历史学、历史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赴呼和浩特、包头、达茂旗百灵庙等地进行实地走访与考察。考察团一行 9 人，包括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田宓，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乌云格日勒，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讲师包呼和木其尔，深圳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本次考察是继 2017 年“居延大遗址”跨学科考察、2018 年内蒙古长城地带文物史地考察后，文研院组织的又一次西北考察。

21
2019-08

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廖咸浩到访文研院，全面了解文研院运行方式，并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深入沟通。

24-25
2019-08

文研院召开工作委员会暑期研讨会。本次会议就文研院办院三年总结、邀请学者遴选、学术活动组织、学术成果转化、工作运转机制、未来发展规划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为文研院下一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具体实践路径。文研院工作委员高峰枫、李猛、刘云杉、陆扬、邢滔滔、叶炜、张亚光，院务会成员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本次会议。

29
2019-08

文研院第三期邀请学者、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回访文研院，并赠送新书《乾隆皇帝的智与昧——御制诗中的帝王古玉观》。

02
2019-09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欢迎会在 208 会议室召开。十五位本期邀请学者、往期邀请学者代表、院务会成员、全体行政人员参加，杨弘博副院长主持。

03
2019-09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作主题报告，题为“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凝固及其意义”。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04
2019-09

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湛如法师到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商议学术合作事宜。

05
2019-09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应邀参加燕京学堂开学典礼，并赠送“百尺高梧撑得起一轮明月，数椽矮屋锁不住五夜书声”对联一幅，寄托了两院共同推进北大学术建设的情意。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一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石立善谈“钞写逍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路国权老师谈“假如真有时光机”。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李开元、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参加讨论。

06

2019-09

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副院长李霄鹏到访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热情接待。

10

2019-09

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跨文类写作与学术研究——以历史学为例”。第七期邀访学者波特伦·谢弗德、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12

2019-09

“东京大学中文系与鲁迅研究会的中文传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尾崎文昭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15

2019-09

“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九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走近历史现场——陇东宁南地区的史地追索”。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副教授刘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孟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邱源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博士研究生于志霖发言。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并参与讨论，院长助理韩笑主持。

16

2019-09

第四次“北大中国史”编撰项目讨论会在静园二院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赵世瑜、李伯重，三联书店编辑冯金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共同与会并深入讨论。

文研院工作委员会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就 2020 年春季邀访学者评审事宜展开讨论。工作委员高峰枫、李猛、刘云杉、陆扬、邢滔滔、叶炜、周飞舟、张辉、张亚光与全体院务会成员出席。

17

2019-09

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姚达兑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神怪小说的近代英译之聊斋英译”。第七期邀访学者波特伦·谢弗德、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周月峰、路国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闵雪飞老师、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五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本次讲座由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系教授吴晓东主持。

“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六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从《五族谱》看波斯人对欧亚诸民族的认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一丹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付马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评议。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迎胜参与讨论。

18

2019-09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一场在经济学院 305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洲如何崛起——经济知识在制度构建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次讲座由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主讲。

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系列讲座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夏尔·安德勒《社会主义文明》导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董强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燎宇评议。本次讲座是普罗夏松教授系列讲座第一场。

19

2019-09

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交流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李放春谈“谱系学：从尼采到韦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姚达兑谈“进化论、世界体系与世界文学”。第七期邀访学者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吴雅婷、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参加讨论。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教授到访文研院，同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就两院治学理念、学术

国际化发展、合作交流项目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助理教授章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全程陪同。次日，普罗夏松院长于“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作主题学术报告，题目为“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八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因素”。文研院邀请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20

2019-09

文研院隆重举办“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活动贯穿两天，由主题学术报告、跨学科对谈、学者讲坛三部分组成。

“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九期于9月20日下午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全球化：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

“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期于9月20日下午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圣西门与欧洲思想之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普罗夏松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主持。本次讲座是普罗夏松教授系列讲座第二场。

“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二、“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学者讲坛于9月20日晚上在二教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讲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进行视频讲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资深特聘教授葛兆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志攀现场讲述改革开放潮头年代的求学历程与师承因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院士出席并发表讲话。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主持。

21

2019-09

“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三、跨学科对谈“思想史与艺术史”于9月21日上午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作主题发言并展开深入讨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主持。

24

2019-09

“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三、跨学科对谈“文学与法学”于9月21日上午在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冯象作主题发言并展开深入讨论，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

“文研三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三、跨学科对谈“考古学与人类学”于9月21日上午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作主题发言并展开深入讨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研究馆员、秘书徐华烽副研究馆员来访文研院，与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讨论两院合作事宜。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肖铁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现代中国的方式”。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姜南、石立善、李放春、周月峰、田雷、彭春凌、叶晔、姚达兑，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一期在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柔然与阿瓦尔考古调查——兼论6-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倪润安主持。

25

2019-09

“书志学和书籍史系列”讲座第十四讲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碑痴’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世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主讲，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主持。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刘涛、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秦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馆员谷卿出席并参与讨论。

法国人类科学之家基金会科研主任吉乐·吕里耶(Gilles Lhulier)到访文研院，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讨论学术合作事宜。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二场在经济学院305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随机系统中的‘价值转形问题’”。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

07

2019-10

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聂志红评议。

社科部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组织相关单位前往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参观“弘扬红楼传统，争做教育标杆”展览，文研院全体工作人员参加。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七期第三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经济学的普适性——现代经济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形态的解释力”。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波特伦·谢弗德主讲，文研院邀请学者、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周绍明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出席并参与讨论。

08

2019-10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余曦（Jean-François Huchet）、研究事务副院长彼得·斯托金格（Peter Stockinger）来访文研院，同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讨论学术合作事宜。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罗梅君教授来访文研院，同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商讨学术史展览合作等事宜。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彭春凌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从宇宙进化到社会进步——近代中日交互语境中的斯宾塞”。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姜南、石立善、李放春、周月峰、肖铁、田雷、叶晔、姚达兑、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三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文明化与作为灵魂的民族文化——从涂尔干到土耳其主义的理论之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评议。

10

2019-10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三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第七期邀请学者、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作主题交流发言，题目为“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

12

2019-10

的抽取及其运用”。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周绍明、景跃进、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北大文研纪念”第六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台湾中研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余位知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家属从不同的视野和全新的研究深入探讨其史学思想和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绵延不绝的影响。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主持，三联书店党委书记李三秋、陈寅恪家属陈美延女士致辞。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国蒙古学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迎胜，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涓，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桂生，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国强做主题发言。

13

2019-10

“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五期在静园二院 208 室举行，主题为“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典籍传承与学科融合”。本次论坛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数字图书馆实验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中宣部出版局古籍处处长章隆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张久珍到会并致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的数字人文领域资深研究人员以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书局等相关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记者全程参与。

14

2019-10

“傅斯年与北大”展览筹备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员邹新明，文研院邀请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周月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曹宏，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会议。

15

2019-10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李放春作主题报告，题为“探究革命之‘道’——在现代性与文明之际”。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前往故宫，拜会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深切落实双方合作事宜。故宫研究院研究室主任王子林、副主任于庆祥、秘书徐华烽副研究员等参与会见。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四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斯一作题为“荷马社会与荷马道德——‘荷马问题’再探”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邢滔滔主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晏绍祥评议。

16

2019-10

浙江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赵鼎新来访文研院，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会谈。

凯风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来访文研院，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会谈。

17

2019-10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第七期邀请学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波特伦·谢弗德作主题交流发言，题目为“盐铁论：经济思想比较史中的经典著作”。第七期邀请学者第七期邀请学者王汎森、周绍明、李开元、李放春、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参与讨论。

18

2019-10

法国巴黎文理研究大学（PSL）副校长范明河（Minh-Hà Pham）、多芬大学副校长克里斯托夫·艾利-迪-科萨克（Christophe Elie-Dit-Cosaque）、多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德尼·达尔皮（Denis Darpy）、巴黎文理研究大学亚太合作项目经理王婧一行到访文研院。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一同接待来访。双方就举行年度学术会议、学者互访等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

19

2019-10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副院长杨弘博及工作团队一行赴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就学术发展规划、学术展览策划、跨学科平台搭建和学术共同体建设等方面进行调研。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出席座谈会，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文研院第一期邀请学者白谦慎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缪哲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天懿教授，浙大艺术与考古学院党委副书记方志伟老师等与调研一行进行了深入交流。

21

2019-10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一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性格与历史”。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出席。

22

2019-10

“北大文研读书”第十八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的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研院首位特邀访问教授樊锦诗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资深教授叶朗，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我心归处是敦煌》撰写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参加讨论。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周月峰作主题报告，题为“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第七期邀请学者李开元、石立善、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肖铁、彭春凌、姚达兑、路国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科学·文明”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三期在第二体育馆报告厅 B101 举行，主题为“科学与文明之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主讲，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主持。

23

2019-10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四期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怀疑者多马——看，触碰与信仰”。比萨高等师范学校希腊语文学教授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

24

2019-10

“傅斯年与北大”展览筹备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周月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会议。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五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古犹太教中作为世界观的天启主义”。耶鲁大学神学院旧约研究 Homles 讲席教授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交流会（第五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交流会上，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周绍明谈“中国式孝顺与中国母亲之间的冲突与化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黄盈盈谈“‘小姐’研究：三个人、四座城、二十年”。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李开元、景跃进、石立善、吴雅婷、田雷、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参与讨论。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五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佛教譬喻、因缘文献从印度到中国的嬗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教授评议。

25

2019-10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五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古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的迦南传统”。耶鲁大学神学院旧约研究 Homles 讲席教授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六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北魏祭天方坛上的木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咎涛主持。

28

2019-10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二期第二场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主讲，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主持。

29

2019-10

收藏家林百川携部分西方汉学家信札、文件来访文研院，与多名专家学者就资料内容与性质进行讨论，与会人员包括：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北京大学外国语教授王邦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教授高峰枫，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周绍明等。

文研院第七期邀请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请学者、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佛经翻译与汉语演变——‘见’字新解、‘将无’重考”。第七期邀请学者波特伦·谢弗德、周绍明、李开元、景跃进、吴雅婷、黄盈盈、田雷、肖铁、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七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塑造人民：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荣休教授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评议。

30

2019-10

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分社社长郑庆寰、编辑李丽丽来访文研院，同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商议合作事宜。

《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受文研院邀请，带领第七期邀请学者寻访校内古建遗迹，讲解燕园百年历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与工作人员随行。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参加“北大—故宫洽谈合作会”。会后，故宫研究室主任王子林研究馆员、秘书徐华烽副研究馆员来访，同院长邓小南、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商讨双方学术活动对接事宜。

31

2019-10

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六期在第二体育馆 B102 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燕京学派’的乡土社会转型方案——基于费孝通与林耀华的比较”。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杨清媚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